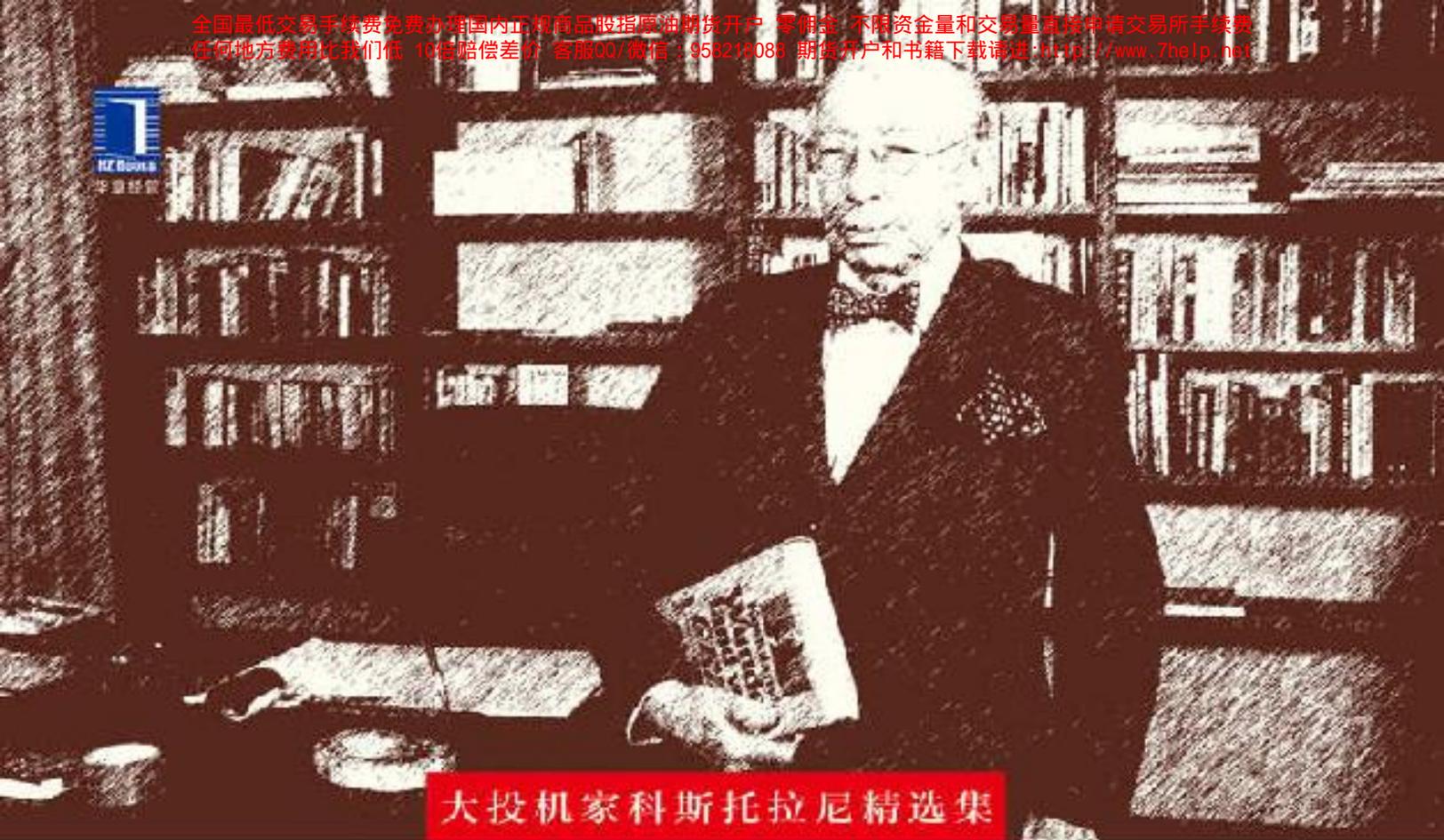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7  
HZ Books  
字里行间



大投机家科斯托拉尼精选集

*Der Grosse Kostolany*

# 证券投资 心理学

[德]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著 郑磊 译  
(André Kostolany)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开篇 遇到“新的自己”

第1章 90%的行情来自心理因素

第2章 金钱的诱惑

第3章 群众是无知的

第4章 大崩溃——群体心理学案例

第5章 先知、教授和各路“股市大师”

第6章 股市和世界的其他部分

第7章 德国人的心理

第8章 我的交易生涯

第9章 我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

第10章 股市心理学：迷信、拜物教和瘾癖

## 第11章 傻瓜的价值

## 第12章 日不落帝国：股市

## 后记 我的三段职业生涯

## 译者序

科斯托拉尼被誉为“欧洲股神”，但他并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这并不奇怪。就像学习语言学的学生不一定能够成为作家一样，经济学家中真正的股市投资高手，据我所知也只有凯恩斯一人。其实在证券交易场上，应用最多的不是经济学理论，而是融合了心理学和金融学的相关知识，现在这个领域发展成了一个专门学科，就是行为金融学。但在科斯托拉尼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样的认知水平和理论，这正是这本书的超前之处。

听一位股市资深投资家讲他对投资者心理的认识，显然要比听传统的心理学课程有趣和接地气得多。科斯托拉尼认为90%的市场行情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这个说法我基本同意。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比例还有争议，但已经没人否认心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市场行情。

从跨学科应用来讲，证券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既需要理论指导，又不能完全由理论来解释。其中既有学理的东西，又有实践的艺术成分。至于有多少属于科学，有多少属于艺术，即便科斯托拉尼这样的市场交易大师也难以说清楚。这是现今行为金融学尚未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一个例证，也是多年来研究证券市场行为金融的我，对此书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我希望能借助实践层面的读物（比如这本书）加深对理论探讨方向的认识。

行为金融学对于证券市场给出有关市场动态结构的模型，这不仅应该是一个分期模型，而且应该考虑到不同的时间结果。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结构上，市场的形态都是重复发生的，这是一个嵌套结构，用数学术语说，就是分形。我们必须分析到最基本的证券市场分形结构，才有可能通过大规模的运算，模拟出整体市场运动轨迹，并获得证券市场价格运动的更接近真理的认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证券市场投资的“科学”部分。至于证券交易的艺术，其实我理解那是一种“人类行为艺术”，并非受理论支配或能够被现有的理论精确解释，而是更多地来自个体特征（比如投资者的个性、认知水平、情绪和思维特征等）。对于这种艺术的研究，如果从归纳和统计的角度，可能现实意义会更大一些，也更为可行。当然，也许在不远的未来，人类在神经和大脑科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研究的飞跃发展，有能力从科学测量层面搞清楚其中的复杂机制吧。

如果证券交易的结果确如科斯托拉尼所说，其中90%来自心理因素，那么我只能赞同一个观点，即证券交易的“艺术”成分要远高于“科学”成分。作为行为金融研究者，我更关注如何揭示和解释后者，而作为一名专业投资人士，其实我很享受在交易中体会人性并由此在人生修为方面获得的收益。股市如人生，既是交易，也是修炼过程。

最后我想谈谈价值投资。有人将科斯托拉尼看作“欧洲的巴菲特”，我觉得这个称号不够贴切。其实他本质上是一位投机家，非常了解投资和投资者的本性，尽管他关注证券的基本面，但操作时不拘泥于此。因此我认为科斯托拉尼的“基本面”概念，与大多数价值投资者的基本面不是一回事。

绝大多数价值投资者都想搞清楚所投资公司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为此他们使用了各种方法，比如类比法、现金流贴现法等，其实这些方式本身就是徒劳的，和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没有多大区别。这是因为企业内在价值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绝对的，从实践角度上讲，甚至可以贴上一个“不可准确测度”的标签。以我二十多年与商业企业打交道的经验看，一家企业的CFO或CEO大多数没有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现状的能力，遑论做出中长期经营预测，基于这种情况而用各种数学模型计算出的所谓“企业内在价值”，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垃圾进，垃圾出”，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杰克·施瓦茨批评的那种因为贪图方便和懒惰而采用数学模型来衡量经济事务的一种惯常做法，也是证券交易市场上的“传统智慧”。

以我个人拙见，何谓“企业内在价值”？以目前人类的技术和认知水平来说，是没有确切答案的。理论上讲，其实就是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认同的“企业价值”，这个量值应该是一个不太准确，而且会随时间变化的数值区间。投资者与其徒劳地“计算”企业内在价值，

不如搞清楚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心中认可的那个“企业价值”在什么范围，是一致认同的每股收益、一致认同的市盈率还是一致预测的股价，这些往往与股票的市场价格贴得更近一些。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唯心主义”观点。如果这个“心”指的是抽象概念，那我不打算陷入“唯物”和“唯心”的论战。这个“心”字，我认为指的是“心理”的“心”，“心情”的“心”。与其说证券市场价格体现了证券的“内在价值”（这实在是一个空泛缥缈不易琢磨的概念），不如说它主要体现了“人心”向背。当然，这个“人心”并非是指某个人的心理或心情（情绪），而是市场参与者的广大之“心”，而这本书说的正是市场群体的“心理”导致的证券市场动态运动机制。

略有遗憾的是，这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一代投资心理派大师的经验之谈，其中包括了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奇闻逸事。在今天，特别是研究行为金融和投资者心理的学者看来，这些观念并无新奇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都来自一个证券交易界“骨灰级”大师的亲身实践和体验。这是最为珍贵的传承，是人类精神世界那些熠熠生辉、绵延不绝的闪光思想。这是古老而又最贴近现代证券交易的思想，对于今天这些走入迷途的人来说，有必要阅读经典，拨乱反正，回到本原，站在大师的肩膀上，重新出发。

## 前言

我读过的科斯托拉尼发表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是在1965年，标题是“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他在一本书中写道：“我成不了财政部部长，也不愿当银行家，我就是投机者和操盘手。”

从20世纪70年代起，科斯托拉尼就栖身于市场行情变幻莫测的股票交易所里，那是一个能够展现经济实况的地方，其中也夹杂着虚构的故事和不实的谣言。在那里，贪婪和恐惧往往会引发股市非理性的涨跌波动。

对科斯托拉尼来说，股票交易不仅是工作，（直到今天）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斯托拉尼从故乡布达佩斯移居巴黎，开始投身于这项终生事业。对于科斯托拉尼而言，这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他的生活。科斯托拉尼说：“股市就像一片热带丛林。”他在那里获得了收益，尽管所交的学费足以读好几个哈佛学位了，但毕竟收获更大。

和其他股市经纪人的发展路径（先学理论，再通过帮别人做投资来积累经验）相反，科斯托拉尼是从实践到理论，先用自己的钱操

盘，从中归纳出股市规律。从最初操作股票的经历中，他就已经明白：在股市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科斯托拉尼认为光是获得所有股票信息是不够的，想象力才是市场投机的原动力，也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科斯托拉尼非常鄙视完全不具想象力的投机操盘系统和股市分析软件。股市经常是波动起伏的，同时也具有人性化的特点，有时甚至太过人性化了，而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

科斯托拉尼认为德国人不擅长谋划金钱方面的事情。作为浪漫主义者、哲学家或是音乐家的德国人，在处理金钱问题时反而表现得并不浪漫，也没有发挥出想象力。这可能是真的。当我1969年在慕尼黑第一次遇见他时，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说德国人至少需要积累30年的投资经验，否则无法脱颖而出。我问他，是否想过公开他的操盘经验，帮助德国人减少在股市中的损失。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了几次“合作”，包括财务咨询及股市研讨会。

股市研讨会的反响超出我们的预期，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报名参加。所讲的内容就包含在1986年出版的《科斯托拉尼的投资者和投机者股市研讨会》一书中。这本书成了当时的畅销书。很多人读过该书，按照书中的建议选择股票，因而避免了损失。

该书是成功的股市操盘手及股票投资者必备的参考书，不但揭示了股市秘密，还培养读者提高独立思考和操作股票的能力。该书不像课堂上用的教科书，反而更像一本出自科斯托拉尼之手的小说，科斯托拉尼自己也说：“我不是在授课，我只是在对学生讲故事。”

由于具有职业、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性，科斯托拉尼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在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反对墨守成规的人，我认为，勇敢、义无反顾地，甚至狂热地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而奋斗，为此而不择手段，反而会得到更糟糕的结果。他没有去银行工作，是的，这让他感到更开心，因为他即便有失误的时候，也不会招致客户的批评。

我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财富上的成功，祝福本书的作者、我的忘年交和合作伙伴科斯托拉尼先生，能够继续保持魅力和乐观精神，在传道授业中享受快乐生活，在证券投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戈特弗雷德·海勒（Gottfried Heller）<sup>[1]</sup>

[1]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长期合作伙伴。——译者注

## 开篇 遇到“新的自己”

国际银行业大会在慕尼黑举办期间，我在一家著名的巴伐利亚式农庄大厅——大世界的聚会地点，正巧赶上美国金融寡头在开会，遇到了许多知名且重要的经济界和金融界人士。这时，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传来一个大约20岁年轻人的声音。我认得他，他叫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他自诩为投机者，因为他不做其他生计，每天只是分析事件，然后在不同的交易所里做交易。我走近他，他不友善地说道：“是的，我也认得你。你就是那个‘老年时的我’。你是要问我，我在这里做什么吗？你难道看不到所有人都围坐在这里吗？哪怕我仔细听到一句话、一个信息，都可以给我带来财富。”

**我：**天啊！你被信息误导了，以为获取信息是多么重要。你没听说过我讲过：知道信息等于毁灭吗？

**他：**您是说这些先生们什么都不懂吗？

**我：**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知道所有的数据，却一点也不清楚当今美国是否处于经济衰退之中。有个人说要增加货币供应，另一个人却说要减少货币供应。有人主张加税，另一些人则鼓吹赤字财政。有人预见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存在着巨大风险，也有人对此

嗤之以鼻。如果他们连正确判断现状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够预见未来呢？

他：我早说了吧，您已经落伍了。您难道不知道，今天的人都是用计算机做分析的吗？

我：你以为一切都是精确科学。学术界举办的这场大会就是一个错误。国民经济和金融学不仅仅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与其参加这种象牙塔学术大会，还不如待在家里。

他：为什么您居然是这样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我不是悲观主义者。积累了70年经验，我变得更有辨别力了。以前我也是直接冲着赚钱目的而去，现在我反向操作，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提示。而现在这些大人物的说法几乎正好和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背道而驰。英国财政部部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不是曾在议会上说英镑会贬值吗？结果14天之后，同样还是这位财政部部长，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没有任何道歉，他仍被视为一位完美的英国绅士。在德国也存在货币问题上的难解之谜，众说纷纭。而联邦银行<sup>[1]</sup>似乎认为证券市场玩家暂时还无足轻重。如果他们聘请证券投机者担任顾问，就可以和操纵德国马克的人玩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了。能把骗子改造成最好的警察吗？

他：难道就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我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相反，人们必须非常了解情况，而不只是知道数据和所有从书本和电脑中得到的东西。人们应该了解整体情况，并能够解读信息。人们必须充满热情，富有经验，要把经验和洞见结合起来。如果仔细读过我写的书，人们就可以……

他：明白了。也许我在60岁时会像你一样聪明。

[1] 指当时的西德联邦中央银行。——译者注。

## 第1章 90%的行情来自心理因素

我表弟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定居美国，是经济学教授。他曾在德国求学，专攻经济心理学，著有《大众消费》《心理经济学》及《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直到今天，想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学者，都视其著作作为最基本的必读书。

大约在30年前，在《这就是股市》（Sila bourse m'etaitee）<sup>[1]</sup>出版后，我收到乔治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读完全书，并从中得到很多乐趣，也十分认同书中阐述的观点。但有一件事，他与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无论是股市中的群体心理反应，还是单一投资人的心理反应，都是不可预测的。但他却认为这是可以推测和预见的。他说：“今年夏天我会去巴黎和你解释我的想法。”但遗憾的是，不久他便过世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问号。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确信群体心理是可以预见的呢？这对每一个投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深思熟虑之后，我得出结论：个人及大众的深层心理动机和反应，的确会在某种情况下变得难以预料。不过，对于大众心理反应的强弱程度和关键的时点，经验老到的股票投资者有时还是可以预料到的，不，不该说是“预料”，应该是猜测或者估计。

我要强调的是，我绝对没有高估心理学在股票交易所扮演的角色。股市的短期涨跌中有90%是受心理因素影响的。股市心理学是一门极具敏锐触觉的学问，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艺术了。股市中最常用到的说法有：或许、希望、可能、有这种可能、虽说、虽然如此、然而、我觉得、我在想、可是、似乎、这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想的、说的话，都语带保留，最后的发展结果也可能完全不同。

不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股市中，最不好的股票就是所谓的“概念股”，因为概念股的股价完全不跟随趋势运动。这种股票的波动震荡，表现的只不过是歇斯底里的股票专家或所谓的半吊子行家的反应，而这些人的想法往往说变就变。

很多人喜欢说，根本无法看懂现今的股市。我要说，股市要是能被看懂，就不叫股市了。股票玩家是在一池浑水中摸鱼，散布各种烟幕弹，池水就这样被他们自己搞得更混浊了。媒体则继续传播这种“股市智慧”，这么一来，报道及评论给出的消息完全混杂在了一起。往往是股价变动之后，股票玩家才急忙去找原因，然后再放个马后炮。

眼下有人说，股市行情会下跌，是因为失业率下降，失业率下降造成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利息升高。过几天，大家反过来又担心失业率攀升会成为经济衰退的征候，导致出现过高的贸易赤字。

同样的消息，可以一下把它解释为利多，一下又将其视为利空。出口量过大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大家把美元走稳视为好事，因为这样的话美联储就不必提高利率了，这样说或许也不无道理；但过两天，大家又把美元走稳说成负面因素。一会是这样，一会是那样……要是专家都这样朝秦暮楚，大众真的就无所适从了。

我不得不承认，有时连我也猜不透，大众对某个事件、一则金融消息或者一条小道传闻，到底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反应。因为一条新闻消息对经济的发展会有何种影响、对自己的投资是好是坏、对股市整体是利是弊，基本上交易者自己都无从知道。股市往往像个酒鬼，听到好消息哭，听到坏消息笑。为了说清楚讲明白，我有必要引用一个外汇投资的例子。

20世纪70年代，在美元问题上，美国人曾出现过这样的心理情结。当时阿拉伯国家共同成立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美国人相信这个组织的成立将会导致原油价格持续攀升。每当价格上涨时，美元投机者便急呼：“如此一来，将造成通货膨胀，对美元行情亦十分不利。”同时他们会做空美元，因此，美元汇率也就应声而跌。

而当时我在《资本》杂志的专栏中写道：“这样的市场反应真是荒谬。”原油价格上涨，表示油价的相对价格提高。一些工业大国如日本、法国或是德国，对美元的需求便会增加。而这应视为利好，可是投资人却反其道而行，让美元一再贬值。

到了80年代，美元创了历史新低，这时有人对这样的形势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们说这是因为全球石油消耗量下降，而原油价格相对也就下跌了。这一次的解读总算和后来的实际情况吻合了，美元后来因发达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减少而贬值。

在20世纪70年代，每次“石油危机”的出现都会引发这样的预测：石油价格上涨，代表出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手头会有较多美元，它们可以用美元从发达工业国家购买货物。从这方面来看，石油危机有助于推动经济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原油及燃料费用大幅提高会导致其他消费支出紧缩，而这又意味着石油危机将严重危害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对行情发展的解读总是事后才出现，总是在股市及外汇行情上下波动之后，才有数不清的股票玩家、投资顾问和分析师用完全相反的理由来解释行情发展，也就是“行情造就了新闻报道，而非新闻报道造就行情”。

媒体的报道对市场行情的发展并无决定性的影响，但股票投资人也可能毫无缘由地对行情持悲观态度。就像我的老朋友格林一样，格林是移居美国的维也纳人，有一次他的同事问他：“你在美国过得开心吗？”他抑郁地答道：“虽然开心，但并不幸福。”对股票行情的悲观源自股票玩家本身的性格。他们不太用脑袋思考，也很少明白股市中的重大事件所代表的真正含义。他们只想做个交易，干脆利落地

赚一笔快钱，并在赌局中生存下来。天哪！这些人的行为完全是冲动的表现。

如果多数人在股市发生重大事件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操作，股市很容易就陷入不稳定的市况。这时，主观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投资者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是否将所有钱投入股市？还是他们留有一手？当在股票玩家主导的市场上发生了某个特定事件（比如政治事件）时，市场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此时公众可能会回避参与这个市场。

情况经常是这样的：股价上涨时，公司的营业收入会有很好的表现。分析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股市表现将趋于平稳，因为好的经营表现会让投资大众对这只股票保持高度关注。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简直大错特错。因为在行情上涨时，企业营业收入越高，就会有越多股票从“强手”一方转移到“弱手”一方，也就是从意志坚定的人的手中，转到了意志薄弱的人的手中。一旦所有股票为意志薄弱之人所持有，离市场下跌肯定就不远了。

公众的心理反应强度支持了我对市场的“技术形态”的解释，我在“证券投资心理学”第一课就提到了这一点。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在这里大讲特讲“股市心理及经济心理学”是多么狂妄的一件事。但这是因为我不仅专门研究经济学，还致

力于心理学研究。凭借多年来在股海迷失时缴纳学费换来的股票操作经验，我喜欢把心理学也加入进来。幸运的是，我总能在进行客观分析时完全秉持中立态度。

非但如此，我还非常重视3个要素：思考、逻辑、准确性。当我在筹划一个投机方案时，我的思考过程完全没有错误，就像在演奏音乐时，没有一个曲调走音。

但并非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注重思考。不久前，在达姆施塔特技术学院，我对着上千名学生发表演说。在提问将要结束时，一名学生提出了一个有趣又犀利的问题：“如果必须反复思考这么多问题，那到底还值不值得加入炒股一族？”他大概认为只要定期阅读股市行情，就能成为杰出的股票操盘手了。

学者们常常在背地里嘲笑我的看法和论点，但还是会仔细倾听我的演说，更不用说成千上万参加研讨会的支持者，或是数不清的听过我演讲的学生了。学者们也许把我当成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蹩脚江湖郎中。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诬蔑算得上什么呢？就算说我是个江湖老郎中也无所谓。就我个人来说，我宁愿是一个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股票玩家，是一个70岁高龄还在70个交易所游荡的炒股老头，也不愿做一个训练有素却不曾在证券交易所哪怕待过24小时的经济学家。

康茨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当着学生的面骂我是江湖骗子。我向他下了战书，要和他公开辩论一个主题，看看我们谁更懂经济和金融，但迄今为止他仍未对我的挑战做出回应。

因此，我现在仍要向读者传授我积累下的丰富经验，以及结合人类心理和群体心理所归纳出的结论。这是一场气氛轻松活泼，像是在咖啡厅举办的讲座，而非枯燥的大学讲课，内容是我个人经历的生活小故事及回想到的股票玩家、狡猾的老狐狸等，全都与股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是我生活经验的全部。这些内容让我能看穿股市中所玩的心理战。我敢说在100次心理战中，至少有51次我都能够站在胜利的一方。

[1] 原为法文，意为“如果股市能说话”，德文版改为现名。

## 第2章 金钱的诱惑

萧伯纳曾经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积累起来就能发挥作用”。 “追求金钱是不是不道德的”也总成为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客观的结论，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金钱的诱惑和追求金钱的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很难找到对于金钱的诱惑的精准分析。为什么人会受到金钱的诱惑？金钱的数额多大才具有诱惑力呢？金钱的魅力无法精准测量，因为答案会因人而异。

很久以前维也纳人会这么说：“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百万富翁。他一定有10万盾资产。”而这在现代不再遥不可及，因为“百万富翁”不代表这个人一定拥有这么多钱。“百万富翁”以前是用来表示一个因为很有钱而得到社会尊重的人（现在大概也是这样）。此外“罗斯柴尔德”或“大富豪”也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我的朋友之中有一些人，只要口袋里有100马克，就觉得自己像个百万富翁，也有很多人对别人口袋里有多少钱非常感兴趣。这些人绞尽脑汁估算这个人以及那个人有多少财产，听到某个富翁的财产数目时也总是摇头叹息，脑子里不停地猜测某个人的身价或某件物品的价值。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金融记者打来的民意调查电话。她问：“科斯托拉尼先生，您可是经验丰富的股票专家。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您为何不是一个百万富翁？”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惊讶，但仍马上回答：“第一，你的问题不够具体。第二，你从何得知我不是百万富翁？难道我一定得让你查我的银行户头吗？不过，不论如何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向你借钱的。”

当我向别人询问某个熟识的朋友是否健康或工作如何时，得到的回答经常是：“噢！他有很多钱。”很多人羡慕别人拥有的财富。也有些人会迷失在自己拥有的财富里，他们会开心地抚摸着钞票，赞赏财富，让自己完全沉醉其中。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曾经说：“假如我有很多钱，我会把它们全部让给那些有钱人，因为他们是这么爱钱。”

我也认识一个人，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查看银行户头增加的余额，他说这么做能将无聊一扫而空。世上也有这样的人，虽然有能力强买很多漂亮又贵重的东西，却不这么做，因为他只要想到他有能力这么做，就感到很满足了；他感受到了金钱的光芒，就会觉得很幸福。我的另一个朋友，只要嘴巴里发出“钱”这个字的声音，同时手抚摸着牦牛皮制的钱包，就会觉得生活中的享受全都浓缩到支票簿里了，完全没有留意到自己不雅的姿态。还有人告诉我，每当点钱的时候，都会激起他的性欲。另一个人则更露骨地说，在股票投资损失很大时，他就会逃离交易所，直奔红灯区消遣一下。

幸好还有一些人会使用金钱来享受生活的乐趣，只看菜单是无法满足他们的，他们想实际品尝美味佳肴。

对很多人而言，金钱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金钱为他们招来朋友、伪君子、嫉妒者、马屁精在他们身旁打转。这些人完全沉迷于金钱的魔力，他们不仅想要得到物质生活的享受，也想拥有金钱带来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别人对他的臣服。

曾经拥有过很多财富的人更容易陷入金钱的诱惑而无法自拔。马奎斯·卡斯德兰（Marquis Boni de Castellane）曾是法国贵族，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当他不再是美国亿万富翁——安娜·古尔德（Anna Gould）的丈夫那一天起，他真的很难过。虽然他没有穷困到要去睡大马路，但是已不能再随手挥霍钱财了。他说：“直到破产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虚弱无力。”

理论上来说，金钱的真正诱惑力来自赌博。当赌注不是钱而是菜豆时，赌博本身就失去刺激感和紧张感了。金钱也可以是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补偿，如身体残障或是容貌不佳等。或者，若是卑微的家庭背景阻碍了某人社会地位的上升，这时，金钱便能够替代祖先的作用，给他一个显赫的背景。埃尔莎·麦克塞尔（Elsa Maxwell）因其爱尔兰血统，无法和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贵族们来往。但在美国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事业的成功却让她得以晋升为美国百万富豪。

之后，她便能和变穷了的贵族打成一片。这个刚出炉的百万富翁在公爵、伯爵间穿梭，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能和冷漠的美国富翁们平起平坐，同时身价百万的她也吸引了穷贵族来和她攀谈。

很多人喜欢花钱炫耀自己；有些人则绝口不谈钱，却喜欢让有关他的传闻越传越广、越传越夸张。总之，人类对金钱的反应，因人而异。

在爱情的世界里也是如此，金钱可以唤起一个女人恋爱的感觉。在有些女人的眼里，金钱代表着男人的成就。而一个成功的男人对女人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女人可以分享男人的财富时，女人会因为男人给予她荣华富贵而真心喜欢他。但是也有女人讨厌给她钱的男人，反而喜欢找她要钱的男人。对于很多人来说，金钱只是衡量成功的标尺，他们并非只对金钱本身感兴趣。我至今耳边仍回响着当年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旗下著名女星莉莉·达瓦斯（Lili Darvas）初到巴黎时对我说过的一番话：“现在我非常想证明自己的魅力，如果我走在大马路上，等候男人过来搭讪的话，我想知道，对于一位漂亮女人，男人们会开价多少钱！”她是想了解人们认为她这样的女人值多少钱。

金钱可以扭曲人们的想法到什么程度呢？以下对话可以稍做说明。一个熟人问道：“你听说了吗？我们的朋友迈尔去世了！”

“噢！这真是令人伤心！”另一个人回答道。

“他之前有什么？”<sup>[1]</sup>

“我估计，大概有200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得了什么病？”<sup>[2]</sup>

“也许还缺50万。”

“不，你还是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是问，他是怎么死的？”

“哦，明白了，原来你问这个！”

## 人不能缺钱

金钱的世界不是永远美好的，钱有种能量，能让人堕落，经常让人暴露出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我现在也许可以用中立态度来看待金钱，但以前并非一直如此。

在我年少时，父亲把贫穷潦倒的我从布达佩斯送到巴黎去学习股票投资技巧，当时我只带了维持基本生活开销的钱。但巴黎是一个大城市，当时甚至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城市真是不可思议，当夜幕低垂

时，它就像个超大型的夜间游乐场，到处可见琳琅满目的商品，空气中都弥漫着奢侈的气氛。

Paris! J' ai deux amours, monpays et Paris. [3]

来自盛产香蕉的安地列斯群岛的迷人女子约瑟芬·巴克尔 (Josephine Baker) 带我走进这首梦幻乐曲之中，令我终生难忘。巴黎的生活充满了奢靡、享受和聚会派对，我希望自己有机会坐上东方快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坐着自己的马车一样，度过迷人的夜晚。

当时我还不知道，如果没有开门的钥匙——金钱，这个梦幻般的世界是怎么也够不着的。而我口袋里的钱还差得老远。

这出大戏看上去相当迷人，但还不是全部。

来自蒙帕纳斯的藤田出现了，戴着玳瑁眼镜和黑色假发，他宠爱的模特琦琦陪着他，还有他们的朋友吉斯令、维尔泰和其他人围坐在一起闲聊。

优雅的女士们手里提着珑骧名包，流连在奥特伊，穿着名设计师普瓦雷专门设计的时装，争奇斗艳。获得过大侯爵奖的裁缝，在波罗涅自家游艇上接待和取悦着上流社会人士，通宵达旦地优游嬉戏。香榭丽舍大道上人流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让人不禁会联想到卓别林在

《镀金时代》里展示的美国和《巴格达窃贼》里的东方的情形。就像弗兰西斯·卡尔科的小说里写的，人们说着大家都听得明白的市井俗语，热闹地聚集在皮加勒区的酒吧间里。而另一个夜晚，男人们嘴里哼着莫利斯·舍瓦里埃新出的情歌，在马克西姆餐厅用晚餐，或者聚在韦伯咖啡馆里，闲聊着新出产的汽车或女星密斯丹盖的美腿。英国人把图凯地区的草坪称作Beschlag（装饰用的薄膜），而当地政府在考虑将街道名称和橱窗里的价格标签都翻译成英文。

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是闻到香味走进了一家西饼店，对我充满了诱惑。

在这个城市里，只要有钱，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对当时的我而言，钱比我现在看重的健康更重要，更不可或缺；追求金钱成了我生命的全部，增加财富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当人崇尚金钱时，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就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我认为除了金钱，其他事情都不再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钱更重要。有了钱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所以人一定要有钱。

我第一天到证券交易所上班时，有个亲切的老先生问我：“嘿！年轻人，我以前没见过你。你在这里做些什么？”

“我是亚历山大公司的见习生。”

“原来如此。”他接着说，“你的老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来告诉你股票是怎么回事吧。你别管这里的人说什么，也别管那些所谓的诀窍，你只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这里是傻瓜比较多，还是股票比较多。”

一直到现在，老先生的一番话仍让我受益匪浅，而我自己发明的股市理论也只有两个要素：供与求。

第一次到交易所令我既兴奋又紧张。这里就像一座大赌场，钱来钱往，只要集中注意力，就可以感觉到它，然后抓住它。按那位老先生的说法，一切应该都不难，只要够机灵，就可以跟上行情上涨的节奏，同时也能建立信心。“然后，到了月底，你就赚进一笔钱了。”老先生咧嘴微笑着说，拍了拍我的肩膀。

交易所里几百人来来往往，场面相当混乱。老实说，当时我真的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陌生的股票名称（其中甚至还有“十月革命”前的股票）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年轻的交易员似乎无处不在，他们总是匆忙地来回穿梭，手中还握着一张写满委托人需求的小纸条，像是在跳着不停转来转去的波尔卡舞，穿梭在不同的小包厢之间。他们总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经常会和别人撞在一起，然后又奔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在交易所的正中央，70个人围成一圈站在一起，他们即便在夏天也穿着深色西装。这群人是股票经纪公司的雇员，其中有人把胳膊靠在围栏上，而这个围栏就是用于把这些雇员和其他人隔开。

围栏外的人对着他们大叫：“我要卖！”“我要买！”这个嘈杂的空间似乎与世隔绝了。

其中有人跑到电话亭去汇报结果；有些人用手捂着嘴巴和旁边的人窃窃私语，好像在谈论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他人则是在黑色小记事本上写上密密麻麻的东西。

我倒没有被这紧张忙碌的气氛吓倒，越走进这一片新天地，我反而越能放松自己。每个人都在吹嘘说每次交易都能赚到钱，他的客户总能得到最好的建议。每个经理都在媒体面前洋洋自得地讲述自己的经验和成功之道，开头第一句话永远都是：“我早就说过了。”

虽然当时我还很年轻，也缺乏实际经验，但我已经知道：交易所里的傻瓜和骗子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们永远在假装自己是聪明绝顶的人。这些看法一直到现在仍然没变，变的是，现在的交易所已经不再那样喧闹、杂乱了。股票交易通过电话下单，投资人不必亲自去现场交易。在伦敦和巴黎，投资人只要坐在一台机器前，用键盘输入他想要交易的股票名称和价格，通过这台机器就可以知道目前的行情。

那时的作业方式毕竟无法与今天的国际水准相比，甚至连今天的一丁点儿都不如，却是我们60年前在交易所时使用的东西。那时候，股票交易委托人需要像课堂上的小学生一样，端正地坐在计算机前。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负责人站在前方讲台上逐一唱名每一只股票，在底下的委托人则依股票名称输入交易价格。之后计算机根据每只股票的供需情况，进行交易确认。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了，知道在这个环境里的人都是有自信的资本家。音乐、绘画、艺术甚至是一顿好吃的晚餐，对他们而言一点也不重要，他们唯一想要的只是钱。巴黎的新工作也让我成为追求物质享受的拜金主义者。此外，因为我特别机灵（或者说是狡猾），很快地，我做了一件视钱如命的人都会做的事，那就是预测股市的下跌，这和一大群高傲的专业股票顾问有关。我非常讨厌这群大言不惭的家伙，讨厌到要故意和他们唱反调。于是，当他们看涨行情时，我却偏要做空。

出乎意料的是，我投资的股票收益都还不错。因为，当时碰巧发生了一次大危机，经济萧条加上萎靡不振的股票行情，股市一路下滑。我每天都会平仓，结算所有投资，以确定实际的获利金额。之后，我仍坚持看跌行情，而我的投资收益一天比一天高。

我认为这次成功纯粹是个意外，因为我并不是根据分析、判断而看跌的，看空行情的理由完全出自我个人的因素。当时的我根本一点

也不懂何谓“客观的投资依据”，我也不是对经济抱有特别悲观的态度。不管股价涨或跌，我想要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钱。

直到1932年的伊瓦尔·克罗伊格破产事件，我才发觉投机做空是非常可耻且不道德的投资行为。做空操作获得的收益全部来自他人的损失。

良心告诉我，人不能靠着做空赚钱，因为即使成功，也只有我一人快乐，而别人将会很惨，非常悲惨。从此，我决定不再利用股市暴跌来投机赚钱，我要随着上升的景气进行投机，进而获利。我要很谦虚并知足地说，改变投机方式，我仍会比别人多赚一点。而且，这次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上千人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虽然一样是成功的投资，但在一片繁荣景气的愉悦气氛中获利，真的让人感觉舒服多了。

## “国家敌人” 科斯托拉尼

一位成功的投资顾问，性格必定有点高傲，甚至有鄙视其他投资大众的倾向，这样做是为了令自己保持清醒，不因他人一时的情绪波动而改变自己对股市走势的看法。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表现得太过骄傲。但就连我有时也无法控制自己，可能会挖苦、嘲讽周围的人。不过，和年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根本不能算是自傲。

1930年秋天，一场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上演，这就是股市历史上相当著名的伍斯特里克破产事件。巴黎股市因此跳空，不断向下探底，是历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崩盘。

阿尔伯特·伍斯特里克（Albert Oustric）是当时公认的金融泰斗，是法国一位在经济领域涉及广泛，同时也相当成功的金融巨子。无论在沙龙还是证券交易所，人们总是不断谈论他的成就及其广泛、多元的投资事业，从标致汽车、地毯、制鞋到玻利维亚银矿和意大利的人造丝，他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现今的企业集团。

伍斯特里克掌握了这项“技能”并处理得井井有条。为了处理好这么多公司的财务，他另外成立了控股公司“法国控股”（简称Holfra）。事实上，控股公司是伍斯特里克控制公司股价的一个工具，他利用融资大量买进自家股票，拉动股价大涨。他的做法让大多数专业经理人认为，其公司股价已经超过市值，进而认为其股票适合做空，并开始融券做空该股，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伍斯特里克的举动就是为了引诱像我一样的投机散户对他公司的股票进行融券交易。到了月底，伍斯特里克已经将所有自家的股票全部收购了，融券交易因而无法交割，这时伍斯特里克便能操控股价的涨跌，做空的融券交易最后面临爆仓。

唯有实际掌握大量现金的金融家才能成功施展这样的诡计，但伍斯特里克用来拉抬股价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和股市专业投资经理的投资，也就是说他的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到了第二天，可能这些资金供应方就没有办法再拿出更多的钱了。因此，小小的贷款收缩就可以轻易将伍斯特里克的多米诺骨牌推倒，而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当时，我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做空投机者，心里非常厌恶有这种欺骗行为的资本家。我很清楚他的投机手法一定会失败，事情的发展也正如我所料。我在股价180时做空，融券价格是170。后来股票跌停，我根本无法挂单平仓。当晚我无法入睡，但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其他机会从股市中把钱赚回来。

结果这家公司宣告破产，股票停止交易，我手上所持的股票被赎回，每股赚了3法郎。即使是正常的股票投资也很少有这样高的获利。这个破产事件除了造成伍斯特里克集团瓦解，还连带了大约15家公司倒闭，受害者包括股市专业投资经理、证券公司及各种形式的债权人——客户、客户的朋友和股东。连两家声誉良好的老银行（一家是布伦的费舍尔银行，另一家历史更悠久的银行是1776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也受其牵累而关门大吉。

倒闭事件的连锁反应也拖累了英国，英镑在不同的外汇市场同时贬值。原因是法国的信贷机构担心民众会挤提户头里的存款，为预先

准备而大量抛售英镑兑换法郎。

所幸的是，我成功地躲开了这场危机，因此不免有些暗自得意，那时我变得骄傲，甚至狂妄自大起来。我戴了黑色领结，以示我对股市大跌的“吊唁”之情。由于伍斯特里克那时是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圈内人唯其马首是瞻，我的举动激怒了众人，所有人认为我从中赚钱的做法正是造成他们破产的一个原因。

以前，我习惯到交易所旁的一家餐厅，坐在固定的位置上“观察”。许多在证券经纪公司上班、为我经办过交易的朋友及同事在这里举办过一场又一场的讲座。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没有证券交易许可证，这在过去并不成为问题。但有一天，我竟然被挡在了交易所门外。他们说，因怀疑有外籍人士想投机炒作法国养老金来搞垮法国经济，所以禁止外国人进入证券交易所。

就是这种偏执的大法国主义给了一个法裔犹太人指控我的机会，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叫依斯雷尔（Israel），他经常坐在我的隔壁桌，偷听别人称赞我。他注意到别人对我的尊敬，同时也希望过上和我一样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指控我投机买卖法国养老金证券和国债。

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走出餐厅时，警察逮捕了我。在交易所隔壁的警察局，我像重刑犯一样被采集指纹，接受长时间的讯问。第二

天，国际事务部门的警察搜查了我位于巴黎公园对面的个人工作室。接下来就是严密监控我的通信记录及所有交易通知书。晚上我还从收音机里听到：“警方搜查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住处，这个匈牙利人涉嫌对国债进行投机炒作，这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两个星期后，我再度被传唤。在市政府，我收到一张由巴黎警察厅厅长签发的驱逐令，上面写道：“限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于48小时内离境。”虽然我非常懊恼自己必须离开喜爱的巴黎，但我问心无愧。我承认我在伍斯特里克事件中的确有投机炒作行为，但绝对没有炒作过法国养老金。基于投资技术分析方面的考虑，我不可能那么做。

我曾服务过的证券经纪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好友的阿德里安·培奎（Adrien Perquel）想请前司法部长阿纳托尔·德蒙奇（Anatole deMonzie）帮我。德蒙奇和阿德里安的父亲是密友，两人都崇尚自由，对大法国主义也都持保留的态度。20年来，这位杰出和有修养的德蒙奇先生，对匈牙利人多有扶助，曾当选议员，并多次获委任部长职务。他在1926年担任赫里欧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在议会发表演讲，说过一句被人们广为传播的话：先生们，国库是空的……

德蒙奇马上在办公室约见了，我向他解释了目前的窘境，并向他保证我绝对是无辜的。他承诺会重新调阅档案。第二天，我已打包好行李，正要动身前往车站，打算离开巴黎前往比利时。就在动身的

前一刻，电话铃响了，德蒙奇的秘书告诉我：“请您不要走，德蒙奇先生要我转告您，他已拿到延后14天执行驱逐令的许可文件。”

这位前司法部长相信他们对我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如果要他正式对警察机关提出质疑，又会让他相当为难，因为这等于是侮辱巴黎警察厅厅长。这位警察厅厅长是法西斯主义者，后来和希特勒勾结。我的驱逐令从此便一次次地被延后执行。转眼间，我又在巴黎住了一年，但始终没有拿到一张正式的居留许可证。

后来我终于得到平反，之前的案底也销毁了。另外，我还收到一张证券交易许可证，直到今天，这份证件都保存完好。它提醒我，过分高傲可能会招致灾祸。和其他具有启发性的故事相同，这场乌龙事件也有一个结尾。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后，我从美国返回巴黎，在戴高乐将军的推荐下，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我当然又在股票市场重新活跃起来。有一天我在交易所遇见当初诬告我的依斯雷尔先生。我立刻察觉到他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我衣领上的红色荣誉骑士勋章。他是法裔犹太人，有着法国人激进的爱国情操，也有犹太人对反犹太主义的特殊心理情结。尤其是遭希特勒迫害、逃出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更是强硬。

令他更为恼怒的是，我不但在巴黎，而且在股票金融界中甚至比专家还要受欢迎。尽管如此，他仍然忍不住要求我教他一些股票操作的技巧：“您说说看，现在应该买股票还是卖股票？”“如您所知，我是个乐天派。您手上的股票就继续留着吧！”我撂下这句话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处呆立着。

也许由于伤感，后来我又买了几张Holfra的股票，大约是每股10芬尼，没想到这是我做过的投资中获利最棒的一次。不久前，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一场旧股票拍卖会上，这些具有纪念价值的Holfra旧股票以每张200马克成交。我还应买主要求在上面签了名，这件事让我感到相当自豪。

唯有对股市行情，我至今仍保持着某种变相的高傲，尤其是当行情对我不利时，我根本看也不看它们一眼，也不屑听到和行情有关的事情。

但是我非常关注全球有关外交、财税、利率政策及工商业界的重大事件。大胆分析重要事件是我的拿手绝活，但是这些事件不一定如人所料地总是反应在股市行情上。股市行情的反应经常会出现短暂的反常，总是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按照我的预期发展。

而且，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俗话说：“我不会为不知道的事情激动。”因此，我不会去关注出现了偏差的股市行情，因为

我知道，得到的回答在我经过音乐训练的双耳里，听起来会像是变调的乐曲。

当股市未来趋势对我不利时，我选择在这纷乱繁杂的市场中，满怀希望地等待。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悲观的时候，只是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糟糕的状况了。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巴黎股市从事很大额的信用交易了，股市的每个细微波动对我都会造成巨额的获利或损失。我有个为我工作了10年的老秘书，他非常了解我的缺点和弱点。每天他都替我在交易所做买卖，因为就像我常说的：真正的职业投资家不可以在交易所里露面。我的秘书非常熟悉我的习惯，他知道，当股市低迷时绝不可以打搅我睡午觉，而且我睡醒之后，也不能在我面前提到任何有关股市的事。

直到今天，我一直对巴黎股市不太感兴趣，而且同时在美国华尔街有投资，和大约10家证券经纪公司保持业务往来。在这里我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习惯：禁止任何人告诉我有关股市的坏消息。如果有人胆敢告诉我不开心的消息，我就不会再委托他进行交易。那个告诉我股市崩盘的家伙活该永远失去我这个客户（如果不巧碰到我在欣赏音乐的话，后果会更严重）。

## 金钱胜过一切话语

长时间身处残酷的交易场中，我早就领悟出“钱不会变臭”的道理。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便在全世界不同的股市中，学习如何轻松赚大钱。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有了罪恶感，因为股票专家可能在转眼间就能轻松进场获利，一次投资的收益可能和学者、教授或医生的年收入差不多。不同的是，学者、教授和医生必须长年钻研学问，这让我感到不安。

我还记得，“二战”之前，法国全面武装备战，当时身为外国人的我，处境颇为尴尬，和我岁数一样大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兵营里，我则坐着看股市行情。虽然绝大部分投资人都在服兵役，但股市反而在上涨。鉴于之前的伍斯特里克事件，我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尽力避免激怒周围的人。我是第一个放弃烟斗、选择辛辣的哈瓦那雪茄（富裕的象征）的人。在酒店吃饭时，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会选择角落的位置。

在当时，我想再谈论股市可能会激怒人们，于是我选择做一件以前就想做的事——谈论绘画、艺术、美食、音乐等。但我还是原来的那个股票专家，人们想和我谈论的话题还是钱。

我一位最好的朋友，来自布达佩斯的雅努斯（后面我还会再说到他），曾经是我在里维埃拉的常客。他对于优秀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化非常熟稔。为了让他开心，我邀请过法国作家、龚古尔奖获奖者、文学评论家和美国文学教授来做客。为此雅努斯还激动地准备和他们

进行一天的思想交流。可惜老天不帮忙，这些客人不断向我发问，问的都是电力、石油股，黄金价格和资本市场的事情。

所以，对于好客的女士，我有一个提醒：在您招待作家、艺术家或其他文人墨客时，最好别邀请我参加！我在场会把整个文化气氛搞糟的……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时被问道：“金钱对您而言，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我得这么说：我一点也不为金钱着迷。我至今还记得本·琼森和史蒂芬·茨威格的著名剧本《福尔蓬奈》的对白。在剧中，来自威尼斯的吝啬鬼被驱逐，聪明且热爱生活的莫斯卡·福尔蓬奈继承了他的房子和全部财富。面对这所大宅，他大声宣告：把围墙拆掉，把门拆掉！让空气、阳光和人们进来！它仍然散发着恐惧气息，散发着贪婪和邪恶的气息。再也不许提金钱这码事了！我们现在要尽情享受生活，要大吃大喝，嘲笑那些傻瓜，特别是那些金钱傻瓜！来吧！要快乐！要音乐！音乐！

当然，人为了拥有独立和自由，会需要钱；为了享受舒适生活，也需要钱。我的老朋友厄恩斯特·门泽尔（Ernst Menzer），虽然脑子已不太清楚，但他说了句很有道理的话：“钱对一个年轻人重不重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上了年纪之后，钱可以带来满足感和安全感。”

我很少奢侈浪费，我买的东西都还保留着。50年前我在卡普西纳大道的西摩商场买了两打短袜，到现在都还在穿。它们的质量还是那么棒，在其他地方买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我唯一的奢侈就是收藏，尤其是收藏贵重书籍。不久前，世界上第一本谈论股票的书《混乱中的混乱》要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这本书我已经找了25年。拍卖会的目录上注明这本书起价为2000英镑，我听从了一位古玩估价商的建议，将预算定在5000英镑。根据他的看法，这个价钱一定能中标。但没想到一个日本人竟以我预算的4倍价格买走那本书。很快地，这本书的第2版又出现在慕尼黑一个由旧书商举办的拍卖会上。我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同意以3000马克成交，这个数字仍然超出了我的预算，但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花这么多钱买一本小书，在别人眼里已经是浪费的行为了。

尽管如此，对于真正的收藏家而言，搜集古书、名画或是邮票，纯粹是一种投资，因为收藏家总是在估算收藏品的价值。无论如何，收藏是一种最好的投资方式，尤其是在把收藏物当作一项遗产，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时候。

## 欠债人与乞丐

有很多对于理财的偏见广为流传，比如很久以前就有人说女人不擅长理财。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女人，不但能将家务事料理得非常妥当，连家庭支出的预算也掌控得非常好。如果一个家庭里，男人负责赚钱，女人负责持家，如此搭配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我的父亲经常购买精美的礼物送给我母亲，但每次总是换来母亲对他奢侈浪费的指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回答道，“等我真的买了昂贵的奢侈品再骂吧！”

但如果情况相反，男人节俭，女人花钱不眨眼，就有可能导致家庭悲剧了。我在朋友和自己的家族里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这里讲一个过去传下来的笑话。格林在咖啡馆里抱怨道：“真可怕！我太太到底需要多少钱啊，老是找我要钱！”“她需要钱干什么用？”别人问他。“不知道啊。”格林答道，“我一分钱都不给她！”

对于当今年轻人的抱怨也许就像这个世界一般历史悠久。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和他们的父母亲一样苛求，他们在富裕的生活环境里长大，没有经历过父母过去的困难生活，有些人甚至还非常自私。这种情况当然不好，他们以后会吃到苦头。但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谦虚和节俭不是最大的美德。我从中看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年轻人贪图方便和懒惰，不仅用电脑做计算，而且依赖电脑代替自己思考……

“欠债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的观念从细心照料家庭、节俭的祖先们那里一代代传了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持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在德国。我认为这个观念现在只适合一种人，就是投资人，只有不欠钱的投资人才能毫无负担地按自己的想法投资。

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信用制度将会怎样？那样一来，所有产业就必须自行承担投资新业务的风险。连传统产业都必须接受新挑战，更不用说高科技产业。硅谷和其他的高新技术产业充满了奇迹和冒险，如果没有信用体系，就不敢迎接挑战，也可能无法继续经营。所以，现在的金融制度提供了很大的贷款额度，让投资人能放手在股市中创造奇迹。

贷款和债务不断增长，但是今天的情况与20年前大不一样了。货币购买力急剧下降，随着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债务人偿还贷款和债务的能力又会恢复。所以银行并不像格林那样焦虑，会派会计师去催促偿还延迟的一笔贷款。去催款的职员马上回来了。格林问：“喂，他还钱了吗？”“不如……”那个会计师答道。“什么叫‘不如……’？”格林继续追问。会计师说：“我想向您解释一下，那个借款人有一个儿子在读高级中学，以后会成为一名医生，然后会娶一位富家小姐为妻。在得到一笔丰厚的陪嫁后，他会帮他父亲还清债务的。”

门泽尔和我认识很久了，我真的喜欢他，熟络得可以直呼其名。他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乞丐，长相滑稽，体型矮小消瘦，非常聪明伶俐（后来他碰到一位电影导演，但是他没有在喜剧片里出演过任何角色，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可以演喜剧的）。可惜他把才华都用在乞讨上了。他的天分直追乞丐之王安东·库（Anton Kuh），比如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借1000马克。那位朋友只给了他500马克，他一把抓过这笔钱，接着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是你借给我500马克，还是我借给你500马克？”希特勒上台后，他逃亡美国避难，他的理由是“乞丐哪里都需要”。他符合希特勒定义的“渣滓”，不过他最好的主顾就是柏林犹太人，而他后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时常向我借钱，我不想和他老是为同一个问题争吵，所以最后还是借给他一笔钱付房租。但是3周过去，他又跑去向我的朋友借钱，回过头来却跟我说：“这个月的房租好不容易交了，下个月的马上又来了，我供不起这间房。”

我对他说：“别担心，你一定有办法付房租的。”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我现在连1芬尼也没有。”

我只得告诉他一则犹太人的老故事：贫穷的科恩在逾越节前夕去找他的有钱朋友格林，向他求助：“我没有钱买马佐。”<sup>[4]</sup>

“你一定可以吃到马佐的。”格林向他保证。

过了一段时间，科恩一直没有得到格林的消息。在逾越节的前两天，他又跑去找格林。“我已经说过了，你一定会吃到马佐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

但科恩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到了逾越节的前一天，为了买马佐过节，科恩只好拿太太的珠宝去典当。节后两人又碰面了。科恩不停地抱怨，格林的回答则是：“你干吗这么激动？你不是吃到马佐了吗？”

“您瞧，恩斯特先生，”我用这个故事回答了他的问题，确定他一定可以付房租。他只好拱手作揖：“您还是别再说这个科恩的故事了……也不用再说那个马佐了，科斯托拉尼先生，够了。”这个故事又发挥威力了，简直是无往不克。

后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发现门泽尔因为是被迫害的犹太人，所以可以向德国政府申请一笔赔偿金。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说：“我终于可以得到马佐了。”但我没有开玩笑的心情，我严肃地告诉他：“如果你不马上提出申请，我就不借给你房租了。”为避免他超过申请的期限，我把他拖到一位公证人面前，草拟了一份申请书。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来自属于德国文化的地区内，门泽尔来自匈牙利，曾经就读于莱辛堡的一所纺织学校，而且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肯定有申请赔偿的资格。

但行动还是太迟了，申请书因超过申请期限而被退回。除非申请者能提出文件，证明曾因精神疾病入院接受治疗而无法如期申请。我们商量后，认为这个方法成功的机会不高。看来，我得一直给他提供资金上的援助，直到我或他去世。

几个月后，在一间咖啡馆里，他走到我的桌前，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由巴黎精神病院开具的证明放在我面前，上面写着：“门泽尔先生曾因精神疾病在本院进行治疗。”我不禁要称赞他的聪明才智，我问他：“你是怎么弄到这份正式证明文件的？”“很简单！我真的入院治病了。”

原来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件事的共犯。在巴黎的匈牙利住宅区，经常举办为匈牙利难民募集善款的大型慈善舞会。我常常收到他们的邀请函，但从未出席过，因为我十分讨厌舞会中总有一些故作高雅的人到处说长道短、不怀好意。有一次我把邀请函转给门泽尔，要他在舞会中制造一点丑闻，做件逗人乐的怪事。

门泽尔立刻采取行动，他租了一件黑色晚礼服（租金当然是我付的），赶到舞会，先到自助餐区饱食一顿，却没有机会制造丑闻。两天后，他跑到一家服饰店找店长玛丹。玛丹是慈善舞会的筹办人，也是我讨厌的那群人的带头人。门泽尔告诉玛丹他是匈牙利难民，希望得到一些资助。但玛丹回绝了他，他们争吵起来。最后门泽尔大叫：“我要去向警方检举你，你以服装店作为掩护，经营色情交

易。”门泽尔的大吵大闹引起骚动，最后警察到场将他送往精神病院，他就真的在里面待了好几个月。

由于这件事，门泽尔现在每个月都用德国政府发放的赔偿金付房租。而且，德国政府也不曾要求收回这笔对门泽尔而言为数可观的赔偿金。我则利用这笔钱帮他买了些稳当的股票，存放在一家瑞士银行里。

虽然如此，门泽尔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身上的衣服像布袋，住的是租来的套房。但这一笔财产给了他很大的安全感。他从未提取过1芬尼，一直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一段时间后，钱就增加了很多。从某个角度来说，门泽尔的故事给股票玩家上了一课：欠债时要有耐心，安之若素。真正的投机高手要能像鳄鱼一样睁着眼睛睡觉。我确信门泽尔一定不知道自己的银行户头里有多少钱，我也是如此，我从不计算我所有户头的总金额，因为我不必对任何人负责，这是我自己的钱。

就在几周前，我又见到了他，他看上去已经十分衰老了。他请求我帮立一份遗嘱。他连匈牙利语都写不好，更不用说用法语或德语写了。所以就由他口授，我来写：“我过世后，所有财产给我的两个侄子……”（据他说，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家，门泽尔把他说成是“爱因斯坦第二”）等。他签上名，我把信折叠好，放进信封，贴上邮票。

“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朋友，我在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我问他，“不知道？我给您讲讲《强尼·史基基》（Gianni Schicchi），那个普契尼著名歌剧的桥段吧：

年老而富有的地主即将死去，全家人围在他的床前，都指望着得到他的遗产。在他过世后，亲戚们马上找出他的遗嘱。然而他们很失望：逝者把全部财产都捐给了修道院。真让人困惑不解。‘别生气，’最聪明的一个人，也就是强尼·史基基，对大家说道，‘我们先不要公开亲爱的叔叔过世的消息，我会假装是他，躺在他的床上，然后我们把牧师和公证人请来。我会最后立下遗嘱，让公证人记录下来。’

事情就照这个安排进行。在全体亲戚的见证下，他用颤巍巍的声调口授了遗嘱，他先是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说：‘我要将全部遗产赠送给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侄子强尼·史基基。’

现在，恩斯特先生，您该知道我在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吧？‘把我的所有财产赠给科斯托拉尼先生！’”这句话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在生活中很少会发生这种事，只有在戏剧中，我们才能看到。

虽然金钱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不能想象，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金钱会如何运转。卡尔·马克思曾有这样的梦想，在他之前，托马斯·莫

拉斯（Thomas Morus）曾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些是乌托邦，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需要金钱、资本和流动性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这样才能让世界欣欣向荣，让所有人过上越来越富裕的生活，穷人不会更穷，而有钱的人可以更富有。”他有许多让社会更加公平的想法，按照他的预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我钦佩马克思，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我很欣赏他的作品。他的文字是我最好的德文学习资料（也有人说其中一些文字是出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笔下。）

[1] 多意表达，也可以译为“是什么原因？”，这里是听者想到的是另一个意思。——译者注

[2] 多意表达，也可以译为“他还缺少什么？”——译者注

[3] 法文，意为“巴黎！我的两个最爱，我的祖国和巴黎”。

[4] 犹太人在斋戒期间吃的一种未经发酵的硬面包。

## 第3章 群众是无知的

在1987年全球股市危机发生后，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说：“股票市场里到处都是疯子。”虽然我不是每次都赞成政治经济学家出身的施密特的言论，但我必须承认，这次他说的和事实十分相符。

“群众是无知的。”这句话出自1895年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Psychologie der Massen）。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是群众的力量。即使在一群特别聪明、深思熟虑的人当中，这股力量仍然能够发挥作用。挑选100名高智商的人，让他们共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结果显示，一时的情绪冲动会影响他们所做的决定，使他们无法理智地思考。

假设有一位股票专家经过反复思考后，终于决定要在某一天早上卖出手上的股票。但当他走进交易所时，却又听到其他投资人对股市后势的乐观看法。就在这一瞬间，他会马上变卦，反而再次买进股票。

在美国股市，股票行情显示器经常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显示器显示股票市场所有交易的状况，即使没有上百万，也有数十万的投资人会依据显示的价格行情决定投资行动。股市上涨时，这些盯着

股票行情显示器的投资人会开始买股票，毫不犹豫地跳上这列正在行驶的列车。股票行情显示器显示的股市交易情况，可以反映出投资大众的投资心态。因此，对每一个投资人而言，股票行情显示器有说不出的魅力，吸引其跟随投资大众的步伐做出买卖决定。股票行情显示器就像是战场上的旗帜。只要旗帜高高飘扬，就会引导部队奋勇争先，旗帜倒下，恐慌便随之而来，人们便停止前进。失去了勇气，军队开始人心涣散和掉队。股市也莫不如此。

所以，在股市上涨阶段已获利的人要特别注意，旗帜是否还立在空中，是否有带领其他投资大众跟进的作用。依我之见，投资人可以利用市场技术分析，来评估某一事件对投资大众所产生的心理作用。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股市中、短期的涨跌有90%是受心理因素影响，而基本面则是左右股市长期表现的关键。

股市投资人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中、短期的股市走势，也就是说，股市的中、短期表现，要看股票是掌握在资金充裕且固执的投资人手中，还是掌握在犹豫、容易惊慌失措的投资人手中。

有一些投资专家可以从目前的经济状况看出未来的股市行情、利率及产业前景。但就短期而言，现时经济状况对此三者并无影响。请注意，股市会上涨的原因，是买方即使处在经济及心理的双重压力

下，仍然表现得比卖方强势。会影响股市行情的是投资大众对重大事情的反应，而非重大事件本身。

决定股市中期走势的重要因素，除了心理因素外，还有利率。利率或者资金流动性，决定了资本市场的资金处于供过于求，还是求过于供的状态。利率对于证券信用交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利率较低时，表示有较多的流动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可是，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展现，也就是“股市的中期走势”。

对长期走势而言，心理因素不再重要。如果IBM、西门子或奔驰汽车公司没有稳固的商业基本面，股价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了。这些企业集团的股价之所以这么高，和心理因素并无关联。但今天又有谁能够预测到，后天股票市场的气氛是忧虑的还是充满希望，投资人又会对股市有什么样的偏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会死去。”）产业景气的繁荣程度，决定了股票的表现及未来的收益率。能够预见某一产业数年后发展前景的人，便能从中大捞一笔。

我认为，决定股市走向的因素有两点，归根结底，其他因素都是这两点的延伸：

- （1）资金流通量与新上市股票之间的关系；
- （2）乐观或悲观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对未来趋势的评估）。

所有的重大事件，例如政治、经济或金融方面的新政策，不论是否会对目前股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都可以归纳为以上两点，并可借此分析未来的股市走向。

而我早就把这一理论转化为一个数学方程式，可以将其作为分析股市走向的基本公式。

$$T（趋势）=G（资金）+P（心理）$$

资金是指可以随时投入股市的流动资金。如果债券发行机构（指政府或公司商号）所定的债券利率很高，或者银行、金融机构将存款利率定得很高，那么愿意购买股票的人当然就会比较少。简单地说，资金这个变量完全取决于长期利率。

相较于资金变量，心理因素却是由许多不同的次要因素组成。假设出现发行股票的公司调低盈余及股息，或者政府宣布提高证券交易税等不利股市行情的做法，但这时投资大众却对未来行情走势乐观，那么，投资人就会对这些负面消息有较高的抗受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利因素对股市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因此，虽然出现了一些十分重大的负面的基本面消息，但P变量（心理因素）在此情况下仍会维持正值（+）。

即使公司营运方面发生重大事件，这样的分析结果也是成立的。例如罢工，只要投资人认为罢工对公司不构成影响，那么这家公司的

股价就不会因此而下跌。

对股票经纪人而言，战争或和平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资大众对这一事实的心理反应。

股票市盈率（美国人的说法）的评估也纯粹是一项心理变量。假设某一股票的市盈率是15倍，市场分析师认为这个数字过低，那么他会说这只股票被低估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市盈率15倍太高了。

我不想说这些分析师做的评估根本就是错的，更何况投资人也不可能从他们的评估中看出股市的后市发展。所谓的“股价过高”或“股价过低”不过是做比较的结果，并非像数学公式一样可以算出标准答案。所以，我不禁要偷偷嘲笑这些分析师，他们总是将市盈率奉为判断股价高低的重要依据而迷失其中。因此，广义地说，分析师的评论当然也算是分析行情走势时的一项心理因素。

那些总是把市盈率当作选股准则的人，一定不会投资IBM、戴姆勒-奔驰或其他有潜力的股票，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股票之前的市盈率总是太高了。

尤其是分析处于亏损状态的公司时，这样的行情分析法更显得偏颇而不知变通。依照分析师的说法，投资人根本不该碰这种公司的股票，因为它们的市盈率全部都是负的。但是，我投资过的最赚钱的股

票却往往都是这种公司的股票。当我买进股票的时候，这些公司都处于经营亏损状态。可是，当这些公司的业绩重新回到盈利阶段时，股票也会同时往上飙涨。

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恢复期间，美国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的股票遭受重创。我做的投机是基于：我猜想美国政府不会看着传统企业克莱斯勒袖手不管的。我认为经济会复苏，对于汽车的需求会非常大。在我的记忆中，我曾做过最好的一笔投机生意：1946年，我在意大利买进了汽车制造商Isotta-Fraschini股票，这曾经是一个大品牌，当时是根据心理分析和经济形势买入的，最终大赚了10倍。我在克莱斯勒股票上也收获了丰硕成果：以5美元买进，在股价上涨到105美元才卖出兑现收益。

股市逻辑和我们的日常逻辑是不一样的。

你得领悟！由一作十，二任其去，随即得三，你则富足。将四失去！由五与六（女巫如是说）而得七与八，如此完成了：而九即是一，而十是零号。这是女巫的九九乘法表！

——J. W. 歌德，《浮士德》

我认为，投资人不应该将一般的数学逻辑套用在股票市场上，股市行情不是用一把尺就能测量出来的，股市的未来走势也不是用数学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在股市中，我只用一个数学理论，为了解释

清偿，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有个老朋友来拜访我，虽然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股票专家，但不知为何却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问我：“您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最近发生的不寻常现象？”

他接着说：“我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金融市场做股票、债券及期货的投资。这些交易市场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我是这样操作的：买进南非的矿产、美国汽车股，做空法国国债和英国银行股，同时，我看涨利率，也做空燕麦以及可可豆，最后是买进原油价格。您知道的，这些市场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关联性。但是它们的走势，不是全对我有利，就是全对我不利。行情可能和我们预期的一样，但也有可能是原本该跌的却涨了，该涨的反倒跌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美国汽车股和可可豆行情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伦敦的银行股和温尼伯的燕麦行情又有什么关联。我快要发疯了，一夜之间，我所有的投资全部大乱。有时行情走势完全合乎我的预期，但有时却又大唱反调，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神秘力量？”

“好吧。”我发觉，很多投资人都会有此类错误的想法。现在，让我来解答这个疑问：“这种股票会在一瞬间暴跌，跌到谷底。我想，你们不外乎是用公司资产负债表、市盈率的高低、分配股息的多少来决定投资策略。在大宗商品市场中，你们必定是先看产量及消费数量方面的统计结果，以及相关的贸易条件和国内外有关的政策。从这些资料中，你们也许会赫然发现，在一段时期，股价表现的反应似

乎比较慢。也就是这样，你们才会认为行情走势根本不符合预期。这时请你们要有耐心，这些股票的价格会再度攀升的，于是行情的发展也就符合所谓的‘逻辑’了。你们一定知道‘二乘二等于五减一’。这就是我的信念。在生活中或操作股票时，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所有事物都依据事实而发生或存在。经验告诉我们：一定可以达成目标，只是中间的路程绝对不是一条直线。”

我的股市数学理论听起来就像玄学，但在其他的生活领域，如宗教或艺术中，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像音乐，把它化为最小的元素，旋律就是由优柔和紧凑的音符组合而成的。

我进一步向那位朋友解释：“突然间，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曲线之中。为何股价会跌到这么低？这个问题有上千种答案。”

股票行情如果真的符合逻辑，那么一切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根本无法预测时间点，这一点会让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而所得的结论甚至还有可能是背道而驰的。昨日还很稳定的状况，今天可能就诡谲多变。但如果投资策略的根本条件没有产生变化，那么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人们必须在转眼间对混乱的局势做出正确判断，也就是要能看出一些征兆。如果不了解基本面，情况会很糟糕，没有什么会比这种情况更加讨厌和危险的了，因为这时逻辑也帮不上忙。

人们必须了解这种状况。如果对行情走势所下的结论和现实的情况暂时有出入，也不能气馁，要坚持下去。但如果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战争或和平的开始，政治、经济以及金融方面的重大变革，政权轮替等，这时就必须承受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万不得已时，还是得止损认赔，并卖出手上表现还不错的股票。

对于朋友的迷惑，我的解答是：“所有流动资金都和您一样，都在不断寻找投资理财的机会，以创造更大的回报，在针对行情发展做出逻辑推理之后，就会进行投资。这时不单单是您，而是上千个人和您一起进行同样的投资操作，交易相同的金融产品，甚至是以同样的买价或卖价进行交易，所以就会发生当您买进时，市场总是呈现超买状态，而您做空时，市场则呈现超卖状态。

“您刚才告诉我说想买一些石油股。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石油股，目前正等待着行情大涨。但是当这些股票因基本面而开始上涨时，股票玩家却因为想马上获利而出售手上的股票。如此一来，股票的上涨幅度便是有限的，甚至只能持平。同时因为股票并没有如预期大涨，其他投资者也变得急躁起来，决定开始抛售股票。”

所以，投资人决定投资策略时所依据的利好的基本面情况，有可能与技术面相互抵消，这就是投资人无法理解的有时候明明是利多格局，而股市行情却没有做出积极反应的原因。实际上，平时股市行情

的高低起伏，只不过反映了股票买卖供需关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表现出股票的真正价值。所以不管如何，只要市场供应大量股票，行情便会下跌。

这一说法完全符合逻辑，就像我们说在利率可能调高的情况下，石油股的股价会往上飙涨一样合乎逻辑。但是，当股票的买卖不单是出于慎重的思考时，技术面的操作甚至比基本面的影响还要大。因此，股价的波动其实反映了股票供需力量的博弈。

把某一交易日的全部买卖委托单拿来，看看投资人是出于哪些动机而决定下单，这样的研究应该会非常有趣。

比如，第一个人迈尔先生卖股票的理由是第二天他有一张汇票要兑现，第二个人是因想购买一套房子，第三个人则是女儿即将结婚需要一笔钱做嫁妆，第四个人卖股票是想等股价下跌后再低位重新买入。而那么第五个人舒兹先生为何在这一天买股票呢？因为他刚卖了一栋房子，手头上有多余的现金可以用；或者是因为他在股价高涨时已经把股票卖掉了，现在想逢低买进。

这些买卖股票的原因其实是十分荒谬的。我们假设股价已经到达投资者认为的相对高点，那么，这时投资人就处于危险之中了，因为这么高的股价已经无法对投资大众产生像之前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场内只剩下真正有购买意愿的投资人和已经买了股票的人，后者正等待

历史最高价位出现，届时卖掉股票以求获利最多。这时，所有人都在准备退出股票市场。不论之前预测的行情走势是已经得到事实的验证，还是刚要开始，利空行情已锐不可当。

以上的推理过程也可以用于完全相反的状况。例如，某家公司出现财务困难，我们推断其公司股价应该会持续跳空下跌。接下来，行情便开始下跌，跌至投资人认为合理的低点，之后就开始维持在某一个价格水平。即使仍然有负面消息继续传出，但股价已不再往下探底。

在股市用语里，称这种现象为“既成事实效应”（fait accompli）。这个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很多人在之前就已经把这只股票卖光了。另外，还有一些投资人仍然愿意持有此种股票，是因为他们能够接受这家公司业务衰退的事实，对手中的股票另有打算。早已进行大规模融券的空头股票玩家，看到他们的预测完全实现了，为了确保目前的获利，开始回补空头仓位，这一举动会带动股市上涨。我曾有好几次在不同情形下经历过类似的现象。表现很差的债券或因高额负债快要倒闭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其行情在深跌之前，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保持在相对高位上。

“既成事实效应”在股市行情走势中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假设，现在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很多投资人开始卖股票，但宣战当天的股市行情却有可能违反所有人的预期，在一瞬间开始往上走。1939年

战争开始时，在美洲或欧洲的任何一個交易市场，都是这样的走势。这些都是技术面的分析。

当时，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应付一场严重的金融灾难的准备，而且认为所有银行都会关闭，股票交易市场及期货市场也一样。同时，我也准备好面对更严格的外汇交易规定。周末假期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过去了。星期一，终于开战了。我是如此惊慌失措，居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都忘记了，只得去打长途电话。

走到街上，我非常惊讶，发现银行、股票交易所，甚至期货交易所居然还在继续营业，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最令我讶异的莫过于股市的表现，股市行情由跌转升，且持续上涨了6个月之久。这就是“既成事实效应”的力量，当每个人都预测股市崩盘时，它却反其道而行。

这让我联想到殡葬仪式后的一个特殊现象，送葬的亲友在亲人下葬后，由墓地动身前往餐馆吃饭。几杯酒下肚，亲友们的脸上开始展露笑容，人们说话也越来越大声，越来越高兴。也许他们等候这场死亡的来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病人在饱受病魔折磨后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对亲友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和安慰。

所以，在战争期间，如果投资人认为和平将近，那么他们就会开始买股票，于是股市行情在还是战乱时就已经上涨了。但到了真正签

署停火协议时，预期的利多行情反而不会发生，这就是“既成事实效应”。

但事情的发展也可能是：战争期间，信心不足的投资大众早已卖光了手上的所有股票，当和平出乎意料地突然降临时，股市则像火箭升空般强势反弹。

战争的开始或停火当然是属于极端特殊的情况。但我们也可以从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中，观察出股市中的“既成事实效应”，这些观察方法在经过多次验证之后，我已将之升格为股市观察准则。

同时我也得出以下结论：投资人的逻辑判断是以基本面为基础的，其中包含统计、经济、政治因素及其他重大因素。但是根据这些因素归纳出的结果，会由于被前面所说的技术面掩盖而失效。总而言之，当时的判断太过于理论化了，所以会有和现实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出现。

虽然我给朋友的回答是针对他在债券市场及大宗商品市场中各式各样的买进、做空的投资策略，但是也可以应用在分析股市大盘的行情上。

投资人心中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股市会在经济衰退时上涨，而在经济繁荣时下跌？可以如此解释：股市行情虽然和经济景气相互关联，也遵循同一个法则，但两者却不是同时发生的。

多年前，我便想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股市行情和经济景气的关系。请想象一个人在街上遛狗。人很平稳地向前走——这就是经济。而狗则有时向前狂奔，有时东跑西跳，有时跑回到主人身旁，就这样来回地跑来跑去。这只狗的行走路线便是证券行情的起伏波动过程。人和狗同样是往前走，最后他们也会一起到达目的地。假设人走了1公里，那么狗大概就走了3倍或4倍的距离。股市行情的起伏就像那只狗所走的路线一样，向前走了一段之后，就会往后退几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还是在按部就班地发展。

两个基本要素：①资金及信贷情况，②投资大众的心理状态。此二者并不是同时对股市走向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货币市场和经济周期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对商业活动有利的事，对股市通常不利。

我的看法是，对于股市大盘走势（并非个股的走势），想象力和资金要比基本面的分析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事情也还是有例外，在股市一片低迷时，即使一只股票的基本面不被看好也还是有可能上涨，但股价上升缓慢，因为上涨过程中得顶住大盘产生的反向压力。反之亦然，当某一股票的基本面分析显示利好，那么股价上涨的速度就会比其他股票快得多。或者基本面不佳的股票，即使在大盘满堂红的情况下，仍然会往下跌。以基本面来说，大盘有自己的走势，个股也有自己的走势，虽说基本面的分析结果相当重要，但在大盘交易量很大时，基本面的作用便无法完全发挥了。

事实上，股价行情的发展经常和基本面背道而驰。经济繁荣会带动利率上升，正如之前说过的，企业把所有可用的资金都用于直接投资，所以资金流动性也就比较差。事情的发展经常是这样：当经济萧条和利率下调时，股市通常会上涨，虽然当时基本面的因素（此处指公司获利以及分配股息）并不利于股市。反观经济突然繁荣、工商贸易十分活跃、有大笔资金可以用来推动经济发展时，当局（政府相关部门及货币发行银行）会采取紧缩政策，避免经济过热。他们会调高利率，严格限制贷款申请资格，于是资金流动性就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股价的波动从来未曾符合过股票的真正价值，股价永远过高或过低。如果股价可以随时反映真正的价值，也就不会有上下波动的行情了。还好事情并非如此，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计算机大胆预测行情走势。

这些人决定了股票的估值和股价未来的走势发展，每天都在更改对某一公司的未来潜力和前景的看法，因为有很多因素会随时左右他们的看法。与此同时，这些人的购买意愿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判断大盘走势时，情况亦是如此。归根结底，股市的投资气氛不过是一种投资大众的心理共识，这个心理共识反映了大多数股票投资者对股票市场行情所持的悲观或乐观态度，于是就形成了所谓

的“股市气氛”。这会直接影响行情走势，而且会告诉手上持有股票的投资人是否该把股票卖掉，或是手头上有余钱的人是否可以进场。

我们很难说明投资气氛是如何形成的，这和现在的局势有关，和未來趋势则一点关系也没有。政治、经济、过往行情纪录或是大众对金融政策的信任程度，都会影响到投资人对股市的看法，但事实上这些因素并不都是客观的。

股市中所谓的投资者情绪或市场气氛根本毫无逻辑可言，经常让股市投资专家非常惊讶，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我得再次强调，这里指的逻辑是所谓的股市逻辑，和日常的一般逻辑不是一回事。

## 潮涨潮落与股市

行情上涨时，投资大众便会现身；下跌时，他们就不见了踪影。

如果人们更仔细地观察股票市场，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股市心理学”这个名词，因为股市本身就是心理学。1688年出版的《混乱中的混乱》表达的就是这个思想。

就如同大自然中潮水的涨退、四季固定的交替及月亮的圆缺，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同的循环。景气繁荣与萧条的变换轮替，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还有悲观、乐观的立场摇摆，人类历史演变中的革新及停

滞。股票市场也有涨跌的循环，群众的心理状态便是引发股市行情变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为了让读者更明白金融交易市场，我利用数十年的亲身经验及观察，得出一套股市行情交替循环的理论。不论在证券、债券、贵金属交易或大宗商品市场，都可以将这套理论当作投资的依据。我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模型。

每个股市行情循环可包括3个阶段：

- (1) 股价盘整时期；
- (2) 顺势波动时期；
- (3) 急速扩张时期。

以股市上涨的波段来做说明，在第一阶段的股价盘整时期，行情会跌至一定的水平，调整到一个合理且符合现实状况的价位。在第二阶段的顺势波动时期里，行情会随着出现的重大消息而涨跌。如果消息不利于此股票，则价格会再度下跌；如果消息有助于股市行情，则此股票会随之向上攀升。在第二阶段进行到某一个时间点后，另一个新的利多消息，会将股市循环自动带入第三阶段，即急速扩张时期。在这个阶段，价位每小时都在往上攀升。而且，行情和投资气氛不断竞相飙涨。持续上升的行情激发了投资人的投资意愿，如此热情的投

资气氛不断高涨，这股力量又将股市行情推向更高点。这时的股市表现已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这不过是一大群股票投资者歇斯底里地追涨股市的结果。

当股市处于行情下跌的循环波段时，行情走低，会使投资人陷入严重的悲观气氛中，于是股价在这样的压力下就像秋风扫落叶般持续下跌。最后一阶段的上涨或下跌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某种刺激因素介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即使投资人认为那么高或低的行情并不合理，但若这个刺激因素迟迟不来，这个由纯心理因素造成的第三阶段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出乎投资大众甚至专家的意料，股市行情的走势会突然毫无缘由地向相反方向发展。股市的反向循环运动这时宣告开始，又回到股价盘整时期，再到顺势波动时期，最后进入急速扩张时期，这就是股市的运转模式。

投资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呢？到了第三阶段急速扩张期的后半段时，即使股价一跌再跌，投资人也应该勇往直前，加入股票投资的行列。如同布达佩斯谷物交易所的经纪人所说的：“下坡时，身上没有小麦的人，在上坡时，仍然不会有小麦。”在行情上涨的第一阶段，应该继续加码，因为股票走势已经过了相对低点。在第二阶段中，投资人则应做个观察者，消极地跟随行情起伏，并做好心理准备，准备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从过热的股市气氛中退出，获利了

结。这也就是说，投资人在股市循环的过程中，在两个阶段要采取逆向操作，只有一个阶段可以顺着趋势投资。

在第三阶段急速扩张期的后半段，要投资人在行情一片看跌声中买进股票是非常困难的。当同事、大众传播媒体及股票专家都建议降低持股时，要反其道而行更是困难。很多人即使认同我这套理论，并采取投资行动，但仍然不免会在最后一刻屈服于群体心理的压力，改变决定，并对自己说，虽然理论上应该进场，但这次的情况不同。可是事实会向他证明，此时反向操作投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为了摆脱群体心理的影响，投资人必须勤加练习，对事情抱持怀疑的态度，而且要有喜欢挖苦人的性格，再加上一点自负。有这样特质的投资人会说：“你们这些笨蛋。只有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比你们了解事实的真相”。虽说这样的特质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个性，却有益于保持个人独立的思考，同时也是成功投资的必备条件。所以说，在股市中能够成功获利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股市输家。

最近，约翰尼斯·格罗斯（Johannes Gross）在他的“笔记”中又写道：“为了更好地投机赚钱，约翰·特雷恩（John Train）认为，人们不仅需要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也必须放弃所有错误。如果在金融界找到了一个依据，金钱猎手总会从成功中获得乐趣。多数人的意见总是错的，为猎人提供了猎物丰盛的狩猎场。”

当然，令我开心的是，FAZ杂志拐弯抹角地借约翰·特雷恩之口，说出了我永恒信奉的投机信条。

回到前面的问题，怎样才能知道现在是处于第三阶段的哪个地方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一本教科书可以提供答案，即使投资人想破头，也没办法确定答案，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或公式，可以让投资人直接得到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做个猜测。投资大众的反应到了何种程度？股票持有人的心理状态如何？他们是对股市充满信心，还是容易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而立场摇摆不定？这些技术面问题又该如何作答？

现今没有一个科学方法可以推算出来股市何时会突然从这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明确指出转换日期更是不可能。行情上涨的趋势也许可以持续数年之久，也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利用过去累积的经验和市场征兆来判断。想要用科学方法预测股市行情或未来走势的人，不是江湖骗子就是笨蛋，要不然就是兼而有之。只有经年累月的经验，才能培养出敏锐的直觉。但即使是经验最老到、最狡猾的投资专家，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他们必须经常犯错，这样才能积累经验。假如一个投资专家一生中不曾破产两次以上，那他就不配称为投资专家。股票投资者就好像是置身于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里，已经在这里面待了数十年的人一定会比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的人，更快熟悉里面的环境。

如果我向我的表弟乔治·卡托纳提到“艺术”或者“直觉”的字眼，也许他会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是个讲求科学的理论家。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认同股市心理学就像是一场即兴演讲：在股票市场中，你永远无法确定会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投资大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只能猜测。

## 第4章 大崩溃——群体心理学案例

群体心理反应就像传染病，有人在戏院里打呵欠，其他人马上跟着打呵欠，一个人咳嗽，其他人也跟着咳嗽，股市亦然。

大哲学家叔本华说：“只有痛苦才是真实的；幸运的存在是因为苦难的缺席。”对投资专家来说，痛苦是真实的，那就是股市下跌时的金钱损失，尤其是发生股市崩溃时，痛苦显得更加真实。

群众要一直等到报纸头条出现“股市危机造成巨大损失”的新闻，才会真正感受到大恐慌真的来临了，它就像一台巨型机器的轮轴一样开始运转了。

投资人可以从物质生活中实际感受到股灾带来的痛苦。股市景气的成长其实相当缓慢，它走一段停一段，几乎让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相比较之下，股市危机却在一夜之间来势汹汹，让所有财产化为乌有。它将投资大众分散开来，然后各个击破。

假如股市景气指数信号走稳，股市的投资环境就会让人感到较安心，如此一来，只要一切进展顺利，投资专家便能轻松容易地捞取他的利益。所谓一切进展顺利的意思是指事情的发展如其所料，如果根本没有想到股市局势会变得很糟糕，而且是非常糟糕，那么他就会有很大的损失。

当股市危机真的来临，低迷的行情一点一滴地侵蚀了投资人的资金之后，投资人才痛苦地觉察到经济上的损失，接着开始埋怨命运不公平，只有损失才是真实的，获利不过是一种错觉。

战争和股市崩溃是漫长历史发展的基石，是它们在推动历史前进，并将历史分成各个阶段。

股市的历史也被人们分为兴旺和衰败两个阶段：股市繁荣和崩溃。这两个阶段相伴相生。

经济繁荣是在百业兴盛的和谐气氛中从容缓慢地开始膨胀，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大气球，随时有被针刺破的危险。投资操作中有一句名言：“在发生股市危机或经济崩盘前，必定经历过一次快速成长的景气繁荣，而景气繁荣也一定会以股市危机作为结束。”

法国人将德文中的“Krach”借来表示股市危机，法文的念法是“Krack”，这个单词使人联想到打破镜子，也就是英文的“Crash”。股市危机的发生就如同在晴朗的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的情况下，一场暴风雨就突然来临了。

投资人对1987年10月19日爆发的全球性股市危机还是心有余悸。这场危机是如何在大多数人都毫无预料之时发生的呢？

从1987年夏天起，利率就开始没有任何原因地缓慢上升。当时乐观的投资气氛盖过了利率上涨所带来压力，行情仍维持在上涨格局，情况就和市场开始运转时一样。但美联储，即美国的中央银行一次又一次上调利率，试图紧缩资金流动。同时德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德国联邦银行施莱辛格（Schlesinger）先生建议调高利率（这真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决策）。

这无疑是一根针，把涨大的气球刺破了。

如此一来可以预见，气球里的空气（即指上涨时的获利）会随着不断调高的利率，在数月内流失掉。

股市由高位骤跌25%后，接着就得花5年的时间恢复元气，这样的走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自己就经历过20次。但是道琼斯指数在一天之内就暴跌500点（22%）倒是让我惊讶不已。而且当行情在七八月份达到高峰之后，便开始往下暴跌了。这种突然爆发的不正常的行情狂泄，是由一些不当的技术操作引发的。

首先是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中的股票玩家赌徒般的胡作非为。在这里，只要有5%的保证金，就可以投资指数期货合约，这真是不正常的现象。

指数期货合约交易是股市投资中最复杂的玩法之一。现在，骗子就是利用这些玩法诱惑投资大众进入这一座大型赌场（指数期货市

场)。在这个交易市场中的玩家，除了政府机构，散户占了一大半。

所谓指数就是所有股票的平均价格，其实股票市场中本来就有参考指数，但芝加哥的投资人是第一个将之列为可以交易的投资指标的。这些投资人在通货膨胀时期投资商品期货市场，赚了不少钱。当通货膨胀被成功地抑制后，他们在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宣告结束，接着转入指数期货合约的投资市场。一张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是由500个不同股票的价格组合而成，单价高达17万美元（1990年7月的数据），但只要拿出约1万美元作为押金，就可以购买一张指数期货合约。用股票术语来说，一张期货合约的交易可以有高达94%的杠杆融资比例。也就是说投资杠杆非常大，大到违背了常规做法。欧洲的股票市场20年来也没有过这么大的投资杠杆水平，在欧洲的股票市场通常会要求至少10%的押金。

因为这个指数是由500个不同的股票行情组合而成，指数期货合同的小投资者没法自己算出一张指数期货合约的价格。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小帮手，即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来协助期货专家，投资人的计算机每隔1分钟就会更新50~100家股票的行情。

那么，如何在500家股票中挑选出50~100家股票？计算机挑选出在同一段时间内表现最好的股票。然后投资人再根据计算机显示的数据，调整投资策略。例如在同一个时间点，若指数期货的表现比股票行情高出0.5%，投资人就会卖掉指数期货来买股票。

若情况相反，指数期货的表现比应有的价位低了0.5%，那么投资人就会卖出股票，买入指数期货，这就是所谓的套利操作。这种金融交易不是真去承接股票，也没有进行股票买卖。当指数期货行情走势突然受到重挫，价格降至比应有的水平还低时，投资人会卖掉手中的股票，改买指数期货，其实这就是以行情差异作为基础的快速买卖，这种操作不需要做任何思考，也没有任何的投资理由。

若买卖指数期货后，行情因利率上涨而下跌时，投资人则必须补缴因行情下跌而产生的价格差额，因为行情下跌已将5%的保证金耗光了。如果投资人没有准时补缴这笔差额，期货经纪公司就会强制进行平仓，这便是第一波沉重的卖压。

1987年10月19日全球性股市危机的第二个技术面原因是：大型投资机构的基金经理（俗称金童）可以自由使用存放在其机构的市值数十亿计的股票。当时，他们对未来行情走势失去信心，所以想先确保这些证券的价值不受损，于是在芝加哥的指数期货市场内大量抛售证券。如此一来，原来的价位被他们拉到更深的谷底。在这场经济危机之后，光是在纽约，就有6万名基金经理失去了高薪工作、豪华公寓和名贵跑车。

那些所谓的证券组合保险机构，其实只是大型金融机构的担保公司，其目的是要避免股票市场中可能发生的暴跌现象。他们并不销售股票，交易的金融商品是指数期货。所以，这些金童所采取的行动，

无疑是我最好的参考指针。他们的看法是把房子卖了，就没有失火的危险（意指把股票卖了，就不必担心行情下跌了）。

这样一来当然会产生连锁效应，股票市场行情跌得越深，就有越多的指数期货合同被卖掉。另外，此时的利率上调更是把指数期货市场打入谷底。引起这场市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便是芝加哥指数期货市场中反常的交易条件，上千名无辜散户的指数期货投资也连带被止损平仓，让投资大众完全陷入了恐慌之中。

当投资大众看到道琼斯指数大跌500点之后，他们像恐慌的羊群一样四处逃窜，大量抛售手中的股票。当天我听到一位股票交易员描述他的客户是如何惊慌：“我的客户们大叫‘全部卖掉’，不是这只或那只股票，他们说的是全部。”

指数期货平仓、机构的大量抛售和投资大众的恐慌心理汇集成1987年金融市场的暴风雨。

在一片混乱中，我接受了众多媒体的采访，包括电视和广播节目，邀请我上节目，还有接听不完的咨询电话。我相当镇静，只不过将其视为较大型的股市危机罢了。当时，我不禁想起我的老朋友尤金·温莱布（Eugene Weinreb），他是个经验老到又十分狡猾的股市老狐狸，从10岁开始投机生涯。有一天，他的秘书非常激动地在他面前

说：“股市大暴跌！”而他的反应却是：“股市大暴跌？我该激动吗？我可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3年……”

当时有很多投资观察家提到“疯狂”“混乱”“惊慌”“神志不清”等词句。精通此领域的心理专家，看到他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证实：“在股市崩盘的那一天，投资人的潜意识里出现一种强烈的恐惧，这一股力量主宰了‘理性’的反应。”虽然我总是将过度的悲观视为一件坏事，但我对人性有更好的见解：不是内心深处的那股恐惧力量引发了股市危机，而是人性的一时冲动导演了这一市场危机。

经济非常兴盛时，投资人尤其易冲动，当他们精神亢奋时，就看不见气球有被戳破的可能。但无论如何，那一根针总是会来的。经济繁荣与萧条、股市高涨和暴跌，就像海水涨潮、退潮的循环，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只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就是海洋学家可以分秒不差地算出涨潮和退潮的时间。

我在股海中也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手了，却没有办法事先算出股市危机发生的准确时间及强弱程度。可是我在1986年7月已经在《资本》杂志的专栏中写道：“不论是外国投资者或者是本国人，这个月投资人的素质都不太好，数百万股票瞬间转移到信心不足的投资人手中。这些人计划着等行情大热时，再把股票卖掉。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新的股票买主尚未出现。于是他们失去耐性，即使股价不是那么好，他们还是抛售了手中的证券。”

1986年9月，我更多地宣传了当时我对股市技术面的分析，要是15个月前我把德国股票卖掉，我就会到世界各地劝诫投资大众，赶快退出德国市场。因为，当时我亲眼看见企业股票一家接一家争相上市，也看到众多银行对如此歇斯底里的状况是如何推波助澜。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内幕，因为德国最大银行的总裁竟然打电话给在苏格兰的琼斯先生说：“琼斯先生，现在赶快投资西门子股票吧。”这个年轻人当然对这句话相当认真，这可是出自重量级的德国银行总裁之口啊。因此，他买进了5万股，行情就是这样被推高的。

这位年轻的股票经理人刚在伦敦经济学院或哈佛经济学院里考完试，便马上直奔银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股市行情会因他的举动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位德国的生意人也太过高估德国股市的规模了。当所有人都要卖股票时，便会产生著名的“瓶颈效应”。德国股市规模太小，根本无法容纳巨额的交易量。

我在预测10月份行情的专栏（在1987年10月19日全球性股市危机的前一个月）里这么写道：“在面对全球性股市不断上涨时，我们更要考虑，这样的上升趋势还能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是行情的转折点。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股市笼罩在一片悲观气氛中，我曾写过，‘股市的反弹越慢发生，上涨幅度就越大。这样爆炸性的行情飞涨，不仅发生在华尔街，更会传布到整个世界，包括规模较小的外国股市’。”

我再一次证明，我的座右铭“永远保持担心，但绝不惊慌失措”是对的。这篇专栏的标题是：“股市下一次的崩盘绝对会来临。但从长期来看，还是会往上加温，感谢苏联。”

## 戈尔巴乔夫行情

这是一次三赢的局面，股市惨跌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又往上涨了。人们给这一次上涨行情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叫“戈尔巴乔夫行情”。

有两个人要为东西方飘忽不定的政治关系负责：一个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他花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大搞军备竞赛，然后再花数十亿美元裁减军备，为此美国还必须忍受财政赤字。另一个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个既聪明又冷静的政治家（我得强调是政治家而非政客），他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储备会因花费巨大的军备竞赛而消耗殆尽。

戈尔巴乔夫第三次在日内瓦的协商会议中离开谈判桌，他几乎快要气炸了。虽然如此，里根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无论如何，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最后还是带着建设性的提议回到会议桌旁。欧洲的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认为，牛仔总统里根（同时也是演员）差点因为国防上的军备扩张让美国跌入无底的深渊。

最后解决协商会议分歧的方法来自一则布达佩斯的小故事：聪明又小心谨慎的格林想把100万福林（货币单位）存起来。

“请让我们来保管这笔钱吧！我们的利息很优惠。”储蓄银行总裁说。

“如果你们的银行倒闭了，我该怎么办？”格林担心地问道。

“我们有国家银行和匈牙利政府做担保。”

“如果它们也破产了呢？”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政府为它们做担保。”

“那好，如果连苏联政府也破产了呢？”

“可是，格林先生，我们私底下说说，难道这件大事不值得您拿100万福林做赌注吗？”

难道国际气氛的重大改变比不上美国的财政赤字吗？

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互信基础，并且确定了裁减军备的政策，同时在他的主导下，苏联对西方国家开放了经济门户。这三件事让上千种被禁止进口到苏联市场的商品禁令得以松绑，未来甚至还很有可能解除。现在苏联人可以买到上千种之前没有进口过的商品。这些商品主

要来自美国（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其次是欧洲国家和日本。不得不说，苏联是个很有实力的买家。

我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刚成立的苏联曾经向德国工业界下了很大金额的订单。很多我认识的住在柏林的苏联商人，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当时很多富有的俄国流亡贵族和他们漂亮的模特老婆会到巴黎定居，而从俄国流亡出来的生意人则在柏林定居。他们的财产都是由苏联用来支付进口商品的汇票兑现而来的。德国公司为了将产品出口到苏联，每年支付的利息高达30%。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此一来，德国必须将利润提得很高才能负担起利息费用，虽然苏联买到了它们想买的东西，但是有很多汇票根本无法兑现。

苏联人想要买些内心渴望已久的东西，他们的需求是如此之大，因此小心谨慎的人会问：“他们有足够的钱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有挖掘不完的丰富的地下矿藏，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未充分开采。

苏联人也很可靠，我的很多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和苏联的贸易代表接触，这些贸易代表的意见都相当一致。因此，和他们交涉很艰难，进度十分缓慢，通常双方的协商代表会在烟雾弥漫的饭店房间里，一边谈一边喝伏特加，从深夜谈到第二天东方露白，一直等到苏联人准备签署协议为止。只要签订了合约，苏联的代表就不会再有任何异议，而他们的账务处理和英国的银行一样快速准确。

我最大的希望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道路能一路顺利，他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要拥有使人折服的领袖气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特质可以为经济带来充满希望及信任的气氛。在所有有影响力的股票、债券、贷款的背后是什么？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只有信任罢了，而且是完全的信任。

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比国内受欢迎且声望还要高，虽然他已经被多次扳倒，但每次总是能东山再起。他是个能够在挫折中再度爬起来的人，就像股市投资人一样。因此我很有信心地把对未来的展望建立在他所推动的政策上。

我也常被问到对于1992年将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的看法。我对此也很有信心，但是我认为1992年是不可能达成的，而且这个期限一点也不重要。我喜欢以1930年首次上演的一出法国戏剧来说明我的观点。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一次失败而想自杀，在最后一刻，他遇见了一个叫拉脱哈德（Le Trouhadec）的老人。拉脱哈德是个地理学教授，也正遭遇严重的打击。在甄选学会会员时，拉脱哈德被竞争对手中伤，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竞争对手指出，拉脱哈德在一本书中提及一个位于南美洲、叫多娜谷通卡的地方，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金矿。但是这个竞争对手发现，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想自杀的年轻人听到这里好像突然醒了过来：“什么？多娜谷通卡不存在？那么我们

就来创造一个吧。”于是年轻人成立了一家公司来开采金矿，并和银行家、金融家及媒体记者接触，大肆宣传此家公司新上市的股票。

不久，所有人都在谈论多娜谷通卡，探险家、淘金客和生活不如意的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位地理学教授描写的黄金矿脉所在地，开始工作。尽管他们还没有找到黄金，但还是得安排生活起居，于是他们建造起小木屋来住，后来小木屋变成水泥屋，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城市。

这部戏的最后一幕是，这里的居民正在庆祝他们来到多娜谷通卡的十周年纪念日。城市里的一切都完美地运作着。当他们正在为一座雕像揭幕时，通知拉脱哈德教授获选成为学会成员的电报刚好送到。

欧洲此时正狂热地为1992年做准备，投入大量资金建设，1992年后，这个区域共同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经济学者分析，什么人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呢？答案是除了悲观主义者外，其他人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共同市场里获利。

我说过不下10次，我们正步入全球经济起飞阶段，而且那将是目前这一代尚未体验过的大繁荣。我很希望能见证这个预言。

如果我能回到70岁，我希望能击败那些天生悲观的人。1987年后的3年间就印证了投资人一定可以赚大钱的说法。但若想成为股市大师，则至少得花上40年的时间。

## 可以用计算机投机吗

根据一则传说，荷兰移民曾在新阿姆斯特丹（现称为纽约或曼哈顿）建筑一道围墙，以防御印第安人的攻击。我想，重新在原来的位置（现称为华尔街）再筑一道高墙，应该是不错的主意。这面新墙的目的是要防止数百万几乎疯狂的投资人进来搅乱金融市场。

自1987年10月19日发生股市崩溃以来，政客、学者及股市官方机构一直在讨论，要如何避免同样的惨剧再度发生。无奈学者和政客都没有足够的相关经验，无法在讨论时切入问题的核心。

多年的股市生涯让我有勇气提出改革指数期货交易业务的建议，我认为，这就是引起1987年10月19日股市危机的起因。在我说明这项建议之前，我想先解释什么是自动交易撮合系统，以及计算机在金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Jr.）是IBM计算机的鼓吹者和倡导者，如果他知道今日计算机要为所有金融市场中的祸事负责，一定会痛苦不已吧！这句话当然是在瞎扯，计算机跟这些祸事根本毫无关系。

计算机所做的是，即使投资经理不用计算机也可以做得到，计算机就和人们吃到腐烂的鱼肉时所用的餐具一样无辜。问题出在那条臭

鱼上，而非刀叉之过。电子数据处理系统只能处理输入的数据资料，若进去的是垃圾，出来的当然还是垃圾。

计算机在一些方面可以是一项重要的辅助工具，例如提供信息。当我们想知道某一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时，通过计算机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相关资料。但若在20年前，我们就必须在图书馆花很长的时间反复搜寻，才能找到所需的资料。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随时调阅过去所有的资料，或是某一年度的相关资料。但是计算机不能猜想未来的事，也不能代替投资人思考。

那么什么是自动交易撮合系统？它又会带来什么问题？基本上，这和以最快速度“止损”有关。止损是一种限制损失范围的方法，也就是立即卖出股票。相反地，当股市行情上涨时，自动交易撮合系统可以在股价进一步上涨前，抢先买入股票。这种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股市。当时股票市场正如今日的股市一样异常火热，正处于狂飙突进阶段，就像是一座危险的热带丛林。只要投资人缴纳10%的保证金，股票经纪商就会接受其委托单，进行股票交易。如此的投资条件和股票经纪商的佣金有很大的关系，一笔10万美元的买进交易，客户只要拿出1万美元，同时签署一份止损委托契约，这份契约指定在行情下跌2%时自动生效。如此一来，因为10%的保证金可以吸收5天内每日2%的行情疲软，所以当一半的保证金已经抵消因行情下跌而产生的亏损时，股票经纪商还不需要向客户追缴保证金。

现在基金经理的激励动机已和1929年时大不相同，现在他们完全不在乎保证金或担保品，因为所有的风险由他们所属的机构承担了。他们不会动脑筋思考，商学院并没有教过这个，他们只是预先设定好证券在到达某一个行情时自动买进或卖出，而且他们还依据一些没有意义的图表理论，比如头肩形态或茶碟形态，来决定如何操作证券交易。

现在，对于机构中的基金经理而言，止损和止盈委托单是一项证券操作利器，他们遵照一位股市老玩家的格言进行证券操作：“已经下跌的股票还会跌得更深；已经上涨的股票还会涨得更高。”因此他们称在前一种情况出现时的做法为“止损”。于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股市行情来到某一点，证券就会被卖出。但如果超过指定的行情，就不会挂卖。例如某股票的目前行情是100美元，而输入计算机的止损价格是90美元。那么不难想象，如果有1万个投资人的止损价格都是90美元，就会有卖压涌现，而行情就会下跌。而且持续卖压还会将行情逼至85美元。然后新的止损价格就变成85美元，但这个设定又会让行情跌至80美元。于是，最新修正的止损价格便来到80美元，情况就是这样发展的。结果是行情出现重挫，投资大众的心理也陷入恐慌。

计算机在这套自动交易撮合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登录和执行止损委托。假设行情或指数跌了几个百分点，计算机就会遵循投资人

所下的指令，自动将证券或指数期货挂单卖出。行情跌得越多，卖的也就越多。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当股市行情到了某一个高点后，计算机自动帮你买进某只股票；但行情若在指定的价位以下，计算机便不会执行。

我承认，自动交易撮合系统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是现在的投资经理根本不用头脑思考，只是一味用计算机来决定投资策略。我认为，他们应该为恐慌性卖出和证券的贱价抛售负有最大责任。

这种止损卖出在1987年和1989年的10月间曾引起投资恐慌，也许是因为投资人的迷信，想在1989年最后一个黑色星期五（在10月）时将手上所有股票卖掉。第二天的股市万一上涨，你就可以看见同一批投资人发出低价买进委托单。

如果这些委托单早几天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转交给证券经纪人，结果还是一样的。自动交易撮合系统不是一项新的制度，也不是所谓的股市革新，只是建立在许多股市投资人都有一个原则上：“放任获利成长，限制损失范围。”

有很多人赞成这一个原则，但这纯粹是个人的喜好问题。早期我也曾一度相信这个理论，可是，当时的我只能算是股市新手。之后我从实际的股市操作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也缴了很多“学费”。现在我

是股票长期投资的专业人士，长达70年的经验告诉我，只有长期投资和反向操作才能在股市中赚大钱。使用自动交易撮合系统有时会获利、有时会亏损，但最后一定会破产。

机构的投资经理不只利用自动交易撮合系统进行金融市场的投资买卖，而且还会对新闻媒体的消息做出反应。一家证券经纪公司的证券交易员告诉我，在发布美国贸易逆差高于上个月的消息前，他一直接到委托买入订单，但消息公布后，立刻有上千张股票挂单要卖出。

计算机在债券市场出现的几十年前就已经用于辅助计算了。比如，保险公司持有数十亿的债券资产，会用计算机不断尝试找出那只会比另一只债券带来1/16百分点的额外收益的债券，然后进行调仓操作，以提高投资业绩。

芝加哥的指数期货投资人，也是根据计算机计算出的指数买卖指数期货。投资人在任何时间都不需要思考，因为所有资料早就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了。因此，所有投资人的投资行为都是那么简单直接，没有人会经过一夜未眠的深思熟虑来决定该如何行动。

一天的指数期货交易额可以高达270亿美元，但在股票市场中真正涉及股票买卖的交易额只有10亿美元左右，而且是由芝加哥的期货交易带动指数大涨，不是由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创造出行情。指数在一天内来回震荡，幅度也越来越大，但是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以及外在环境和前提条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种情况和17世纪的荷兰股市（阿姆斯特丹）如出一辙。

我对改革指数期货交易的建议如下：不能废除限制指数期货交易时间的规定，而且还要禁止为配合华尔街股市交易时间而采取的延长交易。指数期货的买卖应该在华尔街股市交易时间结束之后才开始。另外，还要和伦敦的黄金交易市场一样，规定当日的交易价格要相同。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人们每天两次，将所有订单按照所谓“固定价格”进行结算。

这样的方式不是什么新做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就会在咖啡馆内打赌当天晚上道琼斯指数的收盘指数。预先的交易（也就是事先的打赌）会引起投资人的不同反应，然后传染到华尔街股市。我不知道实行我的建议后，投资人是否就能因此摆脱人类的愚蠢，但我能肯定的是，如此一来，必能控制投资人疯狂的投资反应。

如此做法必定会使股票专业经理人损失好几百万的手续费，但肯定有利于投资大众的利益，就像我们对尼古丁所采取的限制。

我想在听证会里提出建议，但也相信我的建议绝不会被认真考虑。因为那些做市商，那些证券交易所的巨头，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游说国会，以免妨碍他们收取证券交易手续费。

交易所里的交易员充其量只是个懂得利用计算机完成交易、不动脑筋的办事员；但是投资人必须是个用头脑思考的人，还要懂得和计算机及发神经的股票投资者保持距离。IBM的总裁小托马斯·沃森，对于计算机阻止人类思考、甚至剥夺人类思考能力必定会感到十分愧疚和不安吧。不然为什么他会规定所有员工的桌上要放一块写有“Think”（思考）字样的铜牌呢？

上次在汉诺威电子展（CEBIT）上，我在里面到处参观，并在IBM的展台遇到IBM董事。他认出我来，并问：“科斯托拉尼先生，需要我为您介绍什么吗？您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我回答他：“计算机，一台可以算出明天股市行情的计算机，至于其他的事，我已经有一台个人计算机可以帮我做了。”他想知道我的个人计算机是哪个型号，我告诉他：“我的头脑就是这台个人计算机，而且我要告诉你这台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于是我向他讲了一个从弗利茨·姆里亚（Fritz Muliar）那里听来的小故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意大利加利西亚的一个小镇，一个夜班警卫来到市场内的岗哨，走进值勤室，他把长柄斧和灯笼放在身边，开始打起盹来。突然，有一道刺眼的光线使他醒来。是什么东西？他心里想着，但眼睛还是没睁开。然后他开始猜测，是街灯吗？但19世纪的加利西亚哪来的街灯呢？月亮吗？他算了算，当时的月亮应该还只是新月，不可能，月光不会这么亮。接着他把手伸了出去，外面正在下

雨，星星的亮光也不可能让他醒来。接着他把这台“个人计算机”调到高速，很快地把刚刚的想法逐一重新过滤一遍：不是街灯，不是月亮，也不是星星。“火！”这个字突然从脑子里迸出来。

自从我给IBM这位先生讲了这个故事后，他便经常邀请我去演讲。当然，每次我都会把这则故事从头再讲一遍。

## 第5章 先知、教授和各路“股市大师”

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投资大众的惊恐情绪无疑是由股市大师们所引起的，因为他们不断地将这次的事件和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做对比。1929年经济大崩溃的预警是：高失业率、工厂倒闭、物资缺乏，失业的银行家在街头卖苹果或是擦鞋。此种景象在低失业率及经济全力发展的1987年，有可能发生吗？

1929年时，所有商品都待价而沽，却没有人买得起；但如今大型金融机构争相吸引企业客户，想把手上的资金借给它们。更好的是，这些钱都是在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着，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可供企业使用。从经济情况看来，一点也没有金融危机或是经济衰退的征兆。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现在世界经济体系不再是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在经济有需要时，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1987年10月20日，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定会满足市场上每一笔资金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此外，黄金价格并未如预期上涨，反而是国债的行情直往上冲，这是市场对这个国家及其制度深具信心的一种表现。不信任只表现在股票市场上——股价下跌，导致对股票的信任感下降。是谁决定了反

周期现象？是少数人！那些能够战胜1987年市场危机的人，就能够获得这本书所说的超额利润。

1929年，每个人都犯过错，我曾经这样写道，大众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了解和发现。一次小小的利率上调不应该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最重要的是，1929年的噩梦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各个媒体最终将会发觉，教授们的观点又错了。1987年11月初，也就是崩盘不久后，来自世界各地的33位教授齐集于华盛顿，在研讨会中他们提出了对世界经济最悲观、最夸张的预测。之后，我马上写道：“啊！美丽的世界，这33个教授让你不知所措了！”

《明镜》杂志的一位记者针对我的乐观主义做出如此反应：“我还是坚持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评估。我无法理解像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这样的‘股市专家’怎么会对世界经济做出那么正面的预言。”他的文章让我觉得好笑，尤其是用到了“股市专家”这几个字，不知他是否也曾用过“股市教主”或“股市教父”这样的词汇？“股市专家”是不是人们可以给别人的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头衔呢？我宁愿被人们称为作曲家或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一件漂亮衣服和一条定制的裤子，可以把一个股市投机客变成绅士。”

不过我也得到过媒体的正面回应。1987年年底，我在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为2000人做了一场演讲。和我一同演讲的是根舍先生，他讲

了外交事务，而我则讲了对于经济和股市的未来展望。《南德意志报》做了深入报道，并写道，在最悲观的时刻，听到这样好的消息是多么令人愉快啊。

## 语义错误：垃圾债券

《明镜》杂志的那位记者不懂得语义学规则。这种不合时宜的称谓或恶意，我经常遇到。

“组合保险”概念的疯狂之处在于，我之前已经说过：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了保险，然后再把房子卖掉。另一个例子是“银行商人”（bank kaufman）这个词，我可以接受“金融商人”这个概念，但是把银行和商人放在一起却是矛盾的：银行家经手的是钱，而商人经手的是具体的商品。他们的兴趣点完全不一样：银行家关心的是利息，越高越好；商人当然也要关心利息，越低越好；前者寻找的是安全，而后者要的是想象力。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相互“对立”的。

“垃圾债券”（junk bonds）在华尔街流行多年，原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及之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债券，以及几十年前的苏联及其他类似的证券。这些债券及股票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派发股息。但我常常冒险从中挑选“可靠的”垃圾债券并投资，也真的

从“二战”后的德国及意大利的债券中赚了一笔钱。两年前我也曾考虑是否要持有一定比例的苏联国家债券，也许还能再次获得成功——这得感谢戈尔巴乔夫。

在美国有一种公司专门发行这种垃圾债券，这种公司借助外部资金，收购被投资大众低估了价值的企业。

这种新型债券与一般稳当的投资不同，投资回报率不只是16%~18%，投资人虽然必须自行承担风险，但有可能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为这种债券的利息收益，比信用最好的国家债券要高出8%~10%。

在某种程度上，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知道这种投资有成功的可能，同时也必须承担风险，这意味着，发行公司将自身的命运与被收购的企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而其风险在于，被收购的企业现金流量可能不足以支付利息，最糟糕的情况便是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破产。若是如此，发行公司的债权人（即购买债券的投资人）就得接受延期偿还或是本息损失。

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陷入经营困难时，还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将发行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就因为这个做法，直到今天，只有部分垃圾债券发行公司真得破产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无风险的获利，若不是有一些冒险家拿自己的钱做赌注，让想象力自由延伸，就不会有蒸汽机的发明和今

天的汽车和计算机，也不会有美国的摩天大楼、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或其他世界奇观。世界就是一项探险，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项风险事业。

股份公司的子公司、股票发行公司、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起始点，那就是冒险。

罗马的先知加图在传道时说，贸易和航运业应该深入思考金钱和利息问题，应该成立企业。“人们不仅要开办一家航运贸易企业，你和49个朋友一起驾船出海，50个人一起去探险。”

“冒险”这个词给人以不严肃或浪漫的色彩，而在17世纪，它具有非常准确的法律含义：开拓一个新殖民地。企业创始人和股东称得上“冒险”。这个词在最古老的股票——1670年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的契据上可以看到。传统上，在装嵌着厚实的桃花木天花板的大会议堂里开年度大会时，主席的开头语就是“尊敬的冒险家先生们”。

在哈德逊湾公司第一次发行股票300年后的今天，“Venture”（意指风险企业，风险投资）一词又再度风行起来，最初是在华尔街流行，几年后传到了欧洲。这个词同时也是创业投资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广告词，也是新公司发行股票时常用的字眼，早先德意志银行就是这么做的。

如今德国对创新企业的推销方式让我充满疑虑。只要浏览一下报纸的广告页，就可以看到最诱人的获利承诺。过去25年，有太多奸商在所谓的投资行业中吞噬了好几百万资金。最近则有一大批股票经纪人利用这个时髦的字眼来胡作非为。近期的事件有IOS基金、石油控股公司、贴现公司以及类似的“企业”都留下了印记。

我们对投资风险必须要能够处之泰然，因为没有风险就不会有进步。金钱投资本来就是不断冒险，以前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点当然不会妨碍我及我的伙伴去分辨出投资目标的良莠。接纳“冒险”，拒绝“骗子”——那些只是皮包公司。

所以，对于今日相当受欢迎的上百种投资事业而言，垃圾债券已不是“垃圾”。甚至连电信集团AT&T也已经决定，它们的养老基金要减少对绩优股的投资，增加对风险事业的投资。很有可能因为风险事业的投资不在股市交易，从而导致投资人无法看清楚股价。

风险是清晰可见的：在发生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衰退时，垃圾债券便会陷入困境。于是公司的收购人便无法以之前的合理价格卖出资产，以偿付债权人手中的债券。

大多数的企业收购行动是看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投资行为，因此当被收购公司的负债维持不变时，其市值便会大幅上涨。

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垃圾债券的利息比一般水平要高，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债券持有人会处于较有利的位置。大约4年后，当初付出的购买价，就可以以复利的方式收回了。

金融市场的表现有时也会非常歇斯底里，投资人可以从中看出，这是大型的收购给整个债券市场带来的巨大震荡。投资人对此所产生的恐惧是，其他的大公司也可能会被收购，因而会使旧债券的信用度走低。

总之必须有买主，才会发生收购。美联储绝不会允许美国发生经济衰退，因而会供给充足的流动资金以稳定美国经济。

## 思虑不足和言过其实

在过去10年中，有不少恐慌制造者不断预言世界经济的衰退，其中一个便是我的好友、法兰克福的前银行家菲利普·福莱赫·冯·伯特曼（PhilippFreiherr von Bethmann）。他以前经常在《法兰克福日报》刊登整页的广告，警告人们世界经济即将全面崩溃。他的公开言论想必花了大把银子，而《法兰克福日报》则因他的恐惧做了一笔好生意。

大约5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里面全是一些世界末日的预言家，他们一个个把情况描绘得越来越黑暗：“我们要思考，如何才能

把资产移往美国，让资产得到保值。”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便站了起来，与邻座的女士告别。“您想抛下我们吗？”她问我。“抛下你们？”我答道，“是的，我要走了。”遗憾的是，这一幕被一个记者看到了，他不喜欢我，因此把这件事在《时代》杂志登了出来。

恐慌制造者们不仅自己惊慌失措，而且希望别人也相信全面崩溃就在眼前不远，只是我们还没意识到。就像诺克医生（Dr. Knock）那时的所作所为，他是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笔下讽刺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这出戏在战前德国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人们都还记得其中的台词：“每个人，不管自己觉得怎么健康，实际上都是一个病人，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亲爱的读者，不要轻信那些大师的话，重要的是看他说了些什么！哪怕他是教授。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阿尔巴赫论坛。这个论坛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消遣之地，毫不奇怪，再次来到这个风景优美、充满了咖啡香气的地方，我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放松。即便是在法国，阿尔巴赫的成功也值得效仿学习，可以称得上是“教授相约之地”了。

我不喜欢和教授们打交道，但去年夏天，我还是和三位经济学教授凑在酒吧里喝了一杯。其中两位教授的专业是外汇，但是他们的狭窄视野还是让我困惑不已。他们完全不了解国际外汇交易中的精髓。我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他们也有认真听。其中一位教授在因斯布鲁

克大学读过书，我把我的《美元怎么办？》送给了他，供他做研究时参考。

我并不是说教授都是一无是处的，我感谢他们教给我字母表和外语，但是在经济预测或者股市方面，他们就像占卜者或占星师，对我没有太大帮助。我记得法国大文豪蒙田曾说过：“我宁愿听一个前天主教牧师废话连篇，也不愿听我儿子在小酒馆学说外语。”

罗伯特·普莱切特（Robert Prechter）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股市大师”。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便以极负盛名的股市大师身份在世界各地买卖股票。1987年8月，他预言1988年道琼斯指数会到3686点，就如同一位气象学家预测在8月15日时的气温会是摄氏25.4度一样。10月股市崩盘后，普莱切特马上将他的道琼斯指数预测调低到1300点，几周以后甚至降到400点。股市当然可能上下波动1000点，因此这些预言绝对算不上什么先见之明。只要在混乱的时代，这样的“股市大师”就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头来。

还有一位就是罗伯特·法雷尔（Robert Farrell），他是美林证券的分析师，也是华尔街最受欢迎的股市观察家之一。在一篇有关科技股的股市评论中，他写道：“股市正准备往周期高点攀升，然后再下跌至谷底，但是也可能延续向上爬升的力道，到达一个出乎意料的高点。”这些人的评论就和以下叙述一样不具任何意义：当公鸡在粪堆上啼叫时，就表示天气会变或维持原状。

这使我想起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说过的话。1907年华尔街崩盘时，一个记者问他对未来股市发展的看法，他回答得十分简洁，却有许多含义：“股市将会高低震荡。”如果我是他，我会再加上巴黎市徽上的那段话：“它摇摆，但永不坠落。”（*Fluctuat nee mergitur*）

股市大师吹嘘的例子相当多，多到可以再写一本书。

结论是，投资人应该永远保持最高的警惕，以防范这些算命师和预言家。但遗憾的是，大众总是健忘的。而且，大师们所做的承诺越大，投资大众就越容易轻信。大多数的人总是想，这次总该像大师们所说的那样了吧。他们渴望有预言家，并将曾经一两次成功预言股市经济的人尊奉为“股市大师”。

至于政治界、经济界内部人士所做的预测，也不比那些自命为专家的人更准确。20世纪30年代时，我常常去伦敦，那里住着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也是我年轻时最要好的朋友巴洛格勋爵，他是工党的经济顾问。从巴洛格处我可以得到一些伦敦股市的内线消息，巴洛格曾经是Falk公司的分析师，这家公司的股东都是像凯恩斯勋爵那样赫赫有名的人物。凯恩斯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奇怪的是，我通过朋友从这家公司得来的股市内线消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凯恩斯倒是从投机操作中赚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投机过印度卢布、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这些投资大都是做空操作。他的外汇投机相当成功，但是进入股市就不是这样了。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期间，他也曾在华尔街投资并一直坚持到牛市来临。

最近有一位新的“股市大师”在美国政坛崛起，就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他曾是里根总统智囊团的一员，据说现在是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但我不相信这个传闻，而且至今我也未见到能证实这个传闻的蛛丝马迹。

为何我会这么说呢？5年前，我曾和费尔德斯坦谈过话，我问他，美国的石油进口量有多少。他摇摇头，尴尬地回答，他真得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外贸政策的权威竟然不知道石油进口量有多少。美国进口的石油可是占了全球石油总出口量的1/4呢！

费尔德斯坦（他同时也是教授）应该会用到这个答案，以估量如何消除美国贸易逆差及国家预算赤字吧？照他的看法，美元应该会再贬13个格罗森（Groschen）以平衡贸易赤字。以他对美元的强烈抨击，不如说他是美国外贸游说集团的代表，因为美国外贸游说集团总

是不断地为美元下跌找借口。若是要我来反驳费尔德斯坦的所有主张，那么本书的页数一定会暴增两倍，所以，我只能到此打住。

日本产的汽车（第三大进口商品）进口到美国太贵了，因此日本人在努力实现在美国制造汽车。在美国，已经实现了每5辆车里有1辆是日本人制造的，很快会变成每3辆车中有1辆是日本车。这些汽车将很快出口到海外，为美国带来贸易顺差。

再有就是：日本汽车工业提前两年卖出了几十亿美元，美元汇率虽然不是非常划算，但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还没有人预订汽车，更不用说开始制造那些汽车了。我倒想请教一下费尔德斯坦先生，为什么会会出现这种现象。

## 创立乐观主义学派

专门分析股市危机的“股市大师”以经济方面的理由来解释下跌的股市行情。

华尔街股市在伊拉克对科威特采取武力攻击后急剧向下探底。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股票玩家、股票投资者或是股票经纪人对中东爆发的闪电战，除了恐慌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正确地说，引发这一股市反应的，并不是萨达姆·侯赛因，而是最新公布的美国失业率。当失业率从5.2%升至5.5%的消息在华尔街传开时，山姆大叔的股民们又一次神经紧绷起来。几个月前，股市才因为另一个理由而出现过重跌：当时的失业率下降。但是股民们认为，当大家对经济环境一片乐观时，美国的股市就要下跌了。

糟糕的是，这些美国证券交易的内行沦为了统计数据的奴隶，有一天，他们甚至掉到了极度悲观的深渊中，理由是上扬的经济景气指数会使美联储停止降息。第二天，他们又担心，因为听别人说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突然间华尔街的证券就好像掉进冷柜一样。要是利率降了，同时又传来企业的好消息，情况又会如何？

最近一个月的美国就业报告让华尔街陷入了恐慌，因为数据显示经济景气度出现了下滑。然而真实情况是：一年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公开宣布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恢复到2%~2.5%，以使经济适当降温。现在他成功了，投机者反倒不满意了。

格林斯潘实现了他的承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为2%~2.4%，但是股市对此无动于衷。华尔街一直在追问明天会发生什么。股市投机客就像是在玩轮盘赌，在红区或黑区下注，无论买进还是卖出，都要等第二天开市才会知道结果。

大多数的专家当然可以在一大早就知道要买或要卖，但是，人们真的有机会在早上就计划晚餐要吃多一点或少一点吗？难道多吃或少吃与胃口或是菜单上提供的餐点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真正的专家是不会在意短期震荡、阿拉伯独裁者以及失业率的。聪明的投资人也不会在意股市算命师，他们在道琼斯指数跌到3000点时便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道琼斯指数曾经两次来到2999.75点。“当指数无法越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点位时，就会再次下跌。”这是每一个技术面分析师都知道的理论，这套说法和美国著名的股市指数走势图有异曲同工之妙。股市指数走势图其实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拼成的，股市的3000点门槛就和1000点门槛、2000点门槛一样，不具有太多意义。

更重要的是，自1925年以来，很多中等市值的股票，股价已经翻了百倍以上，而绩优蓝筹股也上涨了25倍之多。

我要以最诚恳的态度说：所有这些年来不断预测经济崩溃的股市教主们的预言，都还未曾发生过。他们已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那一天的来临，但到时他们会心满意足地说：“不，我没有这样说过！”我的回答是：“有！你有！”即使发生了伊拉克危机，他们的预言仍然是错的。股市并不如这些人所讲的那样，相反，甚至可能和1939年战

争爆发时一样，突然冲到高点（这种既成事实现象，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

大多数的美国证券投资经理都错过了道琼斯从1900点狂飙到3000点的行情，自此之后，他们不断想追上大盘指数，但指数老是比他们的动作要快。现在华尔街的投资人只想在股市跌到谷底时再进场。

许多股票经纪人也希望股市跌到低点，他们因为害怕进场而建议顾客不要买，但之后总是会挨骂。此外，股票经纪人之间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观气氛，他们拉长了脸四处奔忙，因为他们当日的业绩无法和开销持平。每日1.5亿的成交量是交易所维持盈亏平衡的最低要求，但是即使这个数字并不算大，他们还是经常达不到。

同样是这帮“股市大师”，在1987年10月股市危机发生之后，他们就曾预言会有如同1929年经济萧条所引发的通货紧缩，这些人这次声称通货膨胀即将出现。他们的推论是，过热的经济一定会导致引发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通货膨胀会使美联储提高利率，而较高的利率则会让股市下探底部。

现在，“股市大师们”每天都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小事件解释成即将发生通货膨胀的前兆。失业率创新低，不好！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不好！出口贸易量上升，也不好！因为这些会让经济更热而造成通货膨胀。

这些片面、短视的新闻分析，对股市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投资人必须要有整体性的考虑，眼光也要放远些。调高利率不表示利率一定会高过公司业绩的利润增长率。尽管高利率会发挥刹车的作用，但刹车所造成的行情下跌一定不会引起崩盘。而且，经济冷却已经明显被感受到，因为美联储在过去一年里持续和缓地提高利率，它们已稳稳掌控了经济发展。

一直害怕通货膨胀的那些人可能会问，难道最好的避险工具不是黄金吗？但在我眼里，黄金根本就是毫无利用价值的资产。虽然黄金的价格相当低，但是现在苏联却因为西方国家对其经济抵制较为松弛而不断卖出黄金，以购买许多从前买不到的货物。

虽然黄金的走势如此之低，但其行情也有可能因某些政治事件而有少许上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便是影响金价走势的一个事件。苏联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

那么，当通货膨胀缓慢发展时，什么是最好的投资工具呢？

几周前，我路过维也纳的科特纳街，1919年时的记忆突然闪现在脑海中。有一天，一位因战争受伤的军人撑着两根拐杖站在某一个街角，一串鞋带捏在他的手里（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只有一条）。这个军人不断地叫卖，许多老维也纳人都还记得：“不是稻草，不是纸，

真的是日用品！”这段话让我联想到我想用来叫卖的一句：“不是黄金，不是白银，真的是日用品——股票！”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界上有一个由教授、经济学家、经济专家组成的悲观学派，他们与股市危机预言家和天性悲观者、银行危机、利率危机和其他悲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在此我要宣布，我将成立一个反专家的乐观主义学派，随时欢迎任何人加入。

## 第6章 股市和世界的其他部分

投资人不应该受到自己政治观点的影响。经验告诉我们，很多股票投资者因僵化顽固的政治立场而失去大好机会。

全世界的大部分股市专家从一开始就不受干扰，不会对政治信念有过高的评价，他们对所有事件的观点都基于自身在股票市场的投资。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政府的每一个新决策、新法规，只要是对他的投资不利，他就马上称之为愚蠢且不道德：“政府是最严重的罪犯。”反之，若是法规正合他的意：“这是多么明智的政策。”

有时我被问及投资人是否要有道德上的考虑，我认为这要看情况而定，要看是基于人道立场还是和立法上的道德有关，特别是在一些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我曾经认识一个投机者，他从维也纳来到巴黎。他在咖啡馆里问同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伙子，跟我说说吧，在这里，什么是被禁止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通过复杂的交易就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人们会想方设法战胜法律和法规。

基于人道立场，我认为在某些重要原料（比如棉花或是粮食）上做投机是绝对不道德的，因为这些股票和民众相关的利益有冲突。

但是明显的利他和慈善在股市中是这样做的：当存在做空投机者或一组特定的股票受到打压而下跌时，那些继续持股不卖的人就是利他主义者，他们“大方地”被做空投机者利用了。（对于此类卖空者，我稍后还会提到。）

## 先有投机，后有音乐

贝尔特·布莱希特（Bert Brecht）曾经说过：“吃饱饭是前提，其次才是道德。”对我而言，则是把音乐放在第一位，坦率说，这才是我的最爱。我要说的是我未能实现的音乐基金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金钱冒险。

“二战”末期，我将全副精力放在投资一些贬值的国家或地方公债上，我坚信经过一场混乱，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在这些负债经济体中，有些很快就履行了偿债义务，有些则经过长期逼迫才不得不还清债务。在这些贬值的债券中包括法国政府债券，长期以来我就对它有所打算。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不愿意偿还这笔公债，只愿意付清那些还在原始认购者名下的债券。法国政府想要阻止以低价收购这些债券的股票投资者通过投机买卖获得利润。这个立场虽然可以说符合一般道德，却与股市道德有所冲突。

股市道德认为，收购这些价格跌到谷底的证券是一件好事。要怎么惩罚那些以低价收购票证，却对未来价格走势有正确判断的投资人呢？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买了几公斤重不值钱的债券，同时也订下计划，这次的投资不是为了我的腰包，而是为了美妙的音乐。我要求法国政府按票面价格全额偿付，但为了要证明我不是个唯利是图的投资人，我要把从中赚到的全部利润来实现我的理想：成立促进法国音乐发展的基金会。

当我以远低于面值的价格收购这些债券时，总额已经足够为音乐做些有用的事了。同时，我的名字也能镂刻在某块金属纪念牌上，或者我也可以用这笔基金的利息设个“科斯托拉尼奖”。想到约100年后，每年都有音乐作品得到科斯托拉尼奖的表扬，这会是多么崇高的感受啊！

我制订了详尽的计划，听取那些欣赏这个计划的专家和其他人的建议。我开始梦想成立我的基金会。是啊，人人都可成为股票投资者，但不是每个人都可成为音乐家。在命运不让我成为音乐家时，至少在音乐史中我可以以赞助者的身份留下名字，多么完美的计划啊！但是股市又一次与我的计划背道而驰。

我在财政部办公室阐明基金会计划时，在同一幢楼里，一些负责的先生们正在谈论信用道德、债务人的承诺等。突然他们做了个出人

意料的决定，法国政府将全额偿还所有债券，不论持有对象是原始认购者还是新持有人。我这几公斤的债券将以全额面值偿还，只要到柜台办理就行了。这下就是要我狠心地从自己的口袋捐出一大笔钱。我虽然热爱音乐，但我更是个干练的投资人，而且终究不是天使，于是音乐基金会只剩下3个音符：哆、来、咪。

## 政治化的股市

股市和外汇市场在一边，政治和经济在另一边，像是相对的两个半球，而且是很明显的。这两个领域有各式各样的依存关系，就好像在一个系统里有沟通管道一般。人们常问哪一边会影响哪一边：是政治和经济影响股市气氛，还是金融市场的心理状态影响了社会？

归根结底这是个鸡和蛋的问题，当然国家政治对股市有极大的影响，利率和税务政策都由政府决定。政治风向（向左或向右）会影响投资人心理及企业的未来，国际局势也对股市有强烈影响。世界的形势（紧张或平稳）影响了大众的心理，国际关系的发展左右了整个行业发展、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国际商务条约等。伊拉克危机就是一例。

但是，如同我说过的，股票投资者会根据他们对事件的心理态度而在多头或空头市场上进行投资。我听过一个小故事，正好可以解释

股市和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有个股市老手和几个客户在一起闲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到底多头市场和空头市场是怎样形成的？”

这位资深股票投资者开始解释：“我举个例子，几十年前，有一天报纸报道了一位年轻英俊的苏格兰王子与一位迷人的西班牙公主订婚的消息。全世界都对这对可人儿着迷，随后打探更多有关他们的消息，也密切关注他们罗曼史的发展。这件事在大众间引发正面的气氛，也全面地感染了欧洲股市。股价行情持续上扬，许多投资人变得富有，有些人得到财富，人们购屋、置产、投资，经济一片繁荣。如此就有了多头市场。”

所有在场的人都点头赞同，他们记得这段父母曾说过的黄金时光。这个股市老手继续说故事：“但是有一天，双方家族传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坏消息，婚约破裂，王子和公主因吵架而分手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引起了股市最大的危机，行情跌入无底洞，财产消失，有人自杀。这是空头市场。”

一阵震惊后的沉默，先前那个提出问题的人，终于打破沉寂说：“贵族的婚约和股市又有什么关系？”股市老手答道：“奇怪了，当我解释多头市场时，你怎么没问我这个问题呢？”

我曾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投机是买通一个政治人物，再以他自认为合适的价格卖出。因为许多政治人物及负责国家经济及财政决策的人常常自视过高，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对大众有何影响。如同伏尔泰曾说：“伏尔泰是很有力量的，但是群众更具有力量。”

此外，政治人物常常无法理解国际投资人的计谋，他们不了解投资人的想法及影响力，却敢以未经深思的解释和语意混淆的定义来鼓动投资人。

只要任何一个政府负责人轻率地表态，就会有上千个大户或小户买入或卖出，不经考虑，常常还不合逻辑。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投机交易越来越多，而且势头猛烈，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甚至对大众媒体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1977年夏天，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特尔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同时宣布，不会对因经济因素而贬值的美元进行任何干预。但此类表示却已对美元造成了影响，而且是造成美元继续贬值，而这种贬值本身在经济方面找不到依据。

这个声明的想法本身没错，因为不进行干预正是汇率政策的原

则，然而强调此事却是不必要的。

从高层发出的这种暗示就如同对投资人发出了邀请，从而产生了其他连锁反应。伤害已然造成，连当时在位的奥匈帝国的经济部长兰多夫也发表了一个做作、卖弄聪明的声明：他担心两样东西——石油和美元，会很快达到统一价格150马克。

这有什么好处？这些声明话音未落，所有投资人就开始操作美元买卖了，或是做空美元。政治人物应该要认识到投资机制及投资人的心理，可是他们满足于用陈腔滥调来解释行情及价格的变动，从不去探讨真正的原因。如此一来，不论是对于原料还是货币市场，都无法防止混乱的发生。

事实上，政治人物应当比投资人更早采取行动，起码讲话要谨慎。在所有股市及市场上，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当投资人对一种货品、货币或是有价证券行情持有或高或低的预期时，或是被大众媒体说服后，投资人会大量买进或卖出，直到行情达到期待的价格。在这个疯狂的行动中，没有人会多加思考，因为没有人能从大众心理中解脱出来。这些买进某种货物的玩家不只预见事件的发展，还预见人们会向他们抢购这些货物。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这是预期的累积，被称为预期的平方，而行情波动背离逻辑和经济事实的结果就是崩溃。

那么这些在位者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防止愚蠢或是坏心眼的投资人所带来的灾害呢？这里有许多种方法和可能。过去匈牙利人说，最好的警察出身于贼。因此政治人物、财政部长或是央行总裁身边应该有当过投资人的顾问，这些人可以经常向他们提供帮助。

## 红色脚踏车

成功的投机者必须是思维敏锐的政治分析家和训练有素的大众心理学家，因为他同时要解开两个谜题：政治事件及储蓄者对政治事件的反应。针对某些事件，人们也许可以预测到逻辑性的发展结果，却很难掌握储户的反应。如同我曾说过的：战争爆发时，我们常常会经历行情一飞冲天的情况，也常见到同样的消息使股价跌入谷底。“事到临头才动手”，这种古老的股市智慧已不再实用，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是股市智慧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慎重权衡考量。

当我还只是个孩童时就已经体会到，投资不可以跟在消息后面跑。事情是这样的：1914年夏天，刚开始散发出的火药味引发了实在的投资热，人们投资于危急时期可能无法向匈牙利出口的商品，因此外国产品的行情上扬。人们的投资包括香草、丁香等，尤其是拉菲草，因为对匈牙利酿酒业而言，拉菲草是不可或缺的原料（酿酒师需要用这种叶子制作韧皮纤维）。

我哥哥当时在一家大银行当见习生，这家银行专门从事原料贷款业务，他因此得到了有关拉菲草的消息。通过跟一些朋友合伙和贷款，我哥哥向银行买了一些合约。那时的价格已因投资热潮而涨高了。

一开始，幸运之神似乎还很眷顾拉菲草。战争爆发后，拉菲草价格就像坐上火箭般向上冲。然而很快地，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联合军队闪电般侵入塞尔维亚境内，同时德军也击溃了俄军。这两个由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让人们以为和平将至，一切将会恢复平静。

拉菲草的价格开始下滑，而我哥哥已经负债累累，银行一直在催款，可惜大家的钱包都是空的。

我哥哥从早到晚都很郁闷，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行情上升一点会让他松一口气，行情下跌三点会让他跌入绝望之中。我们大家都和他一起经历了这种不断的跌宕起伏。来自前线的消息对我们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消息对拉菲草行情的作用。在哥哥得知父亲对他的求救声充耳不闻时，他恐惧得发抖，连母亲的劝说也没能使父亲动摇。当哥哥因银行的催款而惊慌失措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时，可怕的阴影笼罩着全家。

最后父亲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紧迫性，他得知哥哥将此事看得很严重而且攸关名誉时，便同意为哥哥偿还这笔巨款。从此以后，拉菲

草在我们家是个禁忌的话题。没有任何一件悲剧不会侵犯到家庭名誉，而我，则得不到期盼已久的红色脚踏车了。

严重的投资危机刚过没多久，就传来同盟国军队在马内及其他前线挫败的消息，胜利的希望因此破灭，战争无望地持续下去。拉菲草的价格再度攀升，但这一切为时已晚。

故事结束了，我的父母亲和哥哥早已过世，当时的拉菲草投资对现在的我而言微不足道，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深刻感受到当时的恐惧。

## 当股市变成人人谈论的话题

我们已见识到政治事件如何决定股市的兴衰。反过来，股市的发展也影响了经济、政治及社会。这在股市狂热情绪过度高涨的时刻，表现得尤其明显。

此时人们在社区的晚宴、鸡尾酒会、议会的走廊上谈论股市，交流彼此对股票的分析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当所有人都在谈股市时，你就必须退出。

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1961~1962年的冬天，纽约华尔街有如嘉年华会般快乐，股票投资者的生活幸福美满。当时的美国股市热潮达

到顶点，人们不需懂得太多股票的事情，只要今天买进、明天卖出，或是明天买进、后天卖出，就可以赚得盘满钵满。要是刚好抓到新的热门证券发行的机会，就会像命中靶心一样走运，新发行证券在上午还只是10美元，到下午就价值20~30美元啦。人们只要认识投资经理的太太的美发师，就能幸运地买到新发行的证券。

华尔街所有经纪人全力以赴，大约有30万名销售人员上班时几乎离不开电话机，因为任何一个电话都可能卖出去数百到上千股新发行的股票。当然所有新发行的股票都是热门的，甚至热到能使顾客烫伤手指。销售人手似乎都不够用，因此他们在媒体和报纸杂志上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交易量逐日上升，每天都创出新纪录。股票经纪公司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开发新顾客的渴望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

这幅热火朝天的景象令我回想起1929年时的夸张气氛，这种气氛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此时的狂热中，才能把一切卖给大众，不管是空中楼阁企业，还是什么月球房地产股票。繁荣景气最终在1962年的危机中结束了。

心理学和宣传，在繁荣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年前的德国也有过热衷于新发行证券的情况出现。一家休闲产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为了卖出新股票，它们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还邀请了十分有名的公众人物。大众预期这个股票的价格将会上涨数倍，于是市井小民几乎跑遍了一家又一家的银行，只为了在这儿买10股、在那儿再

买10股，起码可以买到一小部分，当时这只股票的发行面值约为370马克。

后来这只股票以面值500马克上市，然而以这个价格还买不到股票。当行情超过1000马克时，大量的股票（绝大多数来自英国）涌入市场。突然间人们随便就能买到这只股票，想买多少都行。而德国人民也全买了，从前没买到的，现在都打算要多买些放着，这都是心理因素使然。事实上银行早就知道，这家公司已经亏损，然而银行还是引导民众继续购买。银行的用意当然是要出清库存。所以我在演讲中一再重复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要跟随银行的提示进行交易。就像我常去的餐馆，如果老板推荐我点“时令牛肉”，我就知道他在厨房里还有几份“存货”要解决掉，所以我当然就不点这道菜了。

气球总有涨破的时候，现在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只不过是300马克。之后有一次，我有机会当着这家发行股票的银行总裁的面，毫不客气地引用华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里的一句话：“你们这些幼稚、装老实的人是最恶劣的淘气鬼！”

## 第7章 德国人的心理

对政治独具慧眼是我乐于拥有的天赋，但这能否为我带来更多的机会就不得而知了。例如1989年年初，我就预见到柏林围墙被推倒和与之相关的大事，却难以猜出两个政体的德国人民以及参与证券交易的大众将对此做出何种反应。

从长远来看，我非常乐观，因为就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而言，没有什么比拥有持久和平更好的消息了。对德国来说，这就是统一的进程，然而很多德国人并不期待这个前景，甚至不在经济上支持统一。许多难民和移民从东德、波兰和苏联来到这里，并没有受到热情接纳。

这让我想起“二战”刚结束时，当时我正和弗伦茨·莫纳（Ferenc Molnár）在百老汇大道散步，听到报贩在吆喝，说匈牙利重新开放了边界。莫纳开始抱怨：“我可怜的匈牙利人民，我可怜的姐妹，我可怜的侄子侄女……”我赶忙安慰他：“别担心，现在一切都好了。他们可以到美国来，一个接一个来。”“是的啊，”他低声说，“他们都来这里。”

西德的经济基本面非常好，出口顺差大，经济趋势良好，税收丰裕。当然，重建东德是要花不少钱的，这里我只想引用莫里哀的一句

话：“Vous l’avez voulu, George Dandin!”（您想得轻巧！）

首先是货币统一，不仅要为大众所接受，而且也是极为迫切和必要的，但是这件事非常棘手。不过也有先例可循。奥地利和匈牙利曾经在1918年以前就曾统一了货币，通过关税和经济联盟，这两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有各自独立的议会和立法，甚至有两个军队，但并不妨碍两国元首在法令上协同一致。

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计划，但我在德国没有投票权。解决办法是先让西德和国外的银行慢慢收购东德马克，使其币值翻倍。最大的市场是在苏黎世和维也纳，通过那两个市场，东德马克可以大量交易。

我的这项计划将使东德的生活水准马上提高，此外还要防止东德被投机取巧的人出卖。

但是最终的改革必须等到大选之后。最好是尽可能提早做出决定，以免给煽动者再鼓动沙文主义的机会。德国的民族主义给国外留下了糟糕的印象，就像一些政治家现在所做的，以前德国人没有做过。不过最后的改革仍必须看联邦议院的选择。

当时每位世界公民都在考虑这一事件——它代表了某个意识形态的崩溃，还是会带来统一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和计划。这么多的解决方案足以把全世界统一起来。

我也参与了，因为德国面对的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股市。法国财政部长路易男爵对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对科尔总理仍是有用的：“陛下，您给我一个好政策，我就能给您一个好财政。”

## 给波尔总裁的建议

以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卡尔·奥托·波尔（Karl Otto Phl）的政策来说，不久之前我觉得他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我认为德国终于打开了窗，让新鲜空气进来了，而不再是以零通货膨胀为最高的目标，这使得德国经济深受其害。迄今为止，这是德国中央银行副总裁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和他周围的金融集团的信条。在我看来，波尔先生当时实行了灵活的利率和货币政策，尽管最后只有中央银行委员会能决定是否提高利息。我实在很难想象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不是由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决定，而是由一些没有实质资格的人决定的，而他们的动机通常取决于政治、煽动的或是纯属个人的因素。

轻微的通货膨胀总是比哪怕最小的通货紧缩要好。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轻微的毒药，只要不失控就没有危险。经济受轻度影响，就如同尼古丁和酒精对于人类的影响一样。幸好通货紧缩通常只是心理层面的影响（当货币发行银行不帮忙的时候），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会反应在选举结果上。

如果下一次德国选举结果对统一不利，那么极有可能发生就算提高利率和美元走强也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我担心，红绿党的执政接管将引起大众的戏剧化反应，无法避免出现一个外汇管制经济。

波尔可以用正确的金融政策助科尔总理一臂之力，因为景气繁荣对他很有帮助。相反地，红绿党联盟用以对抗通货膨胀将是徒劳无功的，高兴的是那些想以通货膨胀来谋取利益的人。通货紧缩是个非常没有远见的政策，总是会以带来负面的政治后果告终。

德国中央银行前阵子才说到，对德国经济来说，美元走强并不是非常重要。没错！这听起来和当时西德的财政部长史托滕贝尔格一再重复的观点不太一样：“下跌的美元对德国来说完全起不了作用，联邦政府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太少了。”一国财政部长在出口比例高达38%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评论，实在是明显的胡扯。就算德国马克因为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及连带的负债而走弱，情况应该也不致太糟。

我呼吁波尔总裁：“不要惧怕中央银行委员会！您的命运和联邦总理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不在美元行情，也不在于利率高低，而在于一个国家的德行或是领导的潜力。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拿破仑的座右铭真是符合实际：“勇者必能赢得每场战役！”

这也适合经济联盟和货币联盟所表达的经济观点。关于国家的形式，是否要拥有或何时要拥有一个共同的国会和军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边界的困扰了。现在打算在匈牙利或波兰投资的西德企业主，即将把资金留在东德的重建上。这是一个大好时机，而东德即将带来德国的第二次经济奇迹。

今天的德国人对自己的经济有非常正面的看法，这种看法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事实上不太符合典型的德国人的传统思想。虽然我实在不喜欢宽泛的结论，但我还是认为，人们经常描写的德国人的性格——准时（在交货方面）、责任心（在货物的品质方面）以及勤奋，在那时的东德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现在东德和西德的勤奋已经褪色，但也许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的居民还是如此。

同样，德国人的浪漫可以在经济事务上产生正面效果，虽然我对此还没有机会多做补充说明。事实上，太过实事求是的经济观点确实不好，新点子、冒险心、想象力才是今日炙手可热的特质，而且应当将其变为行动。

我认为德国的浪漫天赋不适合用在政治上。但在经济上，我就比较喜欢浪漫的“接触”。然而我在德国人身上至今仍未发现金钱方面的浪漫，在这方面，德国人一直很正直，也不懂得乐趣。

## 交易者通行世界

在德国，大多数人害怕投资。德国的交易买主在金钱事务上不是那么老练，甚至缺乏经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更是个新手，因为德国并没有参与第一年证券交易的扩增。在希特勒掌权时，从1933年开始实行统制经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在这方面都还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近20年来，德国人对交易和投机买卖的观点已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但是20年的时间毕竟还算短，还不足以形成经验，尤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丰富经历，更显不足。

德国民众是保守的，两次可怕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德国储户心生畏惧，德国人已经变成一个靠领年金过活、只想要安全感的民族。

只有在做好功课与计划后，他们才会冒风险。一个年轻人曾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想知道如何做交易，因为他想以最快的速度赚钱，以便可以尽早退休。还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认为我的经济应该已经够宽裕了，为什么还要耗费精力演讲和写书，为什么不在南方某个小岛上享受阳光？我反问他：“您曾经享受过吗？”他说没有，而我的回答是：“我已经享受过了。”

大部分德国人想把他们的钱就这么存着，以为如此一来便不会有失去的风险。因为人们知道，如果买了股票，总是会有行情下跌的可

能。德国民众基于这种原因，宁可抱着金钱不动。

这样虽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结果终究还是会变得很糟糕，因为如果大多数的民众都把钱存在银行不动，市面上流通的钱就会越来越少，购买力降低，而存款利率又不足以抵消耗损的金钱。股票反而是一项比较好的投资，虽然股票会有风险，但总比定期存款要多获利好几倍。

一个小型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25年开始，中等市值的股票价格涨幅超过百倍，大市值股票则涨了25倍，而定存和贷款的增长则为12倍。法国人在20世纪说：“像股票持有人一样愚蠢。”如今的说法变成“像股票持有人一样聪明”。就如同一句谚语：“想睡个好觉的人会定存，想吃得好的人宁可买股票。”

如果德国人在百般不愿的情形下，仍然冒了交易的风险，那他们就会因为缺乏经验而颤抖得如同白杨树的叶子一般。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10个老手加上90个没经验的人，在德国则是5个老手和95个胆小鬼。

德国人的美德（如纪律和精明干练）不利于做交易，而德国人在金钱方面的技巧也一直没有长进。这个拥有浪漫、哲学家及音乐家的民族，一旦面对金钱事务，就失去了浪漫，失去以往对哲学和想象力的爱好。一位不喜欢德国人的著名讽刺作家卡尔·法卡斯（Karl

Farkas) 说：“德国人不但工作得多，也爱好工作，他们似乎真的是如此。”而我也因此对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重建持乐观的态度。

## 第8章 我的交易生涯

有一个对交易所的定义是“没有音乐的蒙特卡罗”。对此，我必须提出异议。夏天时，我住在离蒙特卡罗只有几分钟路程的法国的里维拉。只要偶尔心血来潮，想感受一下交易所的气氛时，我一定不会去蒙特卡罗。

可怜的蒙特卡罗只有几百个老先生和老太太，试图用一些筹码维持生活所需。现在我只要一想到每天在纽约交易所买卖的上百万股票，就会将其与蒙特卡罗的可悲景象形成强烈对比。

这是真的，很多玩家在华尔街就是这样处理他们的钱，就好像交易所是个大型赌场一样。交易所的游戏充满着资金和利润的诱惑力，吸引了上百万的小资本家的资金和存款。如果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怎么会有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的汽车、电子、计算机及其他革命性的变革？即使有时未经许可的交易活动会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但也总会产生一个不可思议的新行业。以一句话来说明：投机取巧者是经济的寄生虫，在自由资本主义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我曾经短暂地在交易所内享受过纸醉金迷的小圈子生活，但不是在蒙特卡罗，而是在巴黎。

华尔街著名的经纪公司在布隆尼森林举行高级社交晚会，庆祝公司成立100周年，700多个交易所玩家和投机家被邀请参加。来自纽约的高级合伙人向巴黎的高端投机者致以问候之后，便是翩翩起舞时间。在3种管弦乐器的齐奏之下，交易所内男女欢快地跳着舞，直到黎明。我玩得很开心，最优质的香槟酒、异国风味的水果、美丽优雅的花篮、戴着白色假发的侍者，所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和隆重。

此时，一位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士正试着从邻桌那儿得到可靠的交易所讯息，为的是能在下个冬天订购一件新的貂皮大衣；一个抽着烟的胖先生和他的同事谈论着，而他的脑子里早就计划好了如何用赚到的钱建一个游泳池。“我把新游艇取名为‘波音’，”我的老朋友对我说，“因为我买游艇的钱是投资波音公司股票得来的。我买进几个月后就卖了，股票竟然增值了好几倍。”人们说着各种语言，在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那是个在美元照耀下的夜晚，是和平共存的最好象征，也是个比在蒙特卡罗更有趣、更有声有色的夜晚。

## 熊和公牛

70年来，我生活在一个如同动物园的世界里。这里有很多朋友——贵族的后裔、知识分子、扒手和盗贼、有钱的大财主以及穷苦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交易所投机者：有科班出身的交易大师或一个钟头

换一个交易所的玩家，有业余爱好者、半业余爱好者，也有狡猾的投机者等。

另外还有一群专业的交易爱好者：银行家和职员、经纪人、代理人，一贫如洗的投资顾问——与其说他的职业是资产管理者，不如说是吸尘器推销员更贴切些。还有一群靠在交易所赚取手续费和佣金维生的人。

最重要的人物是“做多的傻瓜”“做空的猛兽”及其他的鸟类，他们聚居在这个我70年来所生存的世界。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我可以从这个动物园似的交易所里得到一些乐趣，年轻一辈甚至可以幸运地从里面得到好处。

交易所是个充满丰富多彩的世界，一片弱肉强食的热带丛林。有做空投机者和买进投机者，或者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描述——熊和牛。公牛是投机者的象征，冲在前面，以它的牛角把所有东西抛到高处，当然，最重要的是行情。做空投机者是猎人，在捕到熊之前，就先卖了兽皮，他很可能碰不到熊，那么早先卖出的兽皮，便必须再买回来。

在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中，牛都不希望看到熊，而熊也不希望有牛存在，两者的世界观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经济或政治事件，

他们从未有过一致的看法。做空投机者悲观地评论着每条新闻，而做多投机者却做出乐观的判断。

只要我有机会和交易所的投机者交谈10分钟，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投机者，因为交谈中没有一刻会离开交易所这个主题，我的“证券投资心理学”便可以快速判定出来。只要两个投机者碰面，他们不会问：“您最近好吗？”而一定是问：“您认为市场情况如何？”

投机者是只相当引人注目的鸟，他们的动机各有不同。一个典型的“聪明的投机者”代表是众所周知的维克托·里昂（Victor Lyon），在交易圈里大家称他为“吸血鬼”。他以掌握秘密消息出名，只要他知道有很多钱在做多时，他就开始做空投机。他总是一再重复说：市场上的技术形态是固定的，只要所有的股票被“弱手”持有，就一定会有市场危机。而他总是对的。维克托·里昂常说：“一天的做空投机比三十天的上涨行情使我获利更多。”

除了“才智”决定投机的方式，也有心理层面的做空投机，里昂决定成为做空投机者纯粹是个人心理因素：人们总是高估了钱的作用，或是某个人遭受胃病折磨而总是心情不佳，所以不可能成为做多投机者。

我在交易所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这样一个做空投机者。交易所顾问古斯塔夫·霍夫曼（Gustav Hofmann）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虽然他自称为银行家，但是他唯一的客户却是他自己。基本上霍夫曼做的是做空投机。有一天他来到巴黎，我带他去交易所了解一下市况。那时行情很稳定，他问我巴黎的行情如何，我把行情告诉他，他当时的回答是：“太高了，这行情真是离谱。”

牛和熊在经济上的利益正好相反，然而竞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两者的强弱与否，而是如上所述，取决于很多政治、经济及心理的因素，取决于不同形式的无法估量的事物。

牛完全不能想象行情下跌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行情上涨是很正常和理所当然的，他们视行情下跌为不可能。相反地，熊追求的是一种几乎违反常理的苦痛。熊曾被一位交易所诗人用以下的诗句来定义：“做空投机者会被上帝唾弃，因为他追求的是别人的钱财！”这样说也对，因为当其他人因股票行情下跌而遭受损失时，他就从中获利了，而做多投机者是通过企业股票的行情上涨来获取利润的，不会造成其他人的遗憾。其他人怨声载道的时刻，就是做空投机者欢欣鼓舞的时刻。根据经验，100个交易所玩家中，只有5个是做空投机者。市场崩溃正是熊大展拳脚的时候，它会对维尔海姆·布施微笑着说：“真糟糕！哈哈！但是对我可不是。”

另一方面，鸟并不在乎牛和熊所做的事，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是理论上的玩家。这类人对买和卖都心不在焉，他们把获利和损失记在脑子里，钱夹里则完全看不出有丝毫变化。但是当这些玩家获得理论上的利益时，他们是快乐的。

至于只在星期五购买股票的周末玩家，他们确信大家会在乐观的周末过后，在星期一做出买进的决定。但至今我还未发现他们之中有百万富翁。另一类只从事破产公司股票买卖的人，交易所的行话称他们为“潮湿的脚”，他们认为一定会有奇迹发生，可能发生在这里或那里。毕竟股票也可以买来当装饰品。

每个玩家的口味不同，有知足常乐者，也有谨慎小心者，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安全最重要”，有小赚而没大赔，能保持10%的收益率就已经很好了。

有野心的投机者宣称：“对小小利润感到自豪的人，不会赚到很多钱。”他们说对，在证券市场上投机，就必须这么做。

可惜大部分投机者都有个坏习惯，当他们的股票上涨了一点点，就到处吹嘘，赚到钱就大肆宣扬，有了损失就沉默不语。他们预言所有的行情并一再重复：“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他们总是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价，认为自己是天才，但我认为他们在说谎。

很多经纪人也同样是吹牛大王，他们大手大脚地过日子，花费甚巨，为的就是向全世界证明：看，我多么有成就啊！

最后，我们可以像刚开始所提到的，把所有的交易所动物简单分成两种基本类型。

以放高利贷自居的悲观主义者，吝啬、患有胃病、心情不好的人，他们是天生的做空投机者。

乐观主义者，胆大的人、冒险家、浪费的人以及轻率的浪漫主义者，他们输得起钱，他们是做多投机者。

## 投机家是稀有物种

做多和做空投机者——熊和牛，两者皆是投机取巧者。但这样的称号并不庄重，他们获得利润，也可能破产，这些都和交易所息息相关。他们从事冒险行业，同时自身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投机真的不是一般人能从事的职业，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职位，投机者有其经济上的职权，而且是处于自由资金系统之中，即使他并没有对GDP做出贡献。他无论在何处都介于投资者和交易所玩家之间，而且似乎是两者的混合体；投机者是必要的、机动的货币推手，总是在周期性的股价或行情波动时做出适宜的投资。

这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啊！他们是天生的投机者，如同天生的哲学家一样，但只不过是个小哲学家。投机者比其他人更多的是点子、突如其来的念头及远见，他不断权衡他所面对的事情的利弊，并归纳出是买还是卖的结论。如果他的估计正确，他就（从交易所）得到报酬；如果估计错误，他就得付（交易所）罚款。这是投机事业的本质。

我对“远见”的理解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有独特见解的想法，虽然刚开始看起来似乎不足为信，无法引起大众交易的兴趣，但是到后来却变得千真万确。投机者需要经验的累积，以便不断回忆起类似的情况，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创造了这句话：“每个发明都是由10%的灵感和90%的汗水组成的。”用在证券交易上便是：90%的成功是来自需要“流汗”才能获得的经验。投机者几乎是下意识地做加、减、乘、除。就像作家之于小说，作曲家之于主旋律，投机者靠的是他的想法来行事。

在找到主旋律后，再给出大致的形式，调和音调并编成乐曲，就如指挥家指导出整首交响乐，银行家则是在交易所为投机者和顾客安排交易。

投机者对其业务必须知道什么呢？法国政治家和作家埃多瓦·赫里欧（Edouard Herriot）曾经说过：“文化是当人们已经遗忘一切时唯一保存下来的东西。”证券交易也是如此，是一个人渐渐忘记一些

细节、资产负债表、红利、年报以及统计数据后所留下来的东西。匈牙利的谚语说道：“一个好的教士会一直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投机者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但他必须在关键时刻观察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并做出适当的处理。他不必知道太多，但要通盘了解。简单来说，他必须是个思想家。

这是多么舒适的工作啊！没有职员、没有老板，不用勉强露出友善的微笑，不用忙前忙后地处理事务，更不必像银行家或经纪人那样应付身边那些容易紧张的顾客。一个可以自由掌控自己时间的贵族，被自己香烟的烟雾所围绕，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思考，远离那些唯利是图者的喧嚣。他的工具是：电话、收音机和报纸。

但是没有人说投机客是魔法师，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的直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就是一位热诚的投机家。在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展厅里，挂着他的肖像，作为大英帝国的骄子，与莎士比亚、伊萨克·牛顿爵士、法兰西斯·培根并驾齐驱，英国政府为他写的赞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很成功，不用工作就得到了财富。”

世上没有比投机家更值得赞扬的职业了，如果不讨厌学习，这个职业还是令人羡慕的。

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思考——投机（也是传承自拉丁民族），在德国却没有好名声。股市在这里只是一个买卖股票的市场，而不是被看作投机活动的殿堂——没有投机就不会有股市，股市也就名不副实了。有人恶意诋毁，说是魔鬼创造了股市，想向世人证明，魔鬼可以像上帝那样从虚无中创造出股市。大错特错！股市不是什么魔鬼创造出来的。它起源于一棵树下，一个街角的咖啡馆里，直到有一天搬进了一个宫殿，并逐步形成了完善的股市交易规则和制度。

投机者的发展过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就像个无知的少女，有时也表现出人性的弱点：刚开始是一个好奇的人，然后玩乐，最后是贪财。很庆幸，我只到了第二个步骤。证券交易仍然是我最爱好的事物。

## 第9章 我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

有时我会以亲身体验来决定股市交易的策略。我想先讲一个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这家公司叫作A. T. T.，实际上是美国的一家大垄断企业。

1960年，我陪同报界总裁艾森豪威尔前往东方国家旅行，途中我因为感染流行性感冒，在新德里多逗留了几天，因此比当初预计返回纽约的时间晚了些。回到纽约家中，邮件已堆积如山。在这成千的信件中，我赫然发现一张电话公司寄来的账单，通知我两个月前还有8.31美元未付，因此我的电话被停机了，这对一个股市投机者来说，真是个大危机。

我不假思索地立即朝最近的电话亭狂奔而去，为的就是致电给电话公司。电话一接通，我便立即致上歉意，并解释我已经把支票寄出，请立即恢复通话。拜计算机快速作业所赐，几分钟内接线者已将我的相关档案拿在手里，令我极度震惊的是，我听到对方说：“别急！科斯托拉尼先生，您要付的不只这些，一个不按时付款的人在我们公司等于已失去信用，为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若想要恢复通话，您必须另外缴纳200美元的保证金，此外，您必须再多等14天。”由于延迟返家已令我异常紧张，现在又面临这个新情况，我真是快崩溃了，而且我觉得这一切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此外，对一个股

市投机家而言，少了电话还能有什么作为？14天对我来说，将宛如永恒般长久。

当下我立即决定要打赢人生中的这一场大战役，用大卫之剑战胜电话公司这头歌利亚巨兽。我将剑（也就是我的舌头）磨利，并以激烈的口吻反驳：“您竟然如此歧视用户，只因为晚一点支付那微不足道的8.31美元的账单，而且在没有经过确切审查的情况下，便对一位老客户的信用妄下结论，您要像对待小孩般打我的手心来要求我守规矩吗？”

“这是我们的规定。”电话另一头传来严厉的回答。

“好。”我以讽刺口吻反驳道，“我会把200美元寄给你们，但你们为何不要求缴纳500美元呢？既然我必须付这笔钱。除此我还能怎样？谁叫你们是庞大的垄断企业，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且渺小的消费者呢，如果现在还有别的电话公司，我会立即告诉你，‘见你的大头鬼吧！我找另一家电话公司去’。不过我会问问我的参议员及国会议员朋友们，他们对此有何看法。”

先前坚决的语气突然转为柔和：“且慢！且慢！科斯托拉尼先生，请您千万别把此事看得这么严重，我们会马上进行复查。”一分钟后我听到：“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们会尽全力使您满意，明天一早我们会派技工到您府上恢复通话，而且您不需要再缴任何保证金。

如果将来您因事情耽搁而无法如期缴费，我们只请您事先通知我们，以便延后缴费。”

第二天早上7点技工便到了我家，重新接好了电话线路。8点钟，我便接到电话公司的电话，询问一切是否恢复正常，而且我可以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能享有电话公司的优惠。

如同其他居住在美国而且有闲钱的人一样，我也一直持有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不过经过这次事件后我便不再持有了。因为对一家我竟然能够吓唬的企业，我宁可做它的顾客而不是合伙人。

## 和大企业交手

以上是美国的情形，但我与德国大企业的交手经验就不同了，确切地说就是德国少了一份特别的恭维，因为一间越大、越有声誉的企业往往越会显出其吝啬且吹毛求疵的一面。

西门子便是一例。有一次西门子的公关部门请我为一份新的目录写序言，并且规定我得在14天内交稿，根据约定，我可以获得5000马克的酬劳。我准时完成所托，于是相关主管打电话给我：“我们对此十分满意，支票会在月底寄给您。”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又接到另一个电话：“我们想把您的照片放入目录中，让股市交易投资人联想到那就是他们从电视、广播电台及其他媒体上认识的您。”我回答：“拜托，你们可以打电话给《资本》杂志，那里有数百张照片，你们可以选到你们想要的。”结果西门子选的是一张刊登在另一本杂志上的照片，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般坚持。不过我还是回答：“好吧！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采用这张照片。”对方再度表示异议：“不过摄影师索价500马克，这已超出我们的预算范围，所以希望这笔费用能从您的酬劳中扣除。”我立刻反驳：“您在开玩笑吧？你们需要我的照片来达到广告宣传效果，却要扣掉我的酬劳来负担这笔费用？您是从哪里学来的伎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这件事使我多了一个绝佳的主题，一个可以写出来消遣的主题。”

当然，当时我并没有将此事在媒体上曝光，不过事隔多年，我怎能不在我的书中提上一笔呢？

在我70岁生日那一天，我的朋友约翰尼斯·格罗斯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餐会，大约有40名来宾是来自年营业额达数十亿的大公司的管理阶层。当时我的邻座之一恰巧是某大企业董事长俄特克尔博士（Dr. Oetker），为了打开话题，我便主动对他提起年轻时曾对“俄特克尔博士发酵粉”的宣传广告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它在匈牙利已经是畅销产品了。

几星期后我收到一封董事长非常亲切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写一篇关于我年轻时为社会默默付出的文章，而这篇文章会刊载在其公司的杂志中；不过同时他也提醒，碍于经费，我的酬劳有限，希望我能体谅这一点。我则回了以下的内容给他：“因为我现在非常忙碌，所以目前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完成您亲切的建议所托文章。由于您也表明了支付酬劳的困难，所以我已经预先替您准备了一个方案。我不要现金，而想以实物作为报酬。我对发酵粉并不感兴趣，可是对您所拥有的世界级豪华餐馆还是很有兴趣的，您的艾登罗克餐馆距我的别墅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距离，若您能同意让我在您的餐馆消费以作为酬劳的话，那就太好了。”我的建议很快便得到回复：“俄特克尔先生对您的建议非常满意，更何况他也一直想邀请您到艾登罗克享用午餐。”很明显地，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我这封信的含义，而我认为，完全没有针对此事来回答，实在是很聪明的做法。

有一次，德意志银行乌佩塔尔分行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他的分行进行演讲，当时我们并没有谈到酬劳问题，因为我觉得不用多说，德意志银行想必不会期待这是一场免费的演讲。由于我曾为其他大型德国信贷机构做过演讲，所以我认为乌佩塔尔分行一定会被知会相关信息。那天晚上我受到总经理的隆重款待，而我以“金融本质与股市”为主题的演讲也在盛大的宣传下如期举行。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张500马克的支票，当然那时的500马克价值是远远超过今日的，不过却不够支付一场有5位客人的晚宴。所以我请德意志银行按照我当时的酬劳行情，再补2500马克的差额，但是我也因此收到一个难忘的回答，不是来自那位总经理，而是来自银行的法律部门。因为我对德意志银行还有一定程度的尊敬，所以至今我未公布这封信。这一群法学家写这封信的目的，无非就是针对我所提出的要求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放肆的行径，他们认为我可以在德意志银行的听众面前做专题报告，而且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新书做宣传，就应该感到满足了。如果我不放弃原先的要求，他们将会向上级报告此事，以后大家就会知道我做了什么好事。

这封信不只是恣意妄为，更是一种敲诈。我实在不知道该对这种无理的行为做出何种反应。惊慌之余，我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一位交情甚笃的老朋友、当时的《资本》杂志编辑霍斯特·施米茨（Horst Schmitz）。他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决定向当时德意志银行机构发言人克里斯琴博士报告此事。48小时后我便收到了一张总额如我先前所述的支票。

之后我还是继续为德意志银行做演讲，有一次在慕尼黑由彼得·冯·夸德（Peter Von Quadt）主办的演讲甚至还是免费的。彼得·冯·夸德是我的忠实朋友，也是我的学生。我非常荣幸能向这些年轻学子传授股市经验，而我认为，他们一定也非常满意这次学习。

在一次专题讨论后，我遇到一位在西德土地银行工作的年轻人，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为房屋广告杂志写一则有关私有住宅的文章，这份杂志将分发给130万住户。我告诉他目前我写不出任何新东西，不过在一份经济杂志中有一篇几个月前出自我手笔的文章，完美且几近伤感，一直到现在我看了还会感动得流泪。我认为这篇文章很符合这次广告的要求，“您只要取得再版许可就可以了，我会同意的。”我对这位年轻人说。

几星期后西德土地银行打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希望我能稍稍修改一下文章以便更符合他们的要求。此外，他们也要我的照片，理所当然，我会得到一份酬劳。

对于一篇刊登于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杂志上的文章，事实证明这份酬劳只有区区300马克而已。我把支票寄回并附上一封信，信的内容为：“我已经没落到需要人们给我零用钱来搪塞的地步了吗？”同时我还写了一则故事。

我有一位名叫弗兰茨·莫纳的朋友，与其说他是知名的匈牙利作家，倒不如说他是吝啬的捐赠者。有一天他在草地上散步，一个人试图和他套近乎：“莫纳先生，抱歉这样称呼您，我来自匈牙利，是科瓦克斯人，现在我有很大的困难，希望您能帮助我。”莫纳便从他口袋里掏出20克朗，递给了那个人。“什么！莫纳只给20克朗！”科瓦

克斯人激动地说着。我的朋友沉稳地回答：“不，因为一般人都给科瓦克斯人20克朗。”

借此我向西德土地银行表达，我是那科瓦克斯人吗？我在信中提到：“如果你们把一支圆珠笔、一个钥匙圈或一个烟灰缸当成广告礼物寄给我，我就认了；不过你们竟然寄这区区300马克给我。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必定会取笑或同情我。我会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给贵行总裁波廉先生。”

几周后我突然收到一份寄自西德土地银行的礼物，那是一本非常棒的旧书，一本关于财经和银行的书。他们大概感受到了我的愤怒，所以用礼物来解决问题。

## 大企业的故事

我想讲两三个和大企业有关的故事，不过在這些故事当中我并不是主角。

在布达佩斯多瑙市塞普岛上有一间名为塞普的企业，是由曼弗雷德·韦斯（Manfred Weiss）在19世纪创建的。曼弗雷德后来被授封为韦斯男爵，更被称为“钢人”。韦斯是聪明的工业家，靠生产罐头起家，并将事业拓展到所有的冶金领域，今天他的企业已经是一个工业

王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斯是军队最大的弹药供应商之一。战争结束，匈牙利陷入困难状况，他的企业帝国被收归国有。

韦斯有一位孙子，经常由法国的流放地前往布达佩斯旅行，人们传言，他在那里有一段外遇。在一次旅行中，他突然兴起了去拜访家族企业的念头。在大门口，警卫询问他的身份，他表明自己是公司创始人曼弗雷德·韦斯的孙子。于是，韦斯继承者到访的消息很快在工厂内传开，成群的员工好奇地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此事。对于这件事，大家似乎都不缺乏共同的话题。

当韦斯的孙子要离开工厂时，一位员工告诉工会主席：“我们必须禁止他再回到这里。”这时工会干部反驳说：“不，你们应该让他来，这样才能让所有员工看见，如果当初工厂没被国有化，今天我们就会有如此白痴的总裁。”

另一次愉快的私下访问则发生在雪铁龙的总裁安德烈·雪铁龙（AndréCitron）身上。他出身于贫穷的犹太家庭，并建立了同名的汽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雪铁龙几乎是法国经济成就的代表，也可以说那是安德烈·雪铁龙的全盛时期。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私底下都认得出他来。有一次，他开车经过西班牙与法国的边界，海关人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雪铁龙。”这时海关人员严厉训斥他：“我是问你的姓名，不是问你开什么车！”

安德烈·雪铁龙是一个聪明且特别受到员工爱戴的企业家，因为他本着人性的关怀及慷慨的心来对待员工。可惜后来雪铁龙沉迷赌博，失去了他的企业，死时一贫如洗。有关他的事迹，我在一篇专栏稿里写过。

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身无分文，有一次他去走访自己创建的工厂。雪铁龙先生到访的消息迅速传开，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往大院跑来，为的就是想和他握手。此时，公司的新经营者、米其林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在楼上对于这阵骚动感到惊讶。他问工长，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工长回答说：“安德烈·雪铁龙来了，员工正在欢迎他。”米其林很生气，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安德烈·雪铁龙，信中要求他不可再回到工厂，因为他如此受欢迎，会妨碍到生产的。

另一个聪明的工业家是马塞尔·达索特（Marcel Dassault），他是法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达索特在90岁时把一半的企业送给了国家，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为公司积极奋斗着。

以下的故事是对他个人特质的描述。达索特太太被绑架了，绑匪要求300万马克的赎金。当时记者问他要怎么做时，他表现出一贯的泰然：“我需要好好算算。”

达索特一生都很幸运，也难怪他的一本自传被冠以《吉祥物》这一标题。有人发现他的太太被扣留在枫丹白露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没

多久那位名叫卡萨诺瓦的勒索者便被逮捕了。达索特太太请求法院不要对他处以太重的刑罚，因为绑架期间他对她还不错。而她的丈夫在这名歹徒出狱时，还给他一笔钱作为重新开始人生的资金。

达索特是一个非常受欢迎、慷慨而且奇特的怪人，他经常会放500法郎在口袋，然后送给遇见的穷人。达索特也是个热情的股市投机者，他是一间美国股票经纪公司在巴黎的唯一客户，很快地他便授予该公司百万张股票的买卖委托，他的经纪人只要靠他这位客户便可活得很好。

如我所说，他是一个奇特的怪人。达索特总是在居斯达的皇家饭店与许多同事及朋友一同度过夏日假期，他们住一整排的房间。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每年夏天到此，达索特都会指定同一位按摩师为他服务，直到有一天这位按摩师向他告别。达索特问饭店经理为什么要解雇他喜爱的按摩师，经理回答：“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太老了。”

达索特问：“多老？”

“72岁。”经理回答道。

“您说这叫老吗？我都94岁了！”

达索特说如果这位按摩师辞职，那么他和所有随从人员就会离开饭店。后来，这位按摩师又继续为他服务了好几年。

达索特也是画作收藏家，他曾约我为这些画作写专栏稿。这是因为我当时开设了专栏的那本杂志才从时尚杂志转型，我觉得这样做也不会损失什么就答应下来。后来有人告诉我，那简直是很少发生的事，他和我一起“闲聊”了整整两小时，而通常他都会很快就觉得厌倦。

达索特有犹太血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过几年，后来他请自己的好友——天主教牧师培尔·里凯（Père Riquet）为他做洗礼。他去世后安葬在圣路易荣军大教堂。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既聪明又和蔼可亲的老先生。

## 是顾客，也是敌人

法国股市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是顾客，也是敌人。”它不同于一般企业“顾客至上”的说法。不过就法国而言，法国股市的名言比较切合实际。

招揽客户是一门艺术，需要运用心理学上的技巧及能力。我一生中积累了许多和顾客交往的经验。在证券交易所的生涯中，我大概有600位客户。当我还年轻时，尚未成为为自己精打细算的股票玩家之前，我只是个股票经纪人。这600位客户中，有些每天都会进行交易，

有些则是一年只做1笔交易。从中你可以看出他们非常有趣及独特的个性，当然其中也有无趣、平淡的普通人。

我的交友范围从小偷到王室成员、从快乐的房东到教会主教，好比一场聚集了所有人的联合演出，有些人一直扮演顾客，有些尽管不是顾客，也充当了中间介绍人的角色。有一位综合这两种角色的匈牙利人，他整天待在舞厅、俱乐部或赌场。

这个质朴、听话、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匈牙利小伙子在赌场工作，而且希望稳固他的工作职位。当时我常环游欧洲，他常邀请我到赌场玩玩，以便赚点佣金。有一次我出于好玩，在皇家饭店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是：“亲爱的朋友，我马上要前往巴黎了，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请你不要忘了帮我找一间好的赌场来助兴。你知道我有多喜欢那种极度紧张和兴奋的感觉。”这封信对他而言，值300法郎的佣金。匈牙利人是各型各色都有！有人会带客户去赌场，有人会带他们去股市做投机。这中间也没有太大差异。

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一天，这个匈牙利小伙子来到我办公室。那时我在一间非常大的经纪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当时巴黎证券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他告诉了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要介绍一位对股市有兴趣的大客户给我。当时我并没当一回事，他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人际关系呢？不过我还是答应去见那位大客户。

那天我在大饭店认识了这位有潜力的客人，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忆犹新。大饭店是这位名叫维斯（A. J. Vyth）的先生的固定住处，维斯大约60岁，年轻时住在伦敦，当时在一间纺织分公司任职，负责生产与销售，赚了一大笔钱，不过之后他整年都必须为税务诉讼而伤脑筋。虽然最后他赢了官司，代价却是赔上了健康。一度精神崩溃后，他在疗养院待了几年，直到住进巴黎大饭店。

我这位匈牙利伙伴没有说错，这个人的确非常富有，当时虽然正值纽约股市陷入危机的时刻，他手中持股的价值还有好几百万美元。我们谈到政治与股市，然后维斯让我看他的投资项目，并询问我该做哪一方面的改变，我这位匈牙利伙伴则在旁边当个缄默的听众，静静听着我们说话，不过他知道我会大方地给他一笔佣金，这笔钱一定比赌场给他的更多。

维斯对于我提出的建议很高兴，在我的公司开了很大的户头，这个户头维持了30年之久，直到他过世。尽管后来他真的生病了，而且十分虚弱，但他的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理智和聪明。

当时维斯对证券一窍不通，经常强调要严格监控大宗交易，以确保安全，这当然只是开玩笑。尽管如此，维斯还是经常告诉我：“你这个有着招风耳的匈牙利股票玩家（他有一张我的照片），我要叫我姐夫莫里茨·列米提库斯去巴黎，他会严格监控这本账里的任何一笔大宗交易。”好吧！有一天列米提库斯真的到巴黎来了，我

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并“严格监控”所有股票行情，看看是否有任何东西凭空消失了。唉！这种感觉真是痛苦，不过在他姐夫拜访过后，他便放心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块绊脚石：他老弱多病，而我身强体壮。我必须避免挑战他那颗无法形容的忌妒心。他期待我在每天股市交易结束后顺道去拜访他，做几分钟演示文稿。因为这些琐事，有时我还遭受着病痛折磨，甚至还有失眠的烦恼。总之，我也很同情我自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维斯满意。

他常去伦敦，且一定住在维多利亚饭店，这是一栋过时的老旧建筑，不过一直享有盛名。有时我碰巧到伦敦，我会住在沙沃伊，不过当维斯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时，我会给他一间位于半月街的小型公寓的地址。如果他知道我住沙沃伊，他的反应一定是：“好家伙，这一定是记在我的账上！”我承认维斯是个好顾客，而且我也合乎礼貌地为他的各项交易尽力。

他支持当时在法国持续发行的国家股票，并且每次债券发行时都会大量认购，而我则每次都会获得1%的佣金。不过每次我都必须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国家一定会负责偿还公债，如果将来有一天法国政府无法履行义务，我就必须担负起与国家抗辩的责任。这是认真的，一点都不开玩笑。

几年后他过世了，我亲自出席了在典哈格举行的葬礼，并且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在他的遗嘱中，他并没有把所有财产交给5位姊妹，而是让弟弟雨果·维斯（Hugo Vyth）继承，雨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

雨果在葬礼几个月后写信给我，因为他发现一些当时我为法国政府背书的签名文件，从那时候起法郎一直贬值，所以他要我赔偿一切损失。当然我并没有回复他，我觉得笨蛋才会跟他解释。在当今时代，如果国家破产了，国家并不会停止偿还债务，而是会让货币贬值。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同情我的顾客们，当然包括维斯，因为对他而言，我比法国政府还值得信赖，尽管他辱骂我是匈牙利的股票玩家。

有一天，一位我不认识、自称利伯（Lieber）的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他早已听说我在工作上的优异表现，然后他提出一个老套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我给了他几个立场中立的提示，以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就好比对着一群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进行股市方面的演讲一样，我必须先了解他是股市玩家、股票玩家还是投资者，试着了解他的财务状况，并从声音中判断他是企业主还是自学成才者。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也经常打电话给我，有时我还因此耽误了工作。我决定约他出来见面，他也兴致勃勃地答应了。几天后我们在一间证券交易所见面，然后就不

能免俗地聊了聊股市，直到我开始挑起无聊的小争执。我决定刺激他一下。

“我有一个想法，从中我看到了一些机会。”我开始我的广告策略。

“不过……”我突然中断谈话，对待应生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究竟是什么？”利伯先生感兴趣地问道，“您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是啊！我已经想好了，不过现在说似乎还太早。”我答着，并喝了一大口酒，“尽管我心中已经有谱了。”说了一句后，我又再一次叫来侍应生，当时我从利伯的眼中看出他正饱受折磨。

尤其是我一直重复着说一句话，喝一口酒，说一句，再喝一口酒。

突然间他不耐烦了：“您要说您的想法了吗？还是不想说？”

我决定不再折磨这个可怜的人，于是告诉他：“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您不是我的客户呢？”

“当然，当然，我准备要在您那儿开户。”他说到做到，第二天就成了我的客户。

究竟什么是我心中的“想法”？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每天都有太多的想法，不过，糟糕的是都不能确定。

还有一次，我接到一个自称是门德尔松的人打来的电话，她是英国公民且是著名银行世家的继承人，住在巴黎。“您是智者内森的玄孙女吗？”我问道。

“是的，”她自负地说着，“而且也是大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 - 巴托尔蒂的亲属。”借此我确定了她的身份，立即对她有了好感。

战争结束后，她当初被柏林银行没收的财产重新获得补偿，她把钱用来买股票，她想把股票清单交给我鉴定，于是我便去拜访她。她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公寓的10楼，那是许多知识分子居住的地区。她说一口很棒且有深度的德文。她告诉我，她想撰写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书籍。

我检查了她在—间颇具规模的联邦银行所开的股票账户，这是一个含有长期贷款与可靠股票的组合，我完全不需要提出异议。

我问她：“您在哪里缴税？”

“当然是在德国，这钱来自德国。”

我反驳说：“您是英国公民，住在法国，尽管存款放在德国，也不须承担在德国的纳税义务。另外，借助您的国籍、居住地及存款所在地的三角关系，您可省下一大笔钱。”

不过她的回答是：“不，那位银行经理也是我的朋友，他不会允许任何避税做法的。”首先，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告诉您一个典故。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法兰克福，时间大概在1800年。罗斯柴尔德坐在账房里翻查着账簿，突然间房门开了，一位普鲁士军官走了进来，并且以傲慢的姿态介绍自己：“普林尼兹（Primnitz）男爵，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副官。”

罗斯柴尔德友善地说：“请您自己找张椅子坐吧！”

“我重复一次，普林尼兹男爵，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副官，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

罗斯柴尔德再次礼貌地说：“请您自己找张椅子坐。”

“先生，您还是没搞清楚。我是普林尼兹男爵，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副官，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以及罗马教皇的侍从官。”

“请，请，”罗斯柴尔德无可奈何地说，“请坐两张椅子。”

“拜托！门德尔松小姐，您缴了三份税！”刚开始她还笑得很诚恳，不过之后就恢复了严肃，这时她不只是个柏林犹太女人，而且还是个普鲁士女人，这个笑话并不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再听她的故事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唆使她去逃税，我的建议只是选择有利的环境罢了。这个无罪的建议后来被不断地在德国的报纸杂志上宣传。

以上是我在和客户交往中所得到的体验。不过我必须强调，我自己一直就是我可爱的客户，我不曾向经纪人或银行家提出建议，所以他们对我根本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有人低声给我一个忠告，我还是会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我的格言是：“消息是毁灭的来源。”

## 第10章 股市心理学：迷信、拜物教和瘾癖

许多股市玩家（也包含一些股票玩家）有着迷信和拜物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危险；不过当某一特定股票在短时间内成为指标股时，这就成了无伤大雅的例外。股市投机者几乎都是迷信的，因为他通常会秉持一个从各方面来看都合乎逻辑的观点，而且是以确切论证为基础的观点。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仍会强调投机行为是不对的，然后他会说：“我真倒霉！”在他把失败归咎于倒霉时，就已经是迷信了。

通常迷信总和直觉脱不了关系，直觉是很有用的。当人们参与股市交易，感觉自己好像搭错了车时，通常会有必须往外跳的直觉，不过人们必须先确定这辆车真的是错的，而这就是思考与直觉的混合了。

一般而言，女性有一种特别且强烈的直觉和本能，这些特质往往可以弥补男人在逻辑思考方面的不足，所以股市投机者也应该重视女性的意见。

直觉只是一种无意识、出于本能的逻辑，是结合长年以来股市经验、生活体验及幻想而衍生出的一种产物。在夜晚，透过无意识的脑

力活动形成一种想法；到了早上，这个想法便衍生成了我们所谓的直觉与灵感。不过，若是单单只依靠和相信幻想，那是十分危险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迷信的。举例来说，我走在街上时突然发现，我竟然把一份重要的会谈资料放在家里，忘了带出来，但我又不能回头去拿，我会认为这可能是不幸的前兆。或者，我掉了一枚钱币，我会告诉自己，这次损失会有补偿，一定会带来想不到的收益。

不久前，在一场为税务顾问举办的联合餐会上的演说之后，我正搭出租车前往科隆机场，一位与会者邀我坐他的车一同前往，这是第一个好运。在机场，我在无预约的情况下，竟然在飞机起飞前20分钟得到一个座位，这是第二个好运。

接着，我惊讶地发现，身边坐的竟然是好友卡尔·齐默勒（Carl Zimmerer），他正好也要前往慕尼黑，这是第三个好运。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卡尔顺势谈到刚刚才买的一只股票，这话题实在是令我再满意不过了。就在到达慕尼黑的同时，我也得到了一张订单。直到现在，这份好运还伴随着我。

有时我也会有情感上的考虑。童年时，我读过一本名为《隧道》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伯恩哈德·凯勒曼（Bernhard Kellermann）。这是一本科幻小说，描述当时美国与欧洲共同建造一座隧道的过程。当双方在凿通的隧道中央见面时，那种欢腾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所以

现在我买了英法合资的欧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Gesellschaft）的股票，只是为了把握英吉利海峡隧道开通的最佳投机时刻。也许会有损失，也许会赚得更多，无论如何，购买这些股票是出自于我的多愁善感及个人的业余爱好。

我有许多护身符，而且会随身携带。我的护身符是一个小小的圣安东尼像章，受到过两个天主教贵人的祝福，一位是教皇约纳斯二十三世，另一位是巴黎红衣大主教。当我在咖啡馆不小心打碎玻璃杯时，我会立刻捡起一块碎片，包起来当成吉祥物。到现在为止，我的生活一直都过得很顺利，因此我很感谢上帝。不过，我究竟该把多少部分归功于幸运物呢？这是信仰，还是迷信？我觉得两者都有。

但当一个人依赖迷信来进行财务投资时，他便成为一个玩家，就好比年轻时的经历：我知道游戏的规则，而且是在痛苦中学习的。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長，现在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固执的人，我认为让自己有一些无害的迷信和拜物心理，那是可以的。

有些股市玩家相信数字魔术以及日期重复所代表的意义。若碰上13日恰巧是星期五，人们在做重大决定时总会特别谨慎。即使有肯定的想法，我也会说：“我正巧在今天冒了一个险！”

在芝加哥的期货指数市场，每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复的特定日子，将有三个期权在同一天到期，这天就被芝加哥投资人称为“三巫

日”。他们定期重复着恐惧，害怕在这个日子里股市会发生大危机。当然这纯粹只是迷信罢了。同样的道理，人们也可以将棒球比赛的结果或女性身上的裙子作为判定股市趋势的依据。

这群股市玩家并未以轻松和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事情，反倒是将他们既定的想法加入了愤怒，并且神化，这便成为一种变态行为。神化论者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最后都对迷信感到失望。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和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被人们神圣化了。

多年以来，所有股市玩家都为流动资金所迷惑，这是有逻辑可循的。银行为了吸引存户，就会调高利息，但高额的利息却不利于股市发展。不景气时，人们指望股市会更好，而联邦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就会调降利率。低利息，就意味着更多的现金流动，对股市而言是最佳的利好。

后来，经济指标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当增长率上升到某一水平时，投资人便积极买进，增长率上升会伴随有更高的利率，这对股市其实是负面的影响。令人生气的是：增长率数据每星期都在修正。

另外，期货投机者的理论也是十分荒谬的。不久前，我认为在银价和大豆价格之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差距；当银价上涨到一定行情

时，大豆价格也必定会涨。为什么呢？因为投机者利用这两种物品来谋取利益，当银价上涨至一定程度时，这些投机者手中便有更多的现金可以用来购买大豆。

基于同样的理由，玩家肯定地认为，相同的理论也适用于贵金属：当黄金价达到某个点的时候，铂金一定也有上涨空间。但结果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铂金价格都在黄金之下。结论错得离谱。

我认为这些理论适用于愚昧大众，只适合于那些必须给顾客建议的经纪人。他们的预言几乎很少实现，意见也几乎每天在变，所以就算他们做了几十种分析也是白费力气。这些分析一文不值：看上去越科学的分析，造成的后果越严重。在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中，童仆奥斯卡唱道：“奥斯卡知道，但是他就是不说。”而那些经纪人在说，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 交易还是轮盘赌

炼金术士、观星者和预言家仍存在于当今社会中，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出现。现今的炼金术士不再期望能点石成金，而是希望借他们的理论来达到影响黄金价格的目的，进而从中获利。还有些所谓的千里眼，他们用石头、咖啡渣来研究彩票或轮盘的中奖号码，或者是

以股市行情曲线解读未来的股市趋势，他们借助计算机、尺、圆规来计算。

不管是彩票、轮盘还是股市，对这些自诩为具有科学头脑、过度自信的人，我都称之为“着了魔的人”。如果他们是靠分析系统来卖股票，我就称他们为“江湖术士”。我觉得和他们讨论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的论点属于神秘学科领域。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群众拥护，不过一旦无法掌握群众，就要倒大霉了。

在某种程度上，热衷于图表分析的股票盘势分析师都属于“着了魔的人”，但他们得到股市经纪人的全力支持。在我看来，阅读分析图表固然是一种科学方法，却无法带来知识。当然，我也会观看价格走势分析图，因为孔夫子曾说过：“鉴往知来。”

借着分析图，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昨天和今天是怎样的情况。到今天为止，价格曲线是真实的；不过从明天起，当它再度被展现出来时，却被杜撰成了好的或坏的。图表只是一整幅马赛克图画中的一片而已，人们应该对图表做出分析。但是不能仅仅依靠辨认“肩-头-肩”“同侧”“蝶形”就拿钱去冒险。

罗伯特·普莱切特通过自己的书和金融通讯推荐的“艾略特波浪理论”，在我眼里与咖啡馆读物无异。他鼓吹做空股票。但是行情在上涨，所以要当心，行情可能先上涨几个点，然后突然加速上涨。他

日复一日地重复做空建议，他的读者可能每周都会因为听从他的建议而亏钱。

传说艾略特先生是在病榻上研究的股市价格运动规律，并总结出了那个划时代的理论。我对此一直不太理解。而他的门徒罗伯特·普莱切特之流也无法解释清楚：“您不要问为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他在书的序言中表达的意思。他的唯一论点是：过去是怎样的，现在也是那个样子。

我不曾在股市中见到过任何成功的图表解盘家，因为他们通常最终都会走上破产之路。在以前的维也纳，人们称他们为“年轻的股市股票玩家、老的乞丐”。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是大人物。

看图表的人可以发现股票上发生的一些情况，根据股票的动静可以做出一些推断。比如，一只股票的价格曲线出现与大盘走势不符的情况时，可以推断是大股东在做交易，企业不看好未来前景，因此应卖出手中的股票。

整个市场的图表就像是整个诊所的主任医生看到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体温做出的图表。

## 狂热分子的下场

就像轮盘赌客一样，股市分析师也是不折不扣的狂热分子，他们靠计算机工作。在许多赌场中都有这种组织，他们拥有一些数字，并将数字输入计算机中计算，然后便一直不断地重复这些做法好几小时。不过你不需要问结局如何，因为晚上时，他们仍在吹嘘自己的幸运，并且自认为已经发现正确的数学公式。3小时后，他们就两手空空了，不得不向人借一些钱，为的是重新激活这个不会出错的系统。

但我始终没有加入这种游戏，因为这种过度的紧张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就算在股市，我也从不研究当时的行情，我对这些不断的变化实在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对一个狂热分子而言，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的游戏系统一开始便成功了，之后他就会变得更加狂热。从前，维也纳流传着这种说法：“犹太人在损失了最后1000元后，便失去理智。”现在则改成：“玩家在赢得第一个1000元后，便丧失理智。”

有人告诉我的朋友，在赌场里碰到了他的儿子正在玩轮盘赌。我的朋友马上问道：“他是坐着，还是站着？”如果他站着，只不过是随便玩玩，可能赢钱，也可能输。如果他是坐着的，就会一直玩下去，直到口袋里一分钱都不剩。就像100年前蒙特卡罗的那个说法“赌红赌黑都不会赢，只有白色能赢！”而白色指的就是赌场，最后的赢家一定是赌场。

轮盘玩家会享受到赢的快感，这是肯定的。不过，他的第二大乐趣就是输，因为他把过度紧张的感觉当成一种娱乐，已不再是为了钱。因此，许多百万富翁便成了上瘾的玩家，不同的是用多少钱来测试运气罢了。

游戏玩家可以获得哪些成就？安德烈·雪铁龙可以充分说明。这位天才的汽车业巨子及工业家沉迷于赌博的下场特别悲惨。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法国的超级巨星。雪铁龙曾举办过别开生面的汽车巡回赛，拥有穿越非洲大陆的“黑色车队”和驶向中国的“黄色车队”。他引人瞩目的想法还包括要将巨大的“雪铁龙”字体装饰在埃菲尔铁塔上。就在他提出这项特别的想法时，危机也同时而至。

在巴黎乡间一间非常高雅的疗养中心里设有赌场。赌场是许多巴黎上流社会人士假日聚集的场所。实际上，雪铁龙并不是真正的纸牌玩家，当他在大厅开始玩牌时，或许只是想在这里赢一点，那边输一点罢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第二天报纸会在八卦专栏里报道：安德烈·雪铁龙整晚焕发光彩，在赌场豪赌。

但是就在第一晚，雪铁龙不但赢钱并且上瘾了。从此他每个周末都待在巴卡拉特大厅，一输再输，不断地输。尽管他的太太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让他停止这项游戏，却都失败了。

安德烈·雪铁龙一点悔意都没有，到后来甚至输掉了公司的大笔金钱，并且又向银行大量贷款。直到有一天，银行负责人来拜访雪铁龙，看到他有如精神错乱般地疯狂豪赌，才决定中止他的信贷，雪铁龙就在赌桌上失去了他一手创建并经营成功的汽车公司。

赌博如同毒药，像吗啡和可卡因一样，会危害上瘾的人。

许多股市玩家不只将他们的热情投入到股市之中。我有一位朋友上午在股市，中午玩赛马，下午和晚上则分别玩桥牌与轮盘赌，死的时候一贫如洗，这当然是他的下场。玩家还会将命运的挑战当成娱乐。我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不过他的电车票是经常都不打孔的。他的游戏就是：当我打孔而验票员没来检查，算我倒霉；如果验票员来查票，我很幸运；当我没打孔而验票员来查的话，就是特别倒霉；如果验票员没来查，就是特别好运。

一旦踏入赌场或股市大厅，就算是最有智慧的人，都会把才智搁在衣帽间里。我认识一位数学家，他被视为专业领域中的权威。有一次我们站在蒙特卡罗的轮盘桌前，观察着游戏玩家，他突然告诉我：“安德烈，你看那边的一个白痴，他一直坐在黑色前，难道他没有察觉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系列吗？”

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作“赌徒的谬见”。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赌徒》一书中提到的：“当球已经落在红色10次时，当然没

有人会再把钱押在红色部分。”股市投资人也完全以此为出发点，他们秉持着“红色系列”一定会结束的理念，也就是当一段行情到达高点时一定会往下落的想法。不过，统计上的观点并非绝对如此，因为就个别情况而言，一个人无法事先断言，在某一特定日子里，股市行情是否会上升或下跌。有时就是会长时间地维持着红色或黑色。

## 股市上瘾症

股市也容易使人上瘾，因为那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人们在这个激烈战场内所呼吸的空气犹如毒品般叫人上瘾。在混乱的战斗场所中，空气有如药物般影响着所有人。我认识的很多人起初只是在偶然的情形下进入股市，不过之后就无法摆脱了。下面讲的故事是个最好的说明：1929年，纽约有上千名股市专家丢掉了饭碗，不得不转行去找别的事做。两个股票交易所的前同事碰面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干什么活计？”那个人答道：“我为一家企业推销牙刷，你做什么活计？”“我还在证券交易所，只是我太太以为我在一家俱乐部给人家弹钢琴伴奏。”（作为前经纪人，这个工作还算不错了。）

我有一位股市上瘾症朋友，他过去从事钢铁行业，发迹于朝鲜战争期间，并做了上百万笔的交易，他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勤奋的工作。在他的眼中，玩股票的都是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者，而且是经济

的寄生虫。但我警告他：朝鲜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他可能会需要买股票。他可以把“辛苦赚来的钱”买成好股票；他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股票名单。

在听过我的意见后，第二天他便来找我，要我为他选出一组值得购买的股票。他并不想投机，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首先，我写了德国扬格债券给他，其次，便介绍南非钻石厂戴比尔斯的股票，然后是一些美国的蓝筹股。事后证明这份清单非常奇妙，扬格债券很快便涨了几百倍，戴比尔斯股票增值了10倍，其余股票也都表现得很强势。在第一次买进股票就有如此丰厚的收益之后，他便开始越买越多，从纽约、欧洲买到澳大利亚。刚开始还以现金购买，到最后便融资购买。在股市达到最高点时，他发现借贷已是他全部资产的5倍，另外，他也发现股市有下滑的可能。随着贷款与资产的差额越来越大，我的朋友终于无法承受刺激，因为精神崩溃而被送进了医院。

他的家人在混乱中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决定处理掉所有的股票。他的股票全部被卖光了，而在他接受一个多月的睡眠治疗期间，股市崩盘了。我的朋友完全治愈离开医院时，正是行情处在最低点的时候，不过他很冷静，宛若重生般地笑着。睡眠疗法拯救了他的财产，那些融资买来的股票会让他走向毁灭。这也使我更加欣慰，因为是我引诱他进入股市游戏中的，幸好有完美的结局。结局好，一切就好。

可是，当人们对股市上瘾之后，事情便不再如此简单了。当他们手中有股票时，会担心价格下跌；但是手中没有股票时，他们又会担心股票可能上涨。我这位恢复健康的朋友也是如此，他又开始买股票了。

尽管我鄙视股市的寄生虫，即那些每天杀进杀出买卖股票的人，不过，我承认如果没有他们，股市就不能成为股市；没有股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越多的寄生虫参与股市游戏，营业额及资金流动就越大；有越多的资金流动对投资者的保障就越大，他可以在高度流动的市场中随时卖掉股票。

如果要我以一句话来为这些投机故事做总结，那就是：赌徒应运而生，不管他赚过或赔过，赌徒永远不死。

因此我也确信，在每一次股市萧条之后，虽然当时人们对股票感到厌恶，而且觉得受到了伤害，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过去的种种伤害，又会像飞蛾扑火般再次被股市吸引。

我常把投机者比作酒鬼：在酩酊大醉之后，他会感到难受，并在第二天痛下决心，永不再拿起酒杯。但到傍晚，他又喝起鸡尾酒，而且一杯接一杯。到了半夜，他又像头天晚上一样酩酊大醉了。

他们是不是全都是着了魔的人或蠢材呢？也许是吧，但这个世界和股市如果没有这些笨蛋会怎样呢？如果没有这些笨蛋，又哪来的股

市赢家？

## 第11章 傻瓜的价值

约翰尼斯侯爵一直是我最想见的人。私底下的他，完全不同于在公开场合中的花花公子形象，其实他是一位非常聪明、博学、相当健谈的人，谈话内容深不可测，有时甚至语带讥讽。有一次，他提出建议，想与我共同撰写一本关于愚蠢人性的书！

阿尔伯特·哈恩（Albert Hahn）教授是一位有着父亲般威严感的朋友，他时常提醒我：“你不能低估人类的愚蠢。”我永远忘不掉一位经纪人朋友，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60岁的老人了，现在应该已经80岁了。他把一生积累的股市智慧总结成了一句话，经常不断地跟我说：“股市行情只取决于一件事，是股票比傻瓜多，还是傻瓜比股票多。”

上天保佑！幸好在股市中有无数的傻瓜，如果没有这些傻瓜，股市不知会变成什么样。我喜欢到证券交易所去，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遇到这么多的人，而且他们随时都精神紧张。任何一位成功使股市指数从100点上升到110点的人都大可以天才自居，此外，他也能料想到自己会有一笔丰厚的奖金。至于那些失败的可怜人，就不知道要挨多少耳光、忍受多少折磨了。

对他们来说，多听、多了解是很重要的，就好比他们时常关心与分析全世界的经济事件一样，也如同一位优秀的纸牌玩家必须熟悉玩伴的思路。投机者从别人的愚蠢中所获得的利益往往比靠自己的智慧得来的多，人们可以从别人的愚蠢中学习，尤其是学习如何不重蹈覆辙。

卡尔·法卡斯（Karl Farkas）是一位维也纳小型表演场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有一天晚上他在舞台上大声向观众咆哮，严肃地大叫：“你们都是傻瓜。”没想到观众哄堂大笑。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在自己的证券交易大厅里如此说，不过，观众一定不会笑，因为我的同僚大多是自视甚高、自以为聪明的家伙。

## 自作聪明

股市投机者总是认为，尽管同事在别的地方不见得有多聪明，但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比自己更多的消息和信息。对于这种心态，我想以发生在“二战”后的一则故事来加以说明。

由于缺乏外汇，当时法国对于外国货币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所有法国人都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通过银行进行国外有价证券的买卖。另一方面，政府对输入国外有价证券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配额限

制，人们无法向巴黎引进国外的有价证券，除非他们输出其他同等金额的有价证券来获得相同价值的外汇。

当时，法国石油股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证券，尤其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的股票。为了引进荷兰皇家的股票，输出其他同等数额的外国证券是必要的。

这时，没有任何价值的日本债券突然被股票玩家注意到，事实上，法国和日本之间毫无关系。日本债券，这个不被人注意的名词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只有少数人知道，更别提在国外了，知道的人是少之又少。但是突然间，日本债券出现在瑞士，无数吃惊的观察家亲眼看见日本债券不断充斥市场的过程，不过就是没有人知道原因何在。

“瑞士人是买家”的谣言一直不断地在巴黎市场上流传着。事实上，是法国银行不断以国际套汇的方式拼命购买日本债券，消息灵通人士也了解到，这是为了在瑞士再卖出股票的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在瑞士也流传着“巴黎人是买家”的谣言。实际上，不断买进的是瑞士的套汇银行，而知道内情的人士也很清楚，这是为了在巴黎再卖出股票的伎俩。

巴黎的人们不断窃窃私语，认为瑞士人知道一个可能与日本有关的计划；而瑞士人也认为，法国人有关于与日本协商的有利消息。尽管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但是所有人却仿佛都有了共识。

一些门外汉、小额交易者当然不甘心，想尽办法要刺探情报，而且密切注意事态的变化。由于消息不断被炒热，行情便逐渐上升，直到超越理性的界线。

位于远东的日本呢？一点动静也没有，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整合动作。事实是什么？而秘密又是什么？事实是，当法国市场想设法得到荷兰皇家的股票时，套汇者便抢先在瑞士股市购买股票，以便之后能在巴黎卖出获利。这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运作，人们可以用外汇来支付，这些钱来自卖出一项国外债券，也就是从巴黎出口至瑞士的外国债券。

所以大家必须找到一项标的，既可以在巴黎买到，又可以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在瑞士卖掉。“日本债券”因此脱颖而出。人们可以在法国买到任何数量的日本债券，并且公开地在瑞士卖掉。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其他的套汇者在瑞士购买日本债券，然后将之寄到法国，在法国股市贩卖；他们以等值的法国法郎在瑞士市场购买外汇，为的就是支付在瑞士买的证券。因此，这些相同的股票便可以不断地在法国与瑞士间往返。庞大的套汇银行把这些“日本债券”从巴黎寄往苏黎世，然后黑市的套汇者再把数量完全相同的股票寄回巴黎。按照逻辑推论，如果双方一直照此进行，一点也不会影响行情，因为在天平的两端，一直有数量相同的股票随时供应买卖。

不过，当有些人看出在大宗交易里潜藏着利润时，便开始破坏这个均衡，在天平的一边放上1磅，另一边只放上几克，股票便如失衡的天平般开始倾斜。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一则与日本共同协商的规则被提出来，这项新的股票规定让所有人几乎无利可图，因此行情大跌50%。

有些人一直以为同事知道的比自己还多，这则故事可以说是最好的一课，或许是吧，人们总是幻想着邻居的草坪比自家的更绿。

## 博学的笨蛋

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念经济学，尤其是在德国？答案很简单，他们需要在名片上冠上经济学学士的头衔。大公司及银行特别喜欢聘用经济学学士，因为顶着经济学学士的光环仿佛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文盲。

在所有文凭中，经济学文凭是最容易到手的，特别是与工程科学相比较，更显得简单，人们只需要熟记几本书即可，根本不用费太多脑筋、花太多心思，就可以轻易栽培出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学士。对此，我深感同情，因为他们必须浪费4年宝贵的时间。此外，我也声称经济学是一种假经济，他们所学的根本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

我不是唯一支持这个论点的人，巴黎股市第二大经纪公司（大约有400名员工）征选员工时，只要有经济学学位的人来应征，便立即叫他们靠边站，理由是：他们只是一些戴着眼罩生活却不会全面思考，而且自以为是的人。

有一次我和交易所的一位同事聊天，他自以为聪明，聊过两句后，我便发现他是念经济学的。然而他并没有察觉自己的论点及分析简直狭隘得像是被束缚在紧身胸衣里的妇人。唉！想不到这些东西他竟然要念四五年？

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一件趣事，有次在回答有关相对论的问题时，他提到：“有一位年轻小姐坐在我的怀中一个半小时，感觉上好像只过了5分钟而已；如果我必须坐在高温的火炉前5分钟，那就像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对此，他身旁的一位听众低声说道：“就因为这个他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吗？”

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坦白往往是坦率且深具内涵的。他是纽约政府的最高首长，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美国政治人物，差一点就成为美国总统。在一次民众集会中，有人大声问他：“嗨，市长先生，您毕业于哪一所大学呢？”“我吗？纽约市的鱼市场！”阿尔伯特·哈恩也一样，他是经济学教授，留下了大约4000万美元的财产，他简短但诚实地写下他的股市投机活动：“我根本不在意自己当教授时说过的那些蠢话。”

我给所有念经济学并有意投身于股市的年轻人一个建议：马上忘记大学中所学的，否则这对于未来的工作将是一种负担。

## 我与IOS

《资本》杂志创办人阿道夫·特奥巴德（Adolf Theobald）邀请我担任该杂志的专栏作家，这也许是对我人生后期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有了25年的交集。我从不掩饰自己的投机者身份，甚至还以此为荣。后来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背景，我可以谈谈货币和股市，如今我是该杂志编辑手中最老的一件古董了。

然而，人们真正想看的是我的股市诀窍，可我从没这样做过，因为所谓的股市诀窍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同意中国的一句俗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但是我不会回避提出“负面”警告。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抗争，以对抗IOS诈骗集团，在当时这个集团以每年15%的回报保证来迷惑大众。在这次抗争中，我感受到各方的强烈阻力，当然也有来自《资本》杂志编辑部主管的压力。许多人告诉我，我当时针对基金狂热者所提出的警告，德国读者一定不想看；人们想看的是能够致富的诀窍，而不是阴暗、负面的预言，尤其是预告人们可能损

失所有的钱。正如艾利希·凯斯特纳（Erich Kstner）所说：“好消息在哪里？”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的想法便得到证实。IOS这个骗子集团是如何结束的，今天这已经是财经史上的一段著名历史，也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愚蠢的故事。当时和我对抗的IOS代表甚至寄恐吓信给我，说我败坏了他们的企业形象，今天他却告诉我：“科斯托拉尼先生，您的画像还一直放在我的书桌旁边。”我们真的就像安东里·瓦罗尔（Antone Rivarol）所说的那样：“24小时里，你和其他人一样是明智的，下一个24小时，你又变得愚蠢了。”

当时我差点被邀请成为IOS的一员。亨利·布尔三世（Henry Buhl）在那里负责投资组合管理，他四处打听、物色股票投资经理。我的朋友加斯顿·科布伦茨（Gaston Coblenz）——《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欧洲的特派员，告诉亨利他认识一个非常老练的股市专家，于是亨利·布尔便想尽办法，非要认识我不可。一开始我故作谦虚地客套了一番，因为我知道这一套对IOS来说是很重要的。基于好奇，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约定在餐厅见面。

在勒纳河边的酒店吃完午餐，亨利告诉我，他正在物色操盘手，做超短线交易，交易频次不是一个小时，而是只有两分钟。“业绩表现”是关键。他安排人做巡查，只有那些成功的组合投资经理，可以继续留用。

我让他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操盘手正好负责的是一个好的产业板块，比如说计算机行业，那么就会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自然，当价格从100涨到200的过程中，他就可以低买高卖，比如说，以100买进，在105卖出，再在110买进，依此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只能赚40个点，而不是100个点，剩下的都是空气。

另一个操盘手可能很不幸运，比如负责航空板块的股票，这段时间经历了从100到70的股价下跌。他几乎没有机会展示“业绩表现”，因为他不想承担亏损的风险，那么在“业绩监督员”的压力下，他的职业每周或者每个月都会受到威胁。他一直在等待，价格下跌到90时，他只得继续等待。短期业绩表现并不能解释这些操盘手之间的差异。

尽管我对他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是这次会面，我还是给亨利·布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邀请我加入IOS，并开出1000万年薪的薪酬。对于我的问题，即公司（从德国储蓄人那里筹集了30亿马克）如何预防我没有购买10000股IBM股票，而另一位操盘手（该公司已经有10位操盘手了）却在此时卖出了10000股IBM股票。亨利的回答简短而有力。他不担心这个问题。当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是可以赚到钱。如果能够跑赢道琼斯指数，就能得到20%的分成。当然道琼斯指数也有可能回调，那时自然无话可说。

但我对谈话内容感到反感，所以并没有到IOS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写文章来对抗这个骗人的企业。

可惜我揭穿得太晚了，好几年来，各新闻媒体把这家投资基金描写得天花乱坠。我深信，他们把新“米达斯国王”——伯纳德·科恩费尔德（Bernard Cornfeld）和经纪人五光十色的生活巨细无遗并添油加醋地大肆报道，有助于为自己做宣传。《每日新闻》对海外基金产业都做了详细且中立的报道，但是它们并没有了解到基金的核心情况。当我们回想起那些基金推销员小贩似的叫卖承诺，并且把它跟“成果”比较一下时，便不难产生疑问：德国当局怎么会在这种欺骗行径袖手旁观那么久？为什么海外基金可以在德国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功，而且它们的广告还是免费的。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伎俩，因为海外基金属于投资基金，是在别的国家登记注册的，所以完全没办法通过立法或其他监督机构来约束管理，也就是说他们的负责人几乎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难道这个基金机构是无所不能的精灵吗？当然不是，整个基金是在一个幸运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得来的。我相信，科恩费尔德本人并不是骗子，他只不过是没经验，没受过教育，识字不多，也根本不晓得股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股市的历史一点概念也没有，但是他相信火药是自己发明的。他也不知道，早在17世纪，股市投机在阿姆斯特丹已经蔚然成风，就跟今天的华尔街一样。因为行情指数有几年

不断地上涨，于是科恩费尔德提出一个论点，股票每年都能获利15%，而大家也都相信他这个令人震惊的说法。

跟他一起共事的人都把他视为天神下凡，而他奢华的私生活又为他增添了几分光彩，每个人都想成为第二个科恩费尔德。有人想，既然科恩费尔德先生可以利用他的基金得到财富，那么我们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科恩费尔德能过上这样豪华的生活都是他们出的钱。

我承认，我曾经对“伟大的”科恩费尔德有过些妒忌，那时在巴黎古董展览会上，我沉迷在那些美妙的藏品中时，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科恩费尔德可以把展示的东西全部买下来，就算他一件也不认识，再高的价钱对他也不在乎。于是这个妒忌的念头便开始啃噬我。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我很喜欢的勃拉姆斯交响曲，我这才稍稍得到安慰。我有这个，我对自己说，这个他一定没有。

科恩费尔德出乎意料的成功，来自一笔资金突然暴增的差额收益，这笔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德国民众自1930年以后就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潮流之外，所以民众的投资渠道很有限。

难怪当“投资顾问”来敲门时，他们会出人意料地受欢迎。除了德国，其他文明国家都不会让这种胡作非为的行径如此嚣张。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海外投资和不动产基金才有办法把德国人的财富抢个一

干二净，它们身上都带着这个牌子——“Made for Germany”（专为德国打造）。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那些基金经理人还是在四处兜售一些危险甚至没有价值的股票。他们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几乎没买几张股票，小赚一些后就将其脱手，然后跳到另一只股票上，用这些获利来吸引那些后续想买基金的人。但是当这些经纪人手上很不幸地抓了一把烂股票时，他们就会一直陷于亏损之中，什么都赚不到。小赚大赔。

懂行的专家也玩不好这种把戏。数十亿资金很难操作这种超短线交易。它们要求有相同的方法和心态。

投资基金并不考核资金的绩效（欧洲银行都是如此），只有那些无赖金融集团才会那样做。德国的投资人一开始并不知道，有人把他们辛苦存起来的每一分钱毫无顾忌且不负责任地恣意挥霍掉了。我作为投机人，当然明白投机意味着必须承担风险。要想在股票上投机，当然要有输钱的心理准备！

而每年获利15%的保证更像一种假象，因为基金经理人的平均年龄是25岁，对于股市的险恶环境一点概念也没有。即便股市跌了，投资者也不知道，等到几年后再看，已经为时晚矣。基金经理人只有一个经验，就是如何把基金推销给容易上当的买主。只要能掌握这个，何

必长年累积有关经济政策、金钱还有资金市场的知识呢。如果只是按照原则交易，其实大仲马早就说过：“最赚钱的永远都是用别人的钱！”

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总能找到一位储户愿意投资1000马克，就能完成任务。为什么我会那么悲观呢？投资基金需要3个条件才行得通：诚信、责任感与经验。诚信不用多说，我认为每天都应该保持诚实。我具备担任基金经理的个人特质。但是我从书本中找不到依据，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客观判断。我的悲观看法来自几十年股市经历和见过的各色人等。至于说到责任感，我要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他们游说一些小市民，这些人从来不知道股市与投机是什么，基金经理人却向他们宣称，每年可以从股市里赚到15%的利润，这样的推销简直就和犯法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可以从股市里赚到一些，赚到很多，甚至一夜暴富。我们也可能赔钱，赔上很多，甚至变得一贫如洗。但是我们绝不可能肯定地说，在股市上投资每年都会有固定比例的收入。

事实上，那些卖基金的人都是接受过精心训练的。我也接到过他们的宣传单，因为我想了解一下他们采用的广告策略。一位朋友给了一份他们的广告投放地址，上面有各种各样职业的人，但是没有商人，里面有音乐家、作家，还有一位很富有的男士，这些人就是IOS的目标客群。（幸好现在没有这种事了，我可以从媒体上了解情况。）

我曾经听过他们的“布道”，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激情四射，销售人员用IOS的观念给我洗脑，我不得不说，我几乎被他们打败了！

根据我的经验，我必须指出：那些基金经理人对每年15%的收入深信不疑，并且想用这套办法在股市里骗吃骗喝，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没有实践经验。正因为缺乏经验，所以他们也就缺乏责任感。他们根本无法察觉股市里有多少陷阱正等着他们。

基金经理人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股市，因此当股市行情下跌时，他们根本不必负责，这根本就是不对的。1972年1月的道琼斯指数开盘时并没有比其历史最高点低多少，那时候基金经理人就用小市民们存下来的钱以最高价买下。本来一点损失也没有，所有人甚至可以分到一些利润。但是他们用高价买到的却是一堆贬值的有价证券，甚至是伪造的字母股票（这种股票的大部分份额是锁定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上市交易）。此外，对于诱导小市民们到这个野蛮的股票投机市场里来，他们也必须完全负责。不管小市民们之前是否有固定存款或抵押债券，虽然收入微薄，他们的生活却是固定有保障的。我收到上百封小型投资者的来信，他们向我哭诉，因为买了基金，他们的经济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我从这个基金魔法术里看出了哪些教训呢？以下的建议献给每个人，甚至是有足够资金的小资本家：请继续留在有价证券上面吧！找个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帮你挑选，这将是个很好的投资方向。至于

资本不足但又做多种投资的投资者，我的建议是：直接投资基金吧！  
但必须是由欧洲有关当局监管的基金。

至于科恩费尔德和他的伙伴呢？他们现在还是过着奢华的生活，  
而科恩费尔德更是偶尔在好莱坞的访谈节目里吹嘘，他个人的资产估  
计在4000万~5000万美元。对于小市民们的损失，他也只是避而不  
答。对于这个基金“龙头大哥”的厚颜无耻与小市民们的愚蠢无知所  
导致的后果，真的不能低估。

## 第12章 日不落帝国：股市

当欧洲的股市收市时，纽约股市正要醒过来，几个钟头后是芝加哥，然后是旧金山。当美国的黑夜来临，华尔街悄然入睡那一刻，世界另一端的东京股市正开始迎接每日攒动的人潮，接着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悉尼、孟买。然后再由特拉维夫和雅典来接班，接着是米兰和马德里，同时还有法兰克福、巴黎和伦敦。几个钟头后又是华尔街上场，如此形成了24小时全球股市接力赛。

今天我要从新诞生的布达佩斯股市讲起。为了这个新股市的诞生，我用匈牙利语做了一场演讲，因为我必须让年轻的匈牙利执政党了解到，股市的存在对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达佩斯股市曾经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布达佩斯的证券跟谷物交易所位于同一栋颇具艺术风格的建筑里，在1914年以前这曾是欧洲的重要标志，在后来的岁月中也充当了多个角色。当时整个匈牙利都投入到谷物交易中。1949年的时候，两个股市同时停业，当时我也在场并有幸经历了这最后一天。至今为止，我还记忆犹新。

经过40年的冬眠之后，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于1988年再次以微型交易所的姿态出现。1990年之后，它逐渐蜕变为迷你交易所，只有60

只股票、35家合作银行与经纪公司参与交易，操盘手们全部围坐在一张马蹄铁形的桌子旁，从早上10：00点到12：00点，他们高喊着买进卖出。虽然这只是个交易量很小的迷你股市，但仍是股市。这个市场的所在地代表了微型或迷你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复兴，寄托着人们的希望，这家小交易所朝一日也会发展壮大。

多年前，我曾到苏联考察，一心想着要到旧日著名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交易所表达我的敬意。但在莫斯科，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老交易所，多数人甚至连一点概念也没有。最后我遇到了一位老人家，他带我来到那栋当时已经成为百货公司的建筑物前。在圣彼得堡，我从老旧的刺绣画里得知交易所的位置：就在聂瓦河边，正对着那艘装甲巡洋舰的停靠处，现在已成了海军博物馆。我始终无法忘记这两幅记忆里的画面。

4年前，在一场大学内的演讲结束后，两位从莫斯科来的教授上前对我说：“我们想邀请您到莫斯科大学做一场演讲。”听后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这两个老交易所重新开幕时一睹盛况，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

从布达佩斯，我们朝着落下太阳的方向往西而行。下一站是维也纳，那里有一个可爱的小股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已今非昔比，它仍在三四年前破茧而出，蜕变成为成功的股市，创造了可观的利

润，但其交易量相对于大的交易市场而言还是比较少的。尽管如此，维也纳股市对自己的“表现”仍是相当自豪。

和维也纳完全不同，苏黎世股市则拥有大量的营业额、大量的投资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监督员，场内人声鼎沸。瑞士人认为没有必要跑到美国去做交易，所以当欧洲人从前一晚的华尔街行情看出一些端倪时，不用等到第二天华尔街股市开盘，他们马上就可以在苏黎世股市里操作美国股票。

此时，米兰的交易所也生机勃勃地开市了，这是一个属于冒险者的游乐场，在交易厅里，妇女们也一样热衷于操盘。隔壁的威尼斯是一个迷你股市，坐落在世界上最美的大道——运河大道上。然后是罗马，这是根据梵蒂冈教廷的公告于1821年成立的证券交易所。

就南方的代表而言，绝不能漏掉马德里和里斯本。马德里有着最漂亮的交易厅和相当优雅的经纪人。民众可以免费进入画廊，但现在已经不大有人去了。现在这里是越来越安静了，因为经纪人已逐渐用计算机取代过去繁忙的作业。有趣的是，佛朗哥将军的画像还一直悬挂在交易所的一个会议厅里。今天的西班牙股市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不难预见它光明的前景。

而在巴塞罗那有一个好处，每个人都可以从交易里获得大概50比索的报酬。

里斯本股市一直都在，但是在斯皮诺拉的统治下一直呈现着假死状态。当时在葡萄牙不但所有企业国有化，甚至不准有股票保管箱。在一次拜访中我亲身经历了一天中只完成三笔交易（公债）的情况，甚至比对面河边跳蚤市场的交易量还少。不久后我便找到了答案，我把连着交易所的三条街名念一遍——黄金之街、白银之街、拾荒者之街，突然恍然大悟，人们从前面两条街走进交易所，然后从后面那条街走出交易所……

现在随着世界各地股市的振兴，自葡萄牙加入欧盟后，里斯本已经从假死状态中渐渐苏醒过来了。我已经给那边的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向他们传授市场交易的秘密。

法兰克福与德国其他股市在同一时间开市。法兰克福曾经是红衣主教的封地，直至今日人们还常谈起一件轶事，那位神奇的犹太经济师有一次被问到接下来的几年该怎么操作股票时，他迅速但语带双关地回答：“买不卖。”没有逗号，就连最聪明的人听了也摸不着头脑。

杜塞尔多夫股市是后起之秀，是一个具有德国风格的严谨组织。柏林交易所曾经拥有大量的期货交易、期权交易与舒适且先进的设备（如同现在的法兰克福），而今却沦为法兰克福与杜塞尔多夫的分公司。多亏了两德统一，柏林交易所终将成为一家全球性交易所。

慕尼黑交易所入口处的一块青铜碑上刻着“投机”，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里头正在进行些什么活动，而东德境内的第一个股市应该是莱比锡。

继续往北走，会来到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股市，以前这里有最多的女性顾客，因此气氛相当歇斯底里。人们对它们的过去充满骄傲，因为这是荷兰最早具备现代观念的股市，早在17世纪时的运作方式，就已经类似今日计算机化的股市了。

再往北一点是哥本哈根股市，它被安置在一幢老旧的王宫里，是世界上最友善的股市。每位来访的外国交易员都被热诚接待，并有机会享用各种美食。

“每一位正直的人都可以进来”，奥斯陆的一项条文如此说明着。我留下来只是为了看个明白，什么样的人才算正直。

斯德哥尔摩是最安静的股市，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带着北方的冷漠。1932年我就曾拜访过这个股市，当时斯德哥尔摩已经成功地用电子设备报价，所以在那里听不到“我要卖……、我要买……”之类的喧嚣。买进与卖出、数量与行情，只需以手按键，其他的就交给计算机去处理。

我怎么可能忘了巴黎，这个我从小长大、接受新思想最多的地方！几年前这里的交易所还有为数不少的民众流连，每天在5000～

10000人。可惜的是，今日的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显得冷清了，大概还有几百人聚集在这里，但也只是聊聊小道消息罢了。

伦敦，因为其传统与礼节，是所有股市里最富有贵族气派与国际性特质的。但是，太可怕了，不久前在雄伟美丽的交易厅里，我数一数竟然不到20人，都是计算机！计算机把这些年轻的“金童”和他们老板的数10亿资金耍得团团转。在1987年经济恐慌之后有6万人被炒鱿鱼，因为他们造成的损失实在是难以估计。

这里的交易从贵金属到胡椒都一样活跃。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黄金与白银的买卖。在一栋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每天早上10：30，五个“金银经纪人”会在这里开会，他们都是贵金属市场举足轻重的经纪人。他们聚在一起可不只是为了喝喝茶，而是为了确定黄金与白银的行情。尽管芝加哥已经成了这类交易的强劲对手，但这五个经纪人老早就拿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委托书。不久之前，莫斯科也提出要求，想在市场上插一脚，因为长久以来莫斯科都只是扮演卖方的角色。几分钟后，会议在没有混乱与喧嚷的情况下结束，行情便通过电报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并有可能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

欧洲之后，让我们先到几个南美洲的股市去看看。布宜诺斯艾利斯股市像一个大型赌场，嘈杂又混乱，大家都在这里浑水摸鱼。阿根廷国内的政治事件强烈影响着股市，有时候会使行情产生巨幅震荡。

利马，一个小型股市。我有一次去拜访时，里面一共只有三个人，经理负责主持大局，经纪人负责记录行情，还有一个投资人，每当行情被记录下来，他就负责点点头。

加拉加斯股市是由19世纪一场树下的会议开始起步的，时至今日，它已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一栋相当现代化的大楼的股市。

里约热内卢曾经有过一段相当知名的黄金时期，甚至连里斯本也受到它的影响。当其他南美人咬紧牙关度日，或南美洲被混乱所笼罩时，里约热内卢的交易就特别活跃，尤其是外汇市场；然而当别处回归平静时，它们却又反其道而行之。

在所有南美洲的股市都打烊之市，蒙得维的亚开市了。如果南方市场出现了波动，这个市场只是轻微下降，然后重新恢复平静。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这个大陆上的瑞士一样。

现在轮到华尔街了。关于华尔街，有数不尽的书籍、文章与研究论文，所以我也就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可以说。美国的心脏是随着华尔街的脉搏而跳动的。在一旁有细心的政府机关随时监视着，以保护那些时常被“抢劫”的百姓。可惜这对他们来说没用，因为团体的利益太强势了，足以阻挠许多已设置的重要措施。

美国投资者有先进的科技可供使用，行情节拍的步调跟开盘同步，所以说在太平洋这边的经纪人必须早上6：00就到办公室里等待，

那真是辛苦的工作呀！在印第安纳州或新墨西哥州的小城里，玩家可以同步参与纽约的交易，更棒的是，他们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庆功宴。交易量的多寡可以从股票报价终端发出声音的节奏得知。报价终端安静摆动，表示交易量不大。若速度突然加快，而且交易的速度无法跟上的话，就表示华尔街有大动作。爆炸或恐慌，从报价终端发出的声响里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芝加哥曾是谷物交易所的女王，交易告示板每天操控着人们的面包价钱。而今天已不只如此，芝加哥还是一个有各种利率、货币的赌盘。投入一点点，就可以让人赚得或赔上百万元。相对于这种反常的轮盘赌注，证券交易只不过是小小的三人牌戏。我常常写文章反对这种情形，不过那也只是旷野里微弱的声音罢了！

两个钟头后来到了旧金山，在这里人们拿新闻来做生意，利用的是纽约新闻截稿后的第一手消息。

接着横越太平洋，东京有世界上最活跃的股市，也是日本人每日生活的焦点。他们有那么多钱，却不知如何使用，所以他们买世界上任何“金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但当他们从世界各地买了那么多东西后，为什么不买自己的股票呢？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股市，日本出版社卖得最好的是关于投资的书。连政府也在行情趋势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政府下令买或卖，交易行情才会稳住。日本人的思想行为是欧洲人完全无法理解的。

继续往西，来到香港，这是股市里的巴比伦塔，从英文到中文，从法文到匈牙利文，从犹太文到俄文，在这里可以听到每种语言。

悉尼有英国的传统与美国的经济思想，主要的演员都是欧洲人。他们由匈牙利难民所组成，因此这里并不适合儿童或心脏病患者。这里很容易就买到股票，但是通常也很难脱手。

约翰内斯堡股市反而是用英式风格建构的，参考计算机时代前的伦敦股票交易模式。尽管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里却是个严谨的市场，同时操控着庞大的地下金矿。

孟买也是以英国风格主导的股市，操着浓厚英国腔的印度教徒是主角。买卖的产品主要是透过地下管道而来的黄金。在这里什么都有人买卖，木棉、黄麻，有时候甚至还有威士忌，少部分的人在这里碰运气。

在往西的旅途上会经过特拉维夫，只是这里的交易所十分难找。在阿以战争的数年间，股市里的人会在空袭时逃到防空洞里，在危险过后他们又跑回交易所热烈地进行交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伊斯坦布尔的股市是在波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个鱼子加工厂，这里各色人种都有，希腊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约旦人，全世界的人都有了，就是没有土耳其人。

现在，在24小时还没跑完之前，我们来到了雅典，一个1901年建立的现代股市。在苏格拉底之树的两步之外，后代子孙很早之前便在外套跟圆柱之间找到了金钱交换的迹象。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按下按键，5000公里外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就是股市。全世界的股市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系统，且彼此依赖，如同恺撒大帝的帝国——一个太阳永远不西沉的帝国。

## 后记 我的三段职业生涯

我都快85岁了，尽管我可能活很久，但借这个机会，我想要回顾一下，我这大半辈子究竟得到了什么。我满足吗？是，也不是！

说不是，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说是，是因为我只有一个愿望——在经济和思想上做到独立，这个愿望我已经达成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不管人们怎样评说，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这就是我的成就。

我的双亲是富有的中产阶级：父亲在布达佩斯是受人敬重的企业家；母亲在音乐方面非常有天分，真诚而高尚，她没有将绘画与写作的天赋用在穿着打扮上，而是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养育4个孩子上。正如歌德所说：“从父亲那里，我得到安身立命的体魄，从母亲那里，我得到乐观的性格与爱讲故事的兴趣。”但是我们的家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被付之一炬，幸亏父母让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使我后来能够照顾他们，并让他们可以在瑞士过上丰裕的老年生活。

我在布达佩斯大学主修哲学和艺术史，本来还想修读音乐，但因为学员已经满额而作罢。后来我去了巴黎，进入了巴黎股票交易所，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继而转战纽约、伦敦和苏黎世，在金融界学习和打拼。今天我把10个城市当成自己的家，能说4种语言：对上帝讲匈

牙利语，和朋友聊天用法语，同银行家讲英语，和学生还有女士们讲德语。

35岁时，我的第一段事业达到了顶峰，我可以退休了，用投资赚到的钱去养老。但没想到，没有任何挑战和烦扰的生活，反而让我在50岁时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成天被抑郁沮丧的心情所困扰。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开始了第二段事业——做财经记者和作家，这一切要归功于一位心理学教授。那时，我向在苏黎世任教和执业的利奥波德·丛狄（Leopold Szondi）教授求教，他给我做了直到目前还很实用的丛狄测验。我把48张照片分成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教授将那些照片重新混在一起，让我反复测验了好几次，然后他开始计算并分析，结束时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您家里有谁患有虐待狂症？您不用震惊，我的意思是，谁的精力充沛而且容易动怒？”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我父亲了，他发怒的时候很吓人。我母亲则很温柔。”

“您遗传了您父亲的天性，身体里积压了许多能量，您想要发泄出来却找不到出口。您是否偶尔会暴躁不安？”这点我必须承认。“看吧，因为您是受过教育的，一旦要克制身体里那股蠢蠢欲动的能量，就会造成精神上的失衡。如果您是没念过书的乡下人，我会建议您去砍柴，折弯铁棍，敲碎石块；如果您年纪适中，我会建议您去学习外科，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别人动刀。但现在我只能建议

您写些东西。您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音乐和股市。“那您就写写关于这些方面的东西吧！”

我由衷地感谢他，并且表示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尝试去写些东西。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很丢脸，在经过这位世界知名的教授诊治后，我竟然通过给他的学生提供咨询建议，得到了一笔50瑞士法郎的酬金。

因此，我从股市专家（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摇身一变，成了财经作家。虽然我也是头号音乐迷，可惜学艺不精，没办法成为专业的音乐人。我的第一本书《这就是股市》是用法文写的，而且被译成了7种语言。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了《资本》杂志的专栏作者，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被沮丧抑郁困扰过了。伏尔泰曾经说过：“描写金钱比赚钱简单多了。”但是对我来说却完全相反，我必须先会赚钱，然后才有办法写出来。

《这就是股市》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发行了30多年了，得到了许多正面的评价，而在苏黎世的《世界周刊》上，曾经刊登过一则书评，标题是《一个伪君子的告白》（不是《一个投机者的告白》），显然是大家把我跟费利克斯·克鲁尔（Felix Krull）搞混了。

我住在苏黎世的大姐对这件事十分生气，她的小弟竟然被那里的人称作伪君子！朋友也建议我上法院去控告他们，但是我一点也不这么想。太好了！我这么认为，大家一定比较喜欢看一个“伪君子”的告白，而不是随便一个金融专家所写的枯燥文章。《这就是股市》的销售相当成功。

有一本在维也纳相当知名的经济类杂志《趋势》，在几年前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有关我的报道，在报道中再次用上了这个声名狼藉的字眼。他们刊登了几位股市投资者对于我的看法。我的朋友、尊贵的格拉夫·安布罗奇（Graf Ambrozy）退休前是维也纳一家银行的高层领导人，现在从事兰花育种，他发表了以下的声明：“我认为我相当尊敬的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是一个伪君子。”你们知道嘛，有一次我请他吃晚餐，最后让他付了咖啡钱。

这当然是他不算高明的玩笑，但那家杂志社还是很欣然地接受了他的说法。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这篇文章，我收到许多从维也纳寄来的申请函，许多人说要来上我的股市研究课程。这件事实际上是替我做了个不错的广告。

16年前，我和我的朋友兼合作伙伴戈特弗里德·海勒一起设计了一个股票研究课程，同时开始了我的第三段事业——“股市教授”，那时我在银行界和大学里已经是相当知名的客座讲师，当然他们不会给我一个正式且常设的教职，所以我便开办了自己的研讨班，不是在

大学里，而是在咖啡馆的咖啡桌旁，讲授的便是关于股市的知识与股市预测。在这个属于我的讲台上，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也跟新的一代分享了我的理论和经验。

1974年刚开始办研讨班时，只有30个参加者（通过这种特意安排，戈特弗里德·海勒可以借此赢得为客户管理头寸的机会），如果有十倍这个数量的参加者，研讨班就可以赚到钱（便宜的东西，是没价值的）。很快就有超过30000名男女学生听了我的课。里面有口袋里只剩几马克的穷学生，也有刚刚卖掉自己的公司而不知道该怎么使用那笔钱的百万富翁，有妓院的老板，也有教会的管理人员，有的甚至参加了不止一次。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科斯托拉尼迷”存在，也有可能是他们有某种“股票瘾”吧。

这样的日子我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正相反，周末研讨班对于我来说，就是宽敞的咖啡馆和开心的游戏（我可不会大声地把这话讲出来）。我所分析的政治和经济基本面正在逐渐改变，我的“储备”也不是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艾尔弗雷德·毕雷克是我非常尊敬的、非常棒的新闻工作者。有一次我参加他主持的一个系列谈话节目，结束时，他用钦佩的语气对我说：“每天晚上我都问您同样的问题，您的答案没有一次是相同的。”

对于股市，我绝对没有任何秘诀，秘诀是银行家和经纪人的事。对于那些愿意赚钱或赔钱的人，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但是我深

信，跟着我学习的“学生”，只要能够思考、分析、坚持到底，而且不犹豫，他们就一定可以成功。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感谢信里的结论。

我也是个知名的“咖啡馆常客”，毋庸置疑，咖啡馆是股市交易者理想的非正式聚集场所。我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里都有固定的桌子，从巴黎、纽约、戛纳到汉堡都是如此。在法兰克福或杜塞尔多夫某大银行的访客休息室里，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法院的地下室里，我甚至有“免费的”固定桌子。这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兼学生彼得·里格（Peter Riege），他是公务员，但闲暇时他都在从事股市投资，有很高的热情、想法和创造力。

彼得自己也有学生，他们也都不是职业的股市专家，这并不是说他们花在股市投资上的时间比经纪人或交易员要少。正相反！我认识两个瑞士的股市老手，其中一位是验光师，另一位在瑞士餐饮界服务，我要感谢他们曾给我提供了一些相当宝贵的意见，今天他们都是相当成功的理财顾问，并且有广大的客户群。这正如同爱因斯坦所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在“免费的固定咖啡桌”旁，不管形势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总是热烈讨论和判断着这个世界的命运。记者对我把那么多时间耗在咖啡馆里感到相当不理解。我是这么回答他们的：“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事我的专业工作，而不只是在股票交易所或书桌上，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思考。”

有时候我会被贴上“股市大师”的标签，这个称号我可从来没接受过，也从不需要。大师的意思就跟教皇一样，说一就是一，没有争议的余地。尽管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但还是难免犯错。一个有70年成功经验的“股市教授”的名衔，或许我还会接受。

有个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说我是“股市的拉尼奇”。现在马塞尔·莱希-拉尼奇<sup>[1]</sup>也被当成文学界的“教皇”了，人们对我们俩都有“无须争辩”的评价，我们都耽误了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都被学校所敌视。但是拉尼奇还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评论，而我并不想知道有多少股评编辑或他们的线人曾经出现在我的课堂里。

### 我的犹太出身

和马塞尔·莱希-拉尼奇一样，我也有过同样可怕的经验。他在《犹太肖像》一书中写道采访赫琳德·克尔伯尔（Herlinde Koelbl）<sup>[2]</sup>时提到过。当我在演讲时用到某些特定的字眼时，像“希特勒”“犹太人”，特别是“奥斯维辛”，我就会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冷风袭来，感觉就像是有个黑暗中的魔鬼从房里走过。我当场就觉得我可能说了些什么蠢话或违背了某些禁忌，要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尽管这种现象很奇怪，这种阴暗的想法和过去的阴影，想必是和我对发生在德国的那场战争以及反犹太主义的行为缺乏切身感受有

关。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那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讨论的议题是国库破产的利与弊，几个在场的“先知”预言说，德国马克马上就会没有价值了。我当场提出反对，德国的货币一向都只在吃了败仗后才会贬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希特勒弄垮德国之后。晚上我回到旅馆后收到一封信，信里面写道，我的头皮应该被拿来作灯罩。

这当然是特例，通常我只会收到思想上的警告，有些是在背地里偷偷说的，有些则是真实可信的。有一次在讨论关于上帝跟金钱的问题时，图恩和塔克西斯侯爵家族的约翰跟他的邻座悄悄地说：“看看这个聪明的老犹太人会说些什么。”这我倒觉得无所谓，从他身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反犹太的怨念，反而听出了恭维的意思。我顶着一个不怎么舒服的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出生在一个老旧的时代<sup>[3]</sup>，在那个年代，奥匈帝国的人听起来就好像是从外层空间来的。我还背着这个壳在各地的股市四处闯荡了70年。“从这个世界主义的老犹太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吧！”一些人可能喜欢这么想。

虽是犹太人出身，但我却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我的双亲也以天主教的仪式埋葬在苏黎世山上。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犹太人，一直到希特勒掌权后，对他来说我就是犹太人。当他在犹太人身上做了那么多恐怖的事后，我深深感到刺痛，就像每个犹太人所感受到的一样。1940年法国被占领后，我从法国经过西班牙流亡到美国。那时候有一

些麻烦，分配给匈牙利的移民名额非常少，必须要等20年才排得到。后来我拿到了一张签证，证明我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依据当时的匈牙利法令，我不算是犹太人，当时的匈牙利犹太法令也不适用于我，我可以随时回到匈牙利。一开始我的犹太身份并没有问题，直到后来德国占领匈牙利，并且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

对希特勒来说，诋毁犹太民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把犹太人当成投机分子，而部分犹太人的确也是。犹太人从事金钱交易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从事其他行业，因此他们独占这个行业有好长一段时间，子承父业，如此资产便一直延续了下去。很多犹太人因为渴望成功，离开了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人，不只在财务金融上，还在数学、物理以及音乐等各领域中开创了一番大事业。其实金钱交易并非天生就是犹太人的专业，中国人在这方面同样精明，还有亚美尼亚人。在华尔街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国家和种族的优秀人才。

我希望用一个令人欣慰的故事来结束这个严肃的主题。几年前我再次到威尼斯，在穿过数不尽的小巷，跨过数不尽的小桥后，我来到一个封闭的广场。突然，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妇人从一个地下室里走出来，身上穿着破布衣服，对我友善地打招呼：“夏罗姆（Schalom，希伯莱文自由的意思）。”我站在一个犹太人居住区里，这个广场破旧而且空空荡荡。

老妇人试着用意大利文跟我交谈，带我参观这个犹太区。我们走过几条破旧的小巷子，“这是旧的，这是新的犹太教堂，这是养老院，这是托儿所，这是犹太法典学校……”老妇人指着一座座建筑物说着。但是说真的，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我随口问起：“在这个你们所说的犹太区里住了多少人呢？”

“哦，先生，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只剩下300个人了，以前这里还有3000个犹太人，范围有好几里呢！这里曾经挤满了人，有老的少的，有商人和工匠。不过如今已经好景不再了。”我想这应该是希特勒军队造成的不幸。“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问她，对这恐怖的答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唉！”老妇人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走了，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去圣马可广场，在大运河旁边，他们都是生意人、银行家、有钱人……”

有一位记者曾经这么写道：“没有人能像安德烈·科斯托拉尼那样为股市做了这么多事情，因为科斯托拉尼‘误导’了整个时代，让人们埋头在股市里。”这真的是反对我的意思吗？我想我可以接受。

我当然喜欢赞同和喝彩，所以我才会写书和举行演讲。令我感到愉悦的并不是那点稿酬，而是读者们听了我的观点后乐意拿出更多的

资金去投资，不容置疑，比起赚钱这种事，领取酬劳对我来说更有乐趣。成名的画家也是一样，卖画所得对他们的成就是很有力的证明。

对我来说，跟年轻人的接触也是意义重大的。当有学生邀请我发表演讲时，一开始我都会感觉到他们对我充满敬意，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只是个凡人，而且乐于跟他们闲聊好几个钟头。我自己刚开始接触股市的时候，大部分知识都是靠口耳相传学来的（而不是通过自己实际操作），那些股市老专家至少都年长我三四十岁。今天，我的学生比我年轻五六十岁是常有的事。

我们有些谈话内容完全跟财经无关，年轻人也想从我这里学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社交的规矩和礼节、言谈举止与装扮等。有几个甚至还模仿我的穿着，虽然他们不一定也打着领结，但至少风格上是跟我一样的。我一直都是穿着打扮方面的专家，这也是我最好的投资之一。在一次访谈里我简短地回答说：“我的投资中还包括我的服装。”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重视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表不自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帅哥。所以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当时的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纨绔子弟”吧。当我被问起穿着秘诀时，我总是回答：“穿着宁可保守一些，也不要太时髦。”如果人家没有问我某某人的穿着如何时，我就不会对别人的装扮发表评论，我不想在这方面让大家彼此尴尬。

不一定要富有，但一定要独立

经济上的宽裕使我的思想得以独立，在这种情况下遭人忌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会困扰我，因为我情愿有几千个人忌妒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人同情我。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百十来个朋友，最年轻的15岁，最老的105岁，刚刚去世。他们中有学生、教授、千万富翁、皇族王子和教会侯爵，也有街头流氓和小偷。

我还有什么没经历过呢？有哪里我还没有住过和投资过呢？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失眠，一失眠我就用老办法——开始数数，但不是数羊，刚开始我数我的同学，然后数我住过的城市和国家，我去过的歌剧院，我认识的女性……但是当我数到曾经与我共事的股市经纪人，还有我曾经待过的股市时，我就开始有点恍惚了，在数到第50个的时候，我相信那就是里斯本——我就已经睡着了。

年老给我带来了哪些利弊呢？年老改变了我的心理，改变了我的时间观念。年轻的时候，我老觉得时间紧迫，想快点赚钱，觉得自己被投机的风险游戏深深吸引，大脑总是飞速地运转着。今天我则是用泰然处之的心态来看待日常琐事，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知道昨天和今天，这就够了。现在我可以慢慢地想，想一整年的计划，其实我也不知道，明年我还在不在。时间过得飞快，不够去做我有兴趣的事情，我希望一天可以有48小时。

我已经没办法再学习新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在自己的圈子里却越来越活跃。每天我都在学习着，每个日常小经验、小事件都

会输入到我的个人计算机里（我的脑袋），经过吸收、衡量，把多余、不重要的信息删除掉，然后将剩余的信息根据以往的认识自动分类。

我必须持续保持注意力，才有办法处理经济市场上数不清的问题，所以我特别专注于培养某个特长，很多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很少见的。当我不需要用到脑袋时，我可以关掉它，里面是完全的“一片漆黑”；当我需要用它来解决问题时，我可以把“灯”打开，把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工作室凌乱得可以用狗窝来形容，但是我的脑子里永远都是有条不紊的。

有一次，一个25岁的小伙子带着幸灾乐祸和不怀好意的态度问我，我是不是打算要骗他？“没错，”我回答说，“除非你可以把我的经验和体会放在箱子里打包带走！”他并不知道，老年人也有属于自己的小乐趣。他也不知道，我们这些超过80岁的老人家，在巴黎可以享受一项特殊的服务——搭地铁时，可以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用二等车厢的票坐头等车厢。人生从85岁才开始，我说得没错吧？

[1] Marcel Reich-Ranicki，德国文坛极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文学教皇”。——译者注

[2] 著名的犹太女摄影家。——译者注

[3] 科斯托拉尼1906年出生于当时的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匈帝国的版图包括的里雅斯特、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加里西来、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现在的匈牙利和奥地利。1919年在捷克和匈牙利独立之前，科斯托拉尼已经移居奥地利维也纳。因此有人误将科斯托拉尼说成出生于匈牙利，这是不准确的。

——译者注